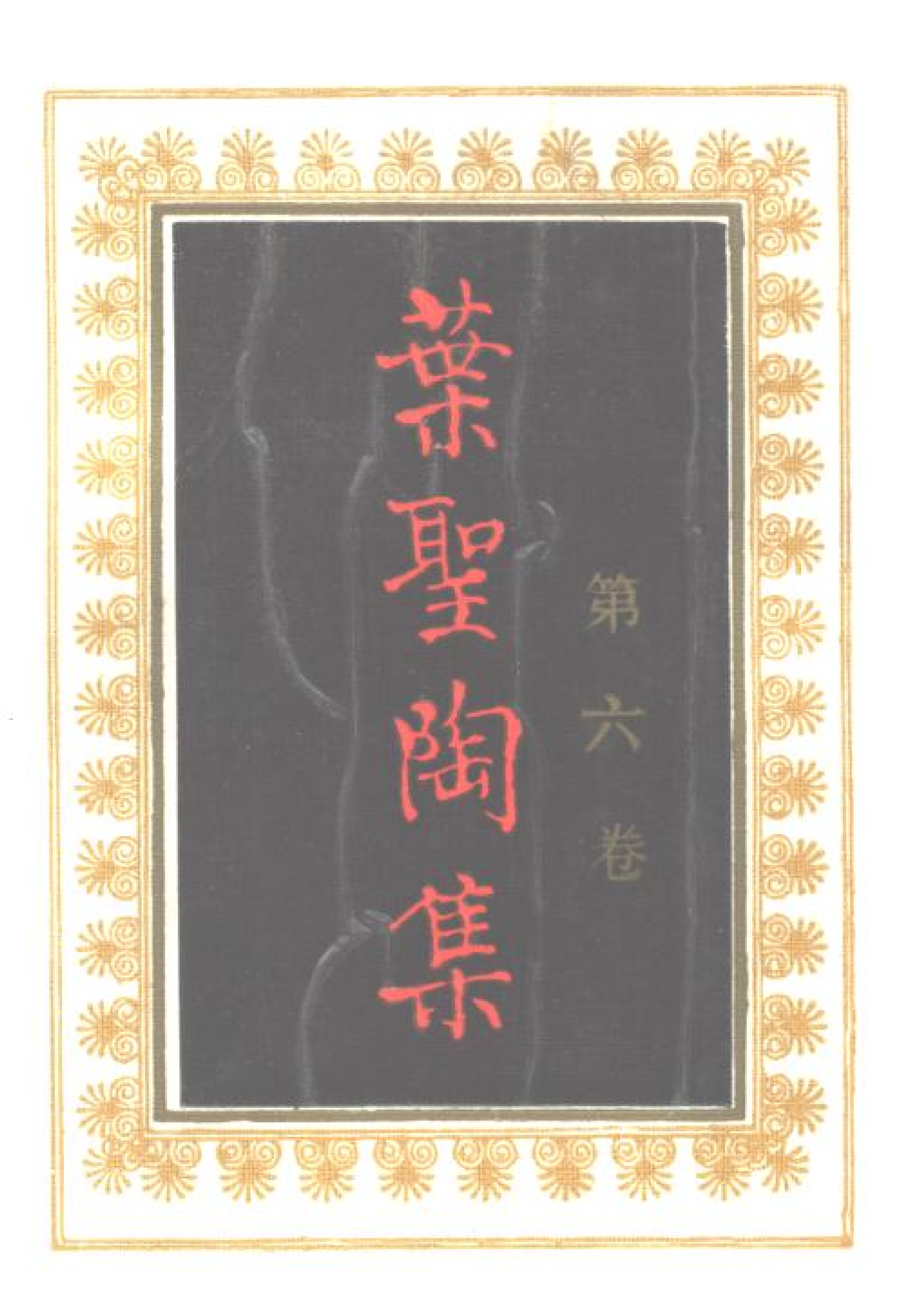

葉聖陶集
第六卷

叶圣陶集

第六卷



西川集

现实与理想





江苏教育出版社

叶 圣 陶 集
第 六 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5 插页9 字数212,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平装3,000册，精装2,000册)

ISBN 7—5343—0490—3

I·27　　定价：平装 4.30元
　　　　　　　精装 6.30元

责任编辑　缪詠禾　常烽岚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成都文艺工作者为作者五十初度祝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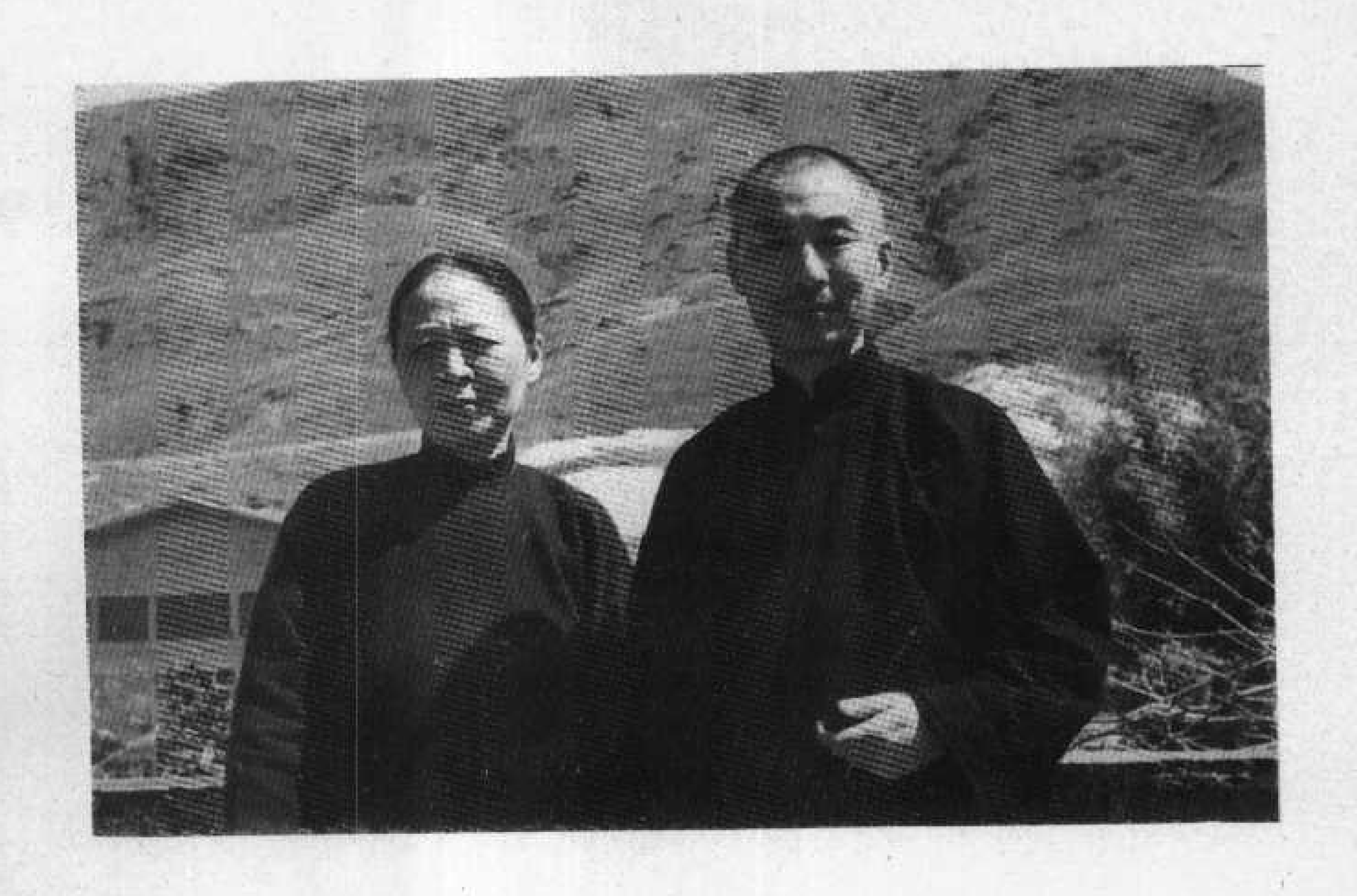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在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摄。
自左起：作者、冯雪峰、老舍、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邵力子、柳亚子、胡风。

書巢

伯翁藏書有巢讀書有巢余前已記之今茲重為整治復命題額老友好之何說可辭夫天下書眾矣雖廢寢食讀之猶不能盡其百一而以有涯逐無涯多十百種奚益少十百種奚害余方以是將廢書不觀冀免牽纏而為翁書是額雖未敢笑其老而好事亦復興不同如面之歎矣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朢陶葉紹鈞書並識

一九四八年，作者为“书巢”的题词。“书巢”是王伯祥先生的书房。



作者与夫人胡墨林。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摄于香港达德学院。

目　录

西川集

现实与理想



西川集

生命和小皮箱

空袭警报传来的时候，许多人匆匆忙忙跑到避难室防空壕里去。其中有些人，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小皮箱里盛的什么？不问可知是金银财物证券契据之类，总之是值钱的东西，可以活命的东西。生命保全了，要是可以活命的东西保不住，还是不得活命。带在身边，那就生命和可以活命的东西"两全"了。这样想法原是人情之常，无可非议。

我现在想猜度各人对生命和小皮箱的观念。

也许作这样想吧：——既已有了生命，别的且不管，生命总得保住，直到事实上再也不能保住的一瞬间。敌人的轰炸机来了，当前有避难室防空壕，当然要躲到里头去，因为这是保住生命唯一的办法。待听到了一声拖得很长的解除警报，走出避难室防空壕一看，假如满眼是坍毁了的房屋，翻了身的田园，七零八落的肢体，不免点头自慰，生命过了一道难关了。其时看看手里的小皮箱，好好的，没有裂开一道缝，更不免暗自庆幸。有这个小皮箱在，那么一个地下室毁了还有别的地下室，一个防空壕炸了还有别的防空壕，敌人炸到东边，自己可以逃到西边，旅馆总有得住，馆子里的饭菜总有得吃。有得住又有得吃，不是生命仍然可以保住吗？

也许作这样想吧：——自己的生命是与别人的生命有关

联的，自己的小皮箱是与别人的小皮箱“休戚相共”的。仅仅想保住自己的生命，生命难保；仅仅想依靠自己的小皮箱，小皮箱毫无用处。因此，要保住生命就得推广开来保住“四万万同胞”的生命，要依靠小皮箱就得推广开来依靠整个中华国土这个其大无比的小皮箱。（整个中华国土不是我们的小皮箱吗？）敌人的轰炸机来了，当前有避难室防空壕，自然要往里头躲，血肉之躯拼不过炸弹，这是常识。手头有个小皮箱，自然不妨提着走，化为灰屑究竟是可惜的。但是在听到一声拖得很长的解除警报之后，见到自己的生命和小皮箱都还存在，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安慰庆幸之处，只觉得一种责任感压在心头，非立刻再去操心思，流血汗，干那保住大众的生命，守护其大无比的小皮箱的工作不可。

我只能猜度，不能发掘人家的心。重庆人口头惯说“要得”“要不得”，提着小皮箱跑进避难室防空壕的人不妨问问自己：哪一种想头“要得”，哪一种“要不得”？还不妨问问自己：自己的想头属于哪一种？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发表

抗战周年随笔

去年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不到半个月，中央当局就有明白严正的表示。但是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中央当局还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不免使人有“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之感。其时我怅惘得很，按《鹧鸪天》调子写了一首词。

> 不定阴晴落叶飞，小红花自媚疏篱。颇惊宿鸟依枝久，亦讶行云出岫迟。 吟止酒，写新词，寻消问息费然疑。同仇敌忾非身外，莫道书生无所施。

“宿鸟”指飞机。集款购机，近几年来是一件大事，北方已经打得这么厉害，而飞机还不出动，不免惊诧那些“鸟”“宿”在枝上睡得那么沉酣。“行云”指对付敌寇的具体计划，从报纸上看，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今天硬一点儿，明天又软一点儿，为什么那“行云”还不“出岫”呢？直到八月十三日的下午，买到地方报纸的号外，说上海我军已经和寇军开战了。第二天又听到我空军初次出动，大获胜利的消息。我的怅惘这才完全消散，我不再“惊”“讶”了，我们的“鸟”原来是“一飞冲天”的大鹏，我们的“行云”原来是“天地为之变色”的势力。

九月三日的夜间，吴大琨君来访。他在上海做救护难民的工作，这一次回苏州就为护送难民回籍。他告诉我关于伤兵的故事，又告诉我难民的一般情况。我把他的话写了两首词，调子是《卜算子》。

“莫致慰劳辞，谁耐闲消遣！快与咱家去弹丸，心急回前线！”“留臂创难治，去臂魂先断。岂似新丰折臂翁，独臂争重战！”

齐视死和生，哪问恩和怨？荡析伤夷任惨凄，独颂今回战。紧紧咬牙根，炯炯睁双眼。身份无分共一舟，民质从今变。

第一首记的是两个伤兵的话。噜噜嗦嗦的慰劳话，听起来有点儿厌烦，爽直的伤兵就说：“不用慰劳吧！快给我去掉中在身上的子弹，我还要回前线去呢！”第二个伤兵可真惨，他不单是身上受了伤，连精神也受了伤了。要把那条臂留着，创口难以医治，如果去掉那条臂，单剩一条臂，怎么能再上前线呢？这种精神上的创伤比身体上的创伤更为难受。“新丰折臂翁”是我加进去的，伤兵当然不会知道白乐天有过这么一首乐府，写一个厌战而损伤自己肢体的懦夫。我用这个典故，不过表明“我岂是个怕打仗的懦夫”的意思罢了。第二首里的“独颂今回战”和“民质从今变”两句，现在想来，可以说是对一年来我们同胞的总题语。一年来我跑了几千里路，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中间有的叹息事业的衰败，有的痛哭亲属的死伤，有的离开了故乡，身无立锥之地，有的倒空了钱

袋，更无买饭的钱，但是没有一个怨恨这回抗战的，没有，绝对没有，大家只是更炽热地燃烧着对于敌寇的仇恨，更固执地抱持着抗战到底的意志。这是个最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所谓“民质从今变”。

九月二十一日，我全家离开苏州。我在苏州住的是新造的四间小屋，讲究虽然说不上，但是还清爽，屋前种着十几棵树木，四时不断地有花叶可玩。

那天走出家屋，几时再回来是未可预料的，也许回来时屋已被炸被烧了，可是当时我自己省察，并没有什么依恋爱惜之感。我以为抗战要本钱，本钱就是各个人的牺牲。具有积极意义的牺牲就是所谓“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仅有消极意义的牺牲就是不惜放弃所有，甘愿与全国同胞共同忍受当前的艰苦。积极意义的牺牲，价值当然极大，但是消极意义的牺牲也并非无关紧要。一个人当情势危迫，不得不放弃所有的时候，假如想不通，看不破，硬是不肯放弃所有，那么汉奸心理就像病菌似的侵入他的灵魂了。所以能够作消极的牺牲，也算在抗战这一桩大事业上出了一份本钱，是心安理得的事。两个月前，丰子恺先生抄给我看他写的一首诗，那诗是答覆友人作了诗来吊他的已毁的缘缘堂的。

寇至予当去，非从屈贾趋。
欲行焦土策，岂惜故园芜？
白骨齐山岳，朱殷染版图。
老夫家亦毁，惭赧庶几无。

丰先生所说的"惭赧庶几无"，大概正是我所说的作了消极意义的牺牲的意思。不过我在苏州的家屋至今没有毁。我并不因为它没有毁而感到欣喜。我希望它被我们的游击队的枪弹打得七穿八洞，我希望它被我们正规军队的大炮轰得尸骨无存，我甚至希望它被逃命无从的寇军烧得干干净净。

去年"八·一三"以后，苏州地方也闹过某人某人是汉奸的风说。当时我也暗自揣想，万一上海方面我军失利，寇军到了昆山，某某等人会冒用全体苏州人的名义，到昆山去欢迎他们，希望他们不要糟蹋苏州吧。后来苏州失陷了，从报上看到所谓维持会中人物的姓名，居然有两三个是我预料到的。这批人大都有田，有钱，有玩好，有享用，临到危难，不肯放弃所有，就傀儡登场当汉奸了。顾颉刚先生曾经写信给我，说到苏州的汉奸道："维持会中，某姓甚多，亦见故家大族之鲜克由礼也。"故家大族为什么会这样不争气？就在乎他们有"所有"，把"所有"看得太重了，"所有"之外的一切当然都丢在脑后了。这批汉奸有一件事，使人听了非常难受，觉得啼笑皆非。他们为了逢迎寇军，在张贴的通告上写上"昭和"的年号，寇军却假仁假义说："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事，照旧用中华民国好了。"他们听了哪敢照旧用，结果有一个聪明的汉奸想出了改用西历纪元的办法，据说一直用到如今了。就在这件简单的事上，汉奸心理充分表现出来了。这批人若不消灭净尽，我真耻为苏州人。去冬从宜昌来重庆，在江轮上写一首诗道：

故乡且付梦魂间，不扫妖氛誓不还。

偶与同舟作豪语，全家来看蜀中山。

我爱故乡，我切盼回到扫尽了“妖氛”的故乡。

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发表

受　言

立言的人不宜说什么“不以人废言”。如果说了，多少带一点回护自己的意味；仿佛说，“我能说不能行，固然不行，可是我的话究竟是好话，何妨听一听呢。”这样回护自己，可能的反响是人家回答说，“我不爱听徒然的好话。”

但是，受言的人却不应该忘记了“不以人废言”。听受的是话，话惟求其合于事理，切于实际，什么人说的都一样。如果在合于事理切于实际以外，更要看一看那说话人的面孔，或者想一想那说话人的名字，才决定自己的爱憎取舍，那么可以听受的话就减少了，吃亏的当然是自己。

至于在听受了人家的话之后，却转弯抹角地想：这个话别有背景吧？含着什么作用吧？这样神经过敏的人，实际是一句话也听受不进去的。他不知道一句话即使别有背景，即使含着什么作用，只要它本身不错，是无妨取它的本身的。而且，天下哪有“无所为而为”的语言文字呢？像他那样在话的本身以外根究到背景和作用，好像唯有“无所为而为”的语言文字才配他听受，那只好永远和人家的思维考虑断绝交通了。

受言的人的最消极的态度，是置之不理，所谓“听者藐藐”。演说场中，会议席上，发言者或则激昂慷慨，或则宛委详尽，总之竭尽了可能的力量。可是在座的人眼光不注在发

言者身上，却咬着指甲闲看墙壁或天花板，有时再来一个呵欠；发言者说到精采处，不给他鼓一下掌，主席请大家对某君的话发表意见，也并不见有一个人开口。这样“听者藐藐”的情形，差不多常常可以遇到。到此地步，听演说和参加会议只成为不得不敷衍的苦事，而演说和会议之毫无成效，也是当然的了。

抗战以来，发表的语言可以说车载斗量了。假如听受的人想到这些话是最亲密的自国人在商量最艰难最重大的切身事，都认认真真地听受，情形就和现在不一样了。所谓认认真真地听受，就是在合于事理切于实际以外不再问旁的；只要是合于事理的切于实际的，都接受了见于实践。那么，知道“出力出钱”的标语并非虚语，力和钱就聚集起来了；知道政事赶不上军事的话说得有理，政事的改善就迅速地实现了。而现在并不然，可见受言的人还得修养，还得有所改变。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发表

书巢记

伯祥嗜积书，始于弱岁。方就学草桥，课毕入市，经书肆辄徘徊不忍去，以少资贸二三帙，欢如得宝。所居通和坊老屋，辟一室曰疾流云馆，陈书于架，秩然怡心。窗前种菜数畦，高树荫之，类幽人之居。

及卒学校业，十年屯否，然犹稍稍致书。

民国十一年入商务印书馆，遂移居沪北。纂辑余闲，惟亲简编，不数载而积书盈室，上帖承尘，旁障素壁者，皆节用勤搜之所获也。其书无秘本精椠，而犊于其向蕲，乙部要籍略备。

二十一年春，倭寇犯淞沪，我十九路军御之，是为“一二八”之役。伯祥仓皇走避，寓居旋毁于火，历年积书，不遗片纸。然书者伯祥之偏嗜，一旦丧焉，怅惘几无以聊生。乃又徐徐致之，不足则假之友好，如鹊运枝，如燕衔泥，不以为劳。于是复有所谓曲斋者。虽赡富不逮曩昔，亦足资检览。

二十六年七月，倭寇寻衅于芦沟桥。八月，再犯淞沪。我举国奋兴，悉力与战，至今二年而气益王，埶益强，非尽驱之于海外莫肯已。此役也，伯祥先战事数日迁入法兰西租界，屋湫隘，未能发箧中书。翌年，始拓一室以居之，部署既讫，欢然如远翮之归故巢，遂名之曰书巢云。

夫积书之家，古今众矣，然或矜版本，或为饰观，彼皆有所凭藉，如商贾累财，积日自富，而实深负夫书。伯祥罔所凭藉，且数历艰虞，而犹守此书巢，展诵为乐，则诚无负于书者也。方今寇烽所至，公私藏书荡毁已多，大学师生求书不得，有徒以口耳为授受者，然则伯祥之守此书巢也可慰复可慨矣。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作

乐 山 被 炸

日本飞机轰炸乐山的那一天，我在成都。成都也发了警报．我和徐中舒兄出了新西门，在田岸上走，为了让一个老婆子，我的右脚踹到稻田里去了，鞋袜都沾满了泥浆。一会儿我们的飞机起飞了，两架一起，三架一起，有的径往东南飞去，有的在晴朗的空中打圈子，也数不清起飞了多少架，只觉得飞机声把浓绿的大平原笼罩住了。田岸上的人一路走，时常抬起头来眯着眼望天空，待望见了一个银灰色的颗粒，感慰的兴奋的神色就浮上了脸，仿佛说，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来吧！

我们在一条溪沟旁边的竹林里坐了一点钟光景，又在中舒兄的朋友的草屋里歇了将近两点钟，并且吃了午饭，警报解除了，日本飞机没有来。哪知道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寄居的乐山城毁了大半，有两千以上的人丧失了生命。我的寓所也毁了，从书籍衣服到筷子碗盏，都烧成了灰；我的一家人慌忙逃难，从已经烧着了的屋子里，从静寂得不见一个人只见倒地的死尸的小巷子里，从日本飞机的机枪扫射之下，赶到了岷江边，渡过了江，沿着岸滩向北跑，一直跑了六七里路，又渡过江来到昌群兄家里，这才坐定下来喘一口气。

我和徐中舒兄回进城里，听到传说很多，泸州被炸了，自

流井被炸了，提到的地方总有八九处。到了四点半的时候，知道被炸的是乐山。消息从防空机关里传出来，而且派去察看的飞机已经回来了，全城毁了四分之三，火还没有扑灭呢。那是千真万确的了，多数人以为该不至于被炸的乐山竟然被炸了。

为什么要轰炸乐山呢？乐山有唐朝时候雕凿的大佛，有相传是蛮子所居实在是汉朝人的墓穴的许多蛮洞，有凌云乌尤两个古寺，有武汉大学，有将近十万居民，这些难道是轰炸的目标吗？打仗本来没有什么公定的规则，所谓不轰炸不设防城市，乃是从战斗的道德观念演绎出来的。光明的勇敢的战斗员都有这种道德观念。彼此准备停当了，你一拳来，我一脚去，实力比较来得的一方打倒了对方，那才是光荣的胜利。如果乘对方的不防备，突然冲过去对准要害就来个冷拳，那么即使把对方打得半死，得到的也只是耻辱而不是胜利，因为这个人违背了战斗的道德。多数住在乐山的人以为乐山该不至于被炸，一半就由于料想日本军人也有这种道德观念。他们似乎忘却了几乎每天的报纸都记载着的事例，要是不忘记那些事例，日本军人并没有这种道德观念是显然的。他们存着极端不真切的料想，又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为赌注，果然，他们输了。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也输了。

那一夜差不多没有阖眼。想我的寓所在岷江和大渡河合流的尖嘴上，那是日本飞机最先飞过的地方，决不会不被炸；想我家每次听见了警报总是守在寓里，不过江，也不往山野里跑，这回一定也是这样，那就不堪设想了；想日本飞机每次来轰炸，就有多少人死了父母，伤了妻子，人家的人都可

以牺牲，我家的人哪有特别不应该牺牲的理由？但是，只要家里有一个人断了一条臂或者折了一条腿，那就是全家人永久的痛苦。如果情形比断一条臂折一条腿还要严重呢？如果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呢？如果老小六口都烧成了焦炭呢？我要排除那些可怕的想头，故意听窗外的秋虫声，分辨音调和音色的不同，可是没有用，分辨不到一分钟，虫声模糊了，那些可怕的想头又钻进心里来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钟，一辆小汽车载着五个归心如箭的人开行了。沿路的景物，没有心绪看；公路上的石子弹起来，打着车底的钢板哨哨发响，也不再嫌它讨厌了；大家数着路旁的里程标，“走了几公里了，剩下几公里了”，这样屡次地说着。那些里程标好像搬动过了，往常的一公里似乎没有那么长。

总算把一百六十多个里程标数完了。从乱哄哄的人丛中，汽车开进了嘉乐门，心头深切地体验到“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况味。忽然有人叫我，向我招手。定神看时，见是吴安真女士，“怎么样？”我慌张地问。

“你们一家人都好的，在贺昌群先生家里了。”听了这个话，我又深切地体验到“疑是梦里”并不是夸饰的修辞。

跑到昌群兄家里，见着老母以下六口，没有一个人流了一滴血，擦破了一处皮肤，那是我们的万幸。他们告诉我寓中一切都烧了；那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我并不感到激动。他们告诉我逃难时候那种慌急狼狈的情形；我很懊悔到了成都去，没有同他们共尝这一份惶恐和辛苦。他们告诉我从火场中检出来的死尸将近上千了；那些人和我们一样，牺牲的机

会在冥冥之中等候着，他们不幸竟碰上了。那比较听到一个朋友或是亲戚寻常病死的消息，我觉得难受得多。最后，他们告诉我在日本飞机还没飞走的时候，武大和技专的同学出动了，拆卸正在燃烧的房子，扛抬受了伤的人和断了气的尸体，真有奋不顾身的气概；听到这个话，我激动得流了泪。在成都听人说起那一回成都被炸，中央军校的全体同学立刻出动，努力救火救人，我也激动得流了泪。那是教育奏效的凭证，那是青年有为的凭证，把这种舍己为群的精神推广开来，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被炸以后的两个月中间，我家都忙着置备一切器物。新的寓所租定了，在城外一座小山下，就搬了进去。粗陶碗，毛竹筷子，一样可以吃饭；土布衣衫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三间面对田野的矮屋，比以前多了好些阳光和清新空气。轰炸改变了我的什么呢？到现在事隔半年了，在曾经是闹市区的瓦砾堆上，又筑起了白木土墙的房屋，各种店铺都开出来了。和被炸的别处地方以及沦为战区的各地一样，还是没有一个人显得颓唐，怨恨到抗战的国策；这是说给日本军人听也不会相信的。

一九四零年四月五日发表

心

一般人说，自从抗战以来，不见有特色的文艺作品出现，不免令人失望。我并不失望。文艺作品不像牙刷线袜一类东西，可以限时限刻制造出许多来的，只要文艺工作者不抛荒本分，多观察，多思索，多作技术上的训练，或迟或早，总会有出色的作品写出来的。目前可写的方面太多了，无论认定哪一方面，努力去发掘，都可以得到珍贵的宝藏，譬如把王克敏梁鸿志汪兆铭一班人作为类型，描写他们降顺日本的心理上和行动上的过程，只要忠实，扼要，深刻，就是一篇了不起的作品了。

虽然这么说，我自己并没有写这样一篇作品的野心。大概因为对于世情懂得太少了，我只觉得咱们中国有王克敏梁鸿志汪兆铭一班人乃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事实上竟有了，我怎么能知道他们，从而描写他们呢？

我的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咱们中国人目前唯一的基本的人生观是抗战建国，凡是我所遇见的人，受伤的士兵，受灾的难民，学生，工程师，教授，割肉的屠夫，种地的佃工，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表现有了这种认识。王克敏他们是中国人，当然也该有这种认识，但是他们已经降顺了日本，打破了我的逻辑。我不怀疑我的逻辑有什么漏洞，我只诧异他们怀着那

么一颗心，竟和一般中国人完全两样。

且不提“操守”“气节”等等字眼，那些字眼太抽象了。我只是替王克敏他们想，在集会的时候，他们站起来说话，在发布文告的时候，他们提起笔来起草，无论怎样滔滔汩汩，浩乎沛然，他们该不会没有一刹那的时间，想到自己是否歪曲了事实，欺骗了自己和同胞，在迎合他们的主人吧。想到这个的时候，他们的脸将会红起来热起来，他们的话将会说不下去，他们的文字将会写不下去吧。在宴饮的时候，同席的是翘着仁丹胡子的家伙，陪坐的是耸着高髻的艺妓，觞酌流行，歌舞徐起，也算得人生乐事，但是，他们该不会没有一刹那的时间，想到自己是被牵上场的猴子，那弄猴子的就在旁边吧。想到这个的时候，他们的脸会红起来热起来，他们将会觉得酒有点儿刺喉，歌有点儿刺耳，舞有点儿刺眼吧。在商订“要纲”和“协定”的时候，你一声“合作”，我一声“亲善”，也好像玉敦珠槃，折冲坛坫，但是，他们该不会没有一刹那的时间，想到自己是在贡献同胞的血，割断同胞的生命线吧。想到这个的时候，他们的脸将会红起来热起来，他们签字的手将会发抖吧。要是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一定会这样，那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我自己知道得清楚，我并不是怎样特别有修养的人，我的心只是平常中国人的一颗心。但是王克敏他们对于这些竟受得了。他们的心竟和一般中国人完全两样，怎么能使我不感到诧异呢？

咱们处在他们的地位，脸将会时时红起来热起来，这就是所谓良心发现。良心并不是一件玄虚的东西，而是实际环境陶铸成功的。一个人住在孤岛上像鲁宾逊那样，就无所谓良

心；住在人群中间，人和人彼此发生关系，从关系上着眼，自然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就是良心。现在日本来攻打咱们，咱们并没有对不起日本，是日本对不起咱们。日本想要夺取的不是某一处地方，是整个的中国；日本想要压服的不是某一个人，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咱们如果不想好好儿过活，那也就罢了，但是咱们都想好好儿过活，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从这些上看，就知道日本是咱们的敌人；而凡是中国人，因为利害相同，甘苦相同，都是咱们的伙伴。同时也知道抵抗敌人是良心，照顾伙伴是良心；反过来，降顺敌人是违背良心，危害伙伴是违背良心：这种由实际环境陶铸成功的良心是无论如何埋没不了的，除非你不是中国人。所以，咱们如果违背了良心，脸就会红起来热起来，觉得受不了；但是王克敏他们明明是中国人，竟把良心埋没了，我不知道他们的良心是什么做的！

你体面一点说，说是为了政见不同，认识各异吧；你坦白一点说，会说是为了个人的权利，妻儿的享受吧；这些理由，在现代中国人的良心跟前，都显得太薄弱了。至于说想救同胞于水火之中，免得大局糜烂下去；那他们自己知道得顶清楚，根本是信口开河，随便胡说。我不知道他们用来自己骗自己的论据究竟是什么！

我很想遇见王克敏梁鸿志汪兆铭一班人，请他们把他们的心赤裸裸的拿出来，犹如没有我在旁边一样，让我看个仔细。我很希望多见多闻的文艺工作者能够写一篇作品，把王克敏他们的心维妙维肖地描写出来，让咱们开开眼界。

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日发表

人　生　观

人生观虽是个不常挂在一般人口头的名词，可是每个人有他的人生观。求田问舍，成名立业，为社会造幸福，为学术界开辟新天地，痛痛快快享受一辈子，辛辛苦苦修炼灵魂的永生，都是一种人生观。若要一一开列，恐怕写满了十张纸还是有遗漏的。

自从咱们和日本打了仗，我就这么觉着，人生观的不同，虽也“各如其面”，可是从今为始，咱们人生观一致了，彼此认定的是相同的一个，就是抗战建国。这并非政府的文告改变了咱们的思想，也并非咱们贪那“爱国”的美名，故意与大家一致，实在因为那是咱们目前唯一的基本的人生观。如果不对准抗战建国下功夫，求田问舍可能吗？成名立业可能吗？就是修炼灵魂的永生的宗教徒，来世的福利还没有把握，现世的生活却已同于牛马奴隶，不是非常难受的事情吗？这样想时，大家自然而然地趋于一致了。

人生观或是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都必然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将士们在前线浴血苦战。运输工人在日本飞机的威胁之下，淌着汗运送军械和货物。征调而来的民工在险峻的山地凿公路，在湍急的河滩开航道。矿工像蚂蚁一样，这里一群，那里一伙，一粒泥一粒泥似地把蕴蓄着的地利衔出来。

学校师生聚集在破庙宇破祠堂里，不管设备怎样简陋，只是往知识和技术的高处爬，深处钻。在这些人的心里，不一定想着人生观的名词，然而他们这样做，不是在表现了那个唯一的基本的人生观吗？

再从另一方面说。在战地，无情的炮火，残酷的敌人，教咱们受着家破人亡的痛苦；在后方，敌人飞机的轰炸，生活费用的增高，也教咱们毁了家产，死了亲人，感着不安和困顿，不能够好好儿过日子。这些都是战争引起的，依理应该怨恨到战争了。但是咱们中间，怨恨这一回抗战，说“如果不要抗战多好呢”的人，竟没有一个！非但嘴上不说，而且心里也不想；仿佛这么想了，就要受良心的责备似的。这可见咱们都认这一回抗战是天经地义，为了它，即使受着顶重大的牺牲，也不该怨恨。这是前面所说那种人生观的消极的表现。

咱们有这样的一致，敌人却没有。咱们非抗战建国，就一切都谈不上，推究到根源，自然而然公认抗战建国为咱们的人生观。难道所有日本人也和咱们一样，非抱着侵略立国的人生观不可吗？他们只要想，不来侵略咱们，原可以好好地做他们的人，过他们的日子，就觉得侵略立国对于他们毫无意义了。他们在战场上，想家，受咱们的攻击，到非常痛苦无聊的时候，必然闪出一个念头：这究竟为的什么呢？当咱们的子弹打中了他们的身体，他们踏在生死交界线上的时候，也必然闪出一个念头：这究竟为的什么呢？在国内，儿子或是丈夫被征调了，事业衰落甚至于停顿了，生活费用增高到不能支持了，那时候，都必然闪出一个念头：这究竟为的什么呢？每一个“这究竟为的什么呢”都是对于侵略立国的

否定。懦弱一点的只把它闷在心里，勇敢一点的就起来反战了。

要推断咱们和日本谁胜谁败，这关于人生观的一点是不该忽略的。

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发表

说话与听话

我常常想，说话的人跟听话的人不宜取同样的态度。咱们经常有许多的话，在口头说着，在笔下写出，说过写过就像浮云过太空，不留一些痕迹，不发生一些影响，就因为说话的人取了听话的人的态度，或者听话的人取了说话的人的态度。

说话的人的态度该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自己也信不过的话，挂在口头说一阵，多么无聊。没有话勉强要说话，想着浪费了的精力就觉得可惜，还不如默尔而息合乎保养之道。尤其是“求诸人”的话，如果“无诸己”，内里空虚别扭，说出来怎么会充实圆融？而且说到要人家怎样怎样的时候，想着自己并没有怎样怎样，脸上就禁不住一阵的红，这一阵脸红比较挨人家的骂还要厉害，又怎么受得了！

听话的人的态度该是“不以人废言”。说话那个人的出身如何，私德如何，何必问他？你又不跟他交朋友，攀亲眷。你就话论话就是了；话没有道理，当然不用听他，如果有道理，尽可以毫不疑虑的照单全收。他的话或许别有动机跟作用，那倒要辨认明白的。可是，别有动机跟作用的话并不等于不值得采纳的话；如果话的本身有道理，你只要辨认出他的动机跟作用，就可以单受他的好影响而不受他的坏影响。

说话的人时时希望人家“不以人废言”，诚实的，充实圆融的，具有压迫人家的力量的话就难得听见了。听话的人随时用“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的尺度来衡量人家的话，就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合，世间很少有值得采纳的话了。现在咱们似乎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中，所以说话很多，实效很少。如果说话的人跟听话的人彼此把态度改变一下，我想，话可以少说许多，而实效可要比现在多得多。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发表

读《蔡孑民先生传略》

这是商务印书馆本年出版的一本书，高乃同先生编的，除了序跋，包含六篇文字：一、蔡孑民先生传略上，蔡先生口述，由黄世晖先生记录的；二、蔡孑民先生传略下，蔡先生口述，由本书编者高先生记录的；三、蔡孑民先生的贡献，王云五先生作；四、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蒋维乔先生作；五、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六、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以上两篇是蔡先生的遗著。口述而由人记录，与自己执笔无多出入；所以一二两篇也可以看作"自叙"性质的文字，与五六两篇同类。六篇之中，自叙占了四篇，此外两篇又比较简短；所以这本书不妨看作蔡先生的自叙传。

像蔡先生这样一个人，真该由一个明澈博通的作者给他作一部详尽精美的传叙，供世人讽诵。可是蔡先生在世时，不见有人动手，蔡先生逝世到现在也已三年有馀，还是不见传叙出世，这本传略，虽然如《编者叙言》里所说，不过"给读者做一个简短的参考"，却也"慰情聊胜于无"了。

现在二十左右的青年，对于蔡先生，大概没有多大印象。但是，四十以上的知识分子，他如果稍有知人论世的识见，他的心目中必然有个蔡先生在。在辛亥以前，或者读了他发表于报纸杂志的论文，或者读了他关于哲学伦理的著译，或者

听见了他参加或主持的团体、教授或创办的学校的消息，蔡先生这么一个人就在意念中有了个轮廓。辛亥以后，他任民国第一任的教育总长，宣布他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说教育“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民国六年，他任北京大学校长，第一天演说即揭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对于北京大学的措施，主张沟通文理，相资为用；包罗众家，使之并存，“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于是北京大学精神大振，人才辈出，到现在，有好些人是社会国家的中坚。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任大学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长，于中央研究院成立各研究所；后来大学院仍改为教育部，他就专任中央研究院长，直到二十九年他逝世。此外他所任的职务还多，可以不说；单凭前面说的几项，至少会有这么个印象：他是给民国教育打基础的人，他是给我国学术开途径的人。如果经常留心时事的话，还可以知道他调停国事，周旋得当，去就之际，极有分寸，以及其他与他有关的事。这种种凑合起来，便见得他是个忘不了的人；心目中便自然而然的有个蔡先生在。

以上只就一般人对于蔡先生的印象说。至于与他接近的人，熟知他的整个生活，不单凭一些文字记载的迹象，所见自然要深广得多。本年五月间，冯友兰先生在重庆《大公报》刊布一篇《跋蔡孑民先生传略》，副题是《蔡先生的人格与气象》。他说蔡先生的人格属于旧日所谓君子的类型。蔡先生的

气象可用子贡形容孔子的“温、良、恭、俭、让”五个字形容之。他说君子率真，可是“发乎情，止乎礼”；“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君子超然物外，可是不必放弃他在社会中的责任，即在日常事为之中，也可以超然物外：蔡先生的生平就实践了这些个。他在末了一节说，

> 我们可以说：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一个人成为名士英雄，大概由于“才”的成分多。一个人成为君子，大概由于“学”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养成底理想人格，由此方面言，我们可以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底表现。

与蔡先生接近的人，未必个个能像冯先生一样说得有条有理；可是提起蔡先生，谁都会想到“君子”两字，而且这“君子”两字必不含有“虚伪造作，无真性情”，“遇事毫无主张，随人转移”，“规规于尘网绳墨之中，必不能如名士之超然物外，潇洒不群”等等意义，如一般人的误解。

青年喜欢交朋友。交朋友的至乐何在？我想莫过于彼此人格的交流。一个人的人格的美质不能分给旁人，可是可以影响旁人；彼此具有美质，彼此互相影响，第一是觉得生命并不孤单，第二，越来越感到“充实之谓美”：这种乐趣，还有什么可以比的？有些人朋友尽多，可是并不觉得怎么乐，那大概由于彼此之间没有人格的交流。讽诵传叙文字，尚友古人，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至乐，虽然古人已去，今人的人格没法与他们“交流”了。青年如果想读些传叙文字，我愿意推荐

这一本书；蔡先生是作古未久的人，即使对他本来生疏，读了这本书必然感到亲近；书中又大部是自叙性质的文字，平实的写下去，没有什么夸饰装点，可是在种种事为之中，自然表现他的崇高的人格。我想青年读了之后，必将有一个总印象：蔡先生这么个朋友是值得交的。

王云五先生谈蔡先生的贡献，可分为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学术方面。政治方面可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部分。直接的是清末鼓吹革命，民元首倡责任内阁，民十四年以后赞助国民革命；间接的是培成五四运动。教育方面可分为行政的，实施的和推广的三部分。行政的是蔡先生当教育总长大学院长时，对于教育的具体方案，都有划时代的革新。实施的是讲学自由与人格陶冶。推广的是赞助白话文运动。学术方面可分为研究与提倡两部分。由研究而得的创见，最显著的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以美育代宗教。对于学术的提倡是除在北京大学促进研究之学风甚著效果外，国立中央研究院之创设与支持，实为蔡先生最大之贡献。王先生这个纲目周偏而扼要，按照着这个纲目读这本传略，就像游览者有了个响导似的。

我在这儿要特别提出一点来说。谁读过这本传略，必然会注意到蔡先生是一辈子在学习之中的，和一般人大不一样。蔡先生在二十九岁以前，做我国读书人惯做的那一套学问。三十岁开始看科学书，三十二岁开始学习日文，三十七岁开始学习德文。四十一岁第一次游学德国，研究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实验心理学及美学。四十六岁第二次游学德国，入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四十七岁游学法国，学习法

文。五十九岁又游德国，在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直到暮年，尚欲研究民族学以终老。请看看上文所记的年岁。蔡先生开始看科学书的“三十岁”，照现在说，该在大学毕过业了，依一般人的见解，大学毕业便是学成业就，往后只待收取功名，再没有什么学习呀研究呀那些麻烦；可是蔡先生在三十岁上才走了学习途程的小半截儿。从童年开始，为学连续到六十多年，到死方休，这样的人，虽不是绝无仅有，至少是超乎一般人的见解以上，非一般人所能了解的。读者如果更仔细一些，又将注意到蔡先生做的都是“为己之学”；他学习这个，学习那个，也可以说无所为；也可以说大有所为，为着一个总目标——充实自己。惟其如此，所学与生活常打成一片。他二十岁以前崇信宋儒，母病刲臂，母丧陪灵，母丧既除而未葬，闻兄为之订婚而痛哭，要求取消。此等举动，就迹象说，当然不免拘迂；可是就精神说，这是诚敬的表现，正是有所得于宋儒。他接触了外来思潮之后，续娶前向媒者提出了“男死后女可再嫁，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在当时颇为骇俗的条件。他怀抱社会主义，而说“夫惟于交际之间一介不苟者，夫然后可以言共产；夫惟于男女之间一毫不苟者，夫然后可以破夫妇之界限；社会主义固在此不在彼也。”这些都和儒家不相干，但既知既行，在践履上见功夫，正是儒家的精神。此外如看出了培养人才为当务之急，便委身于教育；相信了革命的主张，便加入革命的团体，并参加制造炸药的小组；研究了文史哲学各科，便建立注重美育的教育主张，怀抱尊重自由的学术襟怀：他随时学习研究，生活随时精炼与进展。这样的学自然“不可以已”，所以他没有终了，学了一辈子。冯

友兰先生所说“一个人成为君子，大概由于‘学’ 的成分多”，这个“学”字决不指记诵，稗贩，装点门面而言，这个“学”字一定是说“为己之学”，在这儿也可以见出。蔡先生因为学得广博，生活的内涵也广博。蒋梦麟先生谈蔡先生温良恭俭让，具有中国最好的精神；蔡先生过的平民生活，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这又具有希伯来最好的精神：他这些精神都从学问而来。知道蔡先生的人都说蒋先生这个话确当。博学而反乎约，归结到一点，完成一个君子的人格，是冯先生所谓“儒家教育理想”：而蔡先生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具体例子。

读了这本传略，如果想更详细的知道蔡先生的思想言论，可以看《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这部书是新潮社编辑的，民国九年出版，现在归开明书店发售。九年以后的文字，这里没有，当然是缺憾；但在蔡先生全集还没有编成的今日，得此亦足慰情，正如没有传叙只得读传略一样。这部书，就其内容方面与文体方面，多数人推为于青年有益的读物。内容方面说来话长，这儿只好不说。至于文体，全书文言多而白话少，论其类别，不是说明文，便是议论文。现在青年的读物里最缺乏简短的说明文和议论文，无论文言或白话。再说文言方面有的是古书，唐宋八家文，明人小品文，以及著述文字等等，这些都不能帮助青年学习应用的文言。而蔡先生这部集子里的文言，朴实简明，恰合现在的应用；现在报纸上的文言便是这种文言，这是最显著的标准。这儿所说应用，又称实用，是广义的，并不是拟一件公文写一张契券那种意义的应用。许多国文教本采选了蔡先生这部集子里的文篇，就因为蔡先生的文篇可以作说明文、议论文以及应用的文言的

模范。所以，单就语文学习的方面着想，这部《言行录》也值得一读。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发表

电话代公文

看见报上说，最近与蒙巴顿一同到过重庆的陆军中将索姆威尔曾经打破陆军部的传统，用电话代替公文，以求办事迅速。公文要起稿缮写，要投送邮递，改用了电话，这边说出口，那边听进耳朵，当然迅速得多。我倒不怎么赞叹索姆威尔的追求迅速，我只羡慕他有个可以用电话代替公文的环境。

据我们所知，凡是公文，在发文一方面，手续大致是拟稿、审阅、缮写、原稿归档、录由、发出；在收文一方面，手续大致是录由、签拟办法、拟复、归档。归档是双方必不可少的要项，否则你办公事何凭何据，怎么能够报销？只要档卷齐全，纸面上说怎么怎么办了，就是公事都在顺利地进行；至于实际上办了没有，办了之后的实效又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须待“调查员”或“考察团”来过问了。

试问，假如索姆威尔处在这么一个报销主义的环境中，他就是性急如霹雳，能用电话代公文吗？

据我们所知，办公事的要诀是推，就是能够不管的最好不管；由我的机关管，不如让旁的机关管。直到非管不可的时候，当然只好在公文中答应下来；可是答应的话贵在含糊，切忌明确，借此留个后步。以前的幕友，现在的秘书，在“推”

和"含糊"上是有一手的，都是好角色，他们的轶事传为政界的美谈。

假如索姆威尔处在这么一个环境中，他准会打出一百次电话办不了半件事，各机关的秘书先生们对付他，不用多费心思，只消回答他说，"你们来了电话，我们可没有接到你的电话。"假如他发脾气，就对他说，"你不用发脾气，你打了电话，凭据在哪儿？"声音自然是不落痕迹的，接电话又根本没法打"收文戳"，这么一推，保管索姆威尔两脚直跳。

说索姆威尔打破了陆军的传统，可见用电话代替公文，在美国也还是一件新鲜事儿。美国行政界原先的环境是否如我们所知，我不清楚，可是索姆威尔行得通用电话代公文，现在的环境总之跟我们所知不同了。我想，要讲行政效率，需要创造个可以用电话代替公文的环境，报销主义，推，含糊，必然作不到"迎头赶上"。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发表

答覆朋友们

五十岁，一个并不算大的年纪。就是大到七十八十，又有什么意思？七十八十的老人，男的女的，哪儿都可以见到。若说“知非”啊，“知天命”啊，能够办到，当然不错；可惜蘧伯玉跟孔子的那种人生境界，我一丝儿也没有达到。生日到了，跟四十九四十八那时候一样，依从旧例，买几斤切面，煮了全家吃，此外就不想什么。有几位朋友说我乡居避寿，其实不确切；我本来乡居，因为乡间房价比较低，又省得“跑警报”；至于寿不寿，的确没有想起。

承蒙朋友们的好意，把我作为题目，写了些文字，我倒清楚的意识起五十岁来了。大概不会活一百年吧，如今五十岁，道路已经走了大半截。走过的是走过了，“已然”的没法叫它“不然”；倒是馀下的小半截路，得打算好好的走。

朋友们的文字里，都说起我的文字跟为人；这两点，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当然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说我为人平庸，并不是指我缺少种种常识，不能成为专家；也不是指我没有干什么事业，不当教员就当编辑员；却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内，没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脚。这样的平庸，好比一个皮球泄了气，瘪瘪的；假如人生该像个滚圆的皮球的话，这平庸自

然要不得。

像个滚圆的皮球的人生，其人必然是诗人，广义的诗人。写不写诗没关系，生活本身就是诗。如果写，其诗必然是好诗，即使不用诗的形式也还是好诗。屈原、陶潜、杜甫、苏轼、托尔斯泰、易卜生，他们假如没有什么作品，照样是诗人，说他们的作品可爱，诚然不错，但是，假如说他们那诗人的本质可爱，尤其推究到根柢。

为要写些什么，故意往生活里钻，这是本末倒置的办法，我知道没有道理。可是，一个人本当深入生活的底里，懂得好恶，辨得是非，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践如何尽职如何尽伦，不然就是白活一场：对于这一层，我现在似乎认识得更明白，愿意在往后的小半截路上加紧补习，补习有没有成效，看我的努力如何。如有成效，该可以再写些，或者说，该可以开头写。不过写不写没有大关系，重要的是加紧补习。

朋友厚爱我，宽容我，使我感激；又夸张的奖许我，使我羞愧，虽然羞愧，想到这无非要我好，还是感激。最近在报上看见沈尹默先生的诗，有一句道，“久客人情真足惜”，吟诵了好几遍。沈先生说的“久客”是久客川中，我把他解作人生在世，像我这么一个平庸的人，居然也能得到朋友们的厚爱、宽容跟奖许，“人情真足惜”啊！在这样温暖的人情中，我更没有理由不打算加紧补习。

这不是寻常致谢的话，想朋友们一定能够鉴谅。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日作

读了子冈的《怀念振黄》

读罢子冈这篇文字，怅然很久。振黄的死讯，前一个月就有人传来。不能说黔桂路上同类的惨事太多了，我们无妨“不动心”，何况振黄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很想写篇文字哀悼他，拿起了笔又放下，哀感之类是不很容易化为适当的文字的。现在子冈写这一篇，说得很沉痛，想得很远，她仿佛代表我们写了，我们就可以不写了。

振黄在柳州长官部服务，紧急疏散的时候，几次奉命押运疏散车。他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尽可能的帮助文化工作者，给他们乘车的便利，他自己情愿爬在车顶上。沿路还要掏腰包，为苦难的朋友买大饼，买稀饭。最后他从六寨护送妻儿到独山，他自己仍然爬车顶。在途中摔了下来，因为背着背包，背包里的漱口杯磕在他的后脑上，顿时殒命。他的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又怀着快要临盆的身孕，第二天，就在公路旁边产生她的第三个苦难的孩子。——以上的话算是补充子冈的叙述。

子冈与振黄的友谊是由《中学生》联结起来的，而且“一个小圈子就有二十人以上”，而且“似乎谁都不曾对谁失望”。在办了十多年杂志的我们，听到这个话，真比听到奖励话赞美话感慰到十倍二十倍。我们敢不努力吗？我们希望读者与读

者，读者与编者之间，永远保持着“谁都不曾对谁失望”。

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

发表于《中学生》原无标题

“一二三〇事件”

在去年年底的重庆《大公报》上，看见两篇文字，提及所谓“一二三〇事件”。这是东北青年的悲壮故事，值得永远记在咱们心头的。东北青年，大部分是学生，小部分是机关职员，用“读书会”的名义结合起来，彼此传观书籍，联络意志，并作破坏敌伪的工作。同样的组织普及到各大城市，结果被敌伪发觉了。三十年十二月三十日那一天，敌伪在各地同时下手，被逮捕的在一千人以上。直到去年八月间才判定各人的罪名，最重的是无期徒刑，判有期的也在八年以上。一部分人被释放了，其中有些人就辗转来到后方。敌伪特别重视这回事，所以给它定个专名，叫做“一二三〇事件”。

报上的记载原来不很详细，我撮要记在这儿的尤其简略；可是，我想，看了我这儿的简略叙述的，该不至于仅仅用一句口头习用语，感叹的说“人心未死”吧。若说“人心未死”，至少在形迹上见得人心将死或既死。其实人心哪会死，会死的还成什么人心？（汪兆铭之类的心算得人心吗？）沦陷区的同胞在剧苦深痛中过日子，虽不能公开谈说，可是道路之间的目语，私室之间的耳语，都在期望国军早日到来，重见青天白日；至于直接间接参加破坏敌伪的工作的，他们的献身精神跟前线的士兵实在不相上下。所以人心根本没有将死或既

死的形迹。

看了我这儿的简略叙述的，我想，该会觉得这正如记载咱们的自身的事。咱们假如在东北，别的且不说，至少也会是“读书会”的会员，也会遭受敌伪的逮捕，被判无期有期的徒刑，在牢狱中过那凄凉惨苦的岁月；所谓“易地则皆然”，不是很容易想见的情形吗？所以东北青年被逮捕，被监禁，被纳入非人的生活，无异咱们自身被逮捕，被监禁，被纳入非人的生活；这中间没有怜悯的馀地，只有更深的愤恨，更强的奋发。在本刊本期，我写了一篇介绍苏联小说《虹》的文字，中间说“怜悯的时候，往往把自己跟人家分了开来。我是怜悯人家的痛苦的，至少没有受着人家那么深的痛苦；人家受我怜悯，显然可见是境遇远不如我的不幸者；这岂不是我跟人家站在两边吗？现在既然体验到人我一体，我即人家，人家即我，又何从怜悯？”这说明为什么没有怜悯的馀地。惟其“易地则皆然”，就可知咱们跟东北青年实在是一体，并非强为牵合：在他们，精神体魄同受压迫，固然忍受不了；而在咱们，体魄虽不在牢狱之中，但精神上所受敌伪的压迫，却跟他们同样深切，这就来了更深的愤恨。徒然愤恨，谁也知道无济于事；要求撤去压迫，不凭咱们的力量就无从实现。拿出力量来吧，比往日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吧，这就是更强的奋发。

岂但“一二三〇事件”中的东北青年而已，在各个沦陷区中，为了抵抗敌伪，在牢狱中过那凄凉惨苦的岁月的，不知有多少；此外，并不被监禁在牢狱中，而同样过那凄凉惨苦的岁月的，更不知有多少。咱们把这么多的同胞跟咱们合为

一体，就将感觉咱们身上的压迫愈重，要求撤去压迫的意念愈切，而努力奋发也将愈加紧，愈有效。通常说“拯救沦陷区同胞”，其实在这儿说“拯救”不很妥当。说到拯救，自己总占着比较安善的地位，不像被拯救的人那样颠连困苦；跟前面说过的怜悯一样，至少跟被拯救的人站在两边。而咱们跟沦陷区同胞，彼此之间的情形岂是这样呢？沦陷区同胞就是咱们，咱们跟沦陷区同胞合为一体，所以咱们的努力奋发，不为怜悯谁，拯救谁，而为超拔自己。悟得超拔自己这个意味的人，其发而为力量，必然比得上最锋利的武器。

消灭敌伪，争取胜利，主要当然是士兵同胞的责任；但并不限于士兵同胞，人人要超拔自己，就人人都有一份责任。也惟有人人不放弃责任，才能够早日取得胜利。

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发表于《中学生》

关于夏章两先生被捕

夏丏尊章锡琛两位先生在上海被敌人拘系的消息，登载在本年一月二十日重庆、成都、桂林等地的报纸上，是屯溪发出的电讯。当时我们看了，并不觉得太惊异；在沦陷地区，不干汉奸行为、不表顺民态度的人，本来随时有被拘系的可能。不过他们的安危如何，总不免令人放心不下；报上的电讯太简略了，揣测也无从揣测；上海又不通电报，不能打个电报去立即探明究竟；无可奈何，只得提起笔来写信，准备熬着八九十天的长时间，待接到上海的覆信，慰藉心头的挂念。此后，与他们两位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纷纷来问，本刊读者也有来信问起的，言辞之间，私情的成分少，公义的成分多，我们虽不是身处其境的他们两位，也深深的感动。可是我们能够回答什么呢？我们知道的又没有比旁的人多出分毫，彼此都只看见了屯溪发出的那个电讯。约摸过了二十天，报纸上又刊载了一个屯溪电讯，说他们两位放出来了。这对于我们，对于纷纷来问的许多朋友，自然是个安慰。然而详细情形还是一无所知。

直到最近，上海朋友来了一封长信，详叙这一件事情，才算一是一二是二的知道了。我们想，关心他们两位的既然不少，应该在这儿报告一下。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清晨五时光景，有敌宪兵多名去敲夏先生家的门。夏先生问明来由，知道是要他到宪兵部去。临走的时候，关照家中人说，“去向老板（朋友们都习惯地把章雪琛先生唤作“老板”）说一声”。敌人听说，就问老板何人，住在哪儿。结果由夏先生的大媳妇陪同两名宪兵往章家，于是章先生也被拘去。两人先后由汽车载走，两家都有宪兵留守，家中人不得自由行动。消息传出之后，许多朋友托人四处打听，知人在虹口旧德邻公寓旁边的敌宪兵本部，原因大概是个人的思想问题。多人就设法营救，结果似乎不坏，每天都说即可放出。直到二十五日下午一时，两人始由一位朋友用汽车接了出来。究竟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放出，两人还是莫名其妙。大致夏先生的名字已经进了敌人的“黑名单”，章先生可没有，只因夏先生的一句话而被累。列名“黑单”的人，拘禁十天，教你小小受一些累，在敌人原不当一回事。这一次同时被捕的共有五六十人，大多是旧市立中小学的校长跟教职员。拘系时间的生活情形：每天吃冷饭两餐（晨间吃他物），没有饭菜，只有一撮盐，或者一碗酱汤。夜间睡在地板上，每两个人合用三条毯子。许多人挤得紧紧的睡满一屋子，像白铁罐头里的沙丁鱼。大小便以及痰唾都在一个木桶里，木桶放在屋角，其味可想。早晨送来一桶水，大家就桶内洗脸，洗手，漱口。每天要运动几次，所谓运动，就是走马灯式的绕室而行。审问的时间很多，两人在内十天，几乎五天是受审。审问极随便，语气毫无范围，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八一三”前某次文艺家协会开会，夏先生是主席团里的一个，敌人那里有详细记录，出席者的名单，他们也留着，一

一指着询问夏先生。他们知道夏先生能说日本话，要他用日本话回答。夏先生说，“我是中国人，我说中国话。你们有翻译人员，翻译就是了。”他们问章先生是不是主张抗日，章先生说，“这先得问你们的行动是不是侵略，谁都主张抗你们。”夏先生初进去的几天，因为营养不良，曾患便闭，服了药就好了。出来的时候面部略现浮肿，不久也就复元。那时候正值严冬，幸而天气还暖和，两人都没有得什么病。章先生在拘囚中作了三首诗，前两首富于谐趣，第三首却是“庄言”。现在把那三首诗抄在这儿。

日食三餐不费钱，七时早起十时眠。
一瓯香饭搏云子，半钵新茶泼雨前。
汤泛琼波红滟滟，盐霏玉屑碧芊芊。
煤荒米歉何须急，如入桃源别有天。

一日几回频点呼，“噎凄尼散哈凄枯”。
低眉趺座菩提相，伸手抢羹饿鬼图。
运动憧憧灯走马，睡眠簇簇罐藏鱼。
剑光落处山君震，虎子兼差摄唾壶。

执戈无力效前驱，报国空文触网罟。
要为乾坤扶正气，枉将口舌折侏儒。
囚龙铩凤只常事，屠狗卖浆有丈夫。
惭愧平生沟壑志，南冠亏上白头颅。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作

发表于《中学生》

“七七”七周年随笔

最近接到一位朋友来信，说“大局远看则无处不好，近看则看着可虑”。这个话很有意思。盟国必然胜利，日本必然垮台，不但盟国方面知道，就是东条也心中有数。侵略主义打倒而后，国际间相与相处虽然未必全如理想，至少不会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老路，这是所谓远看则无处不好。可是就目前而言，中原大块地方新近沦陷，湘粤战事正在紧急阶段，这还不算顶重要，胜败原是兵家常事，决胜须看最后五分钟；顶关重要的还是在人的态度和习惯方面。

“七七”以后的一二十天间，很有些感慨，曾经作一首《木兰花》，前半道：“落红已看成泥泞，陌上依然风力劲。一天飞絮意如痴，终日驰车何所骋。”后来“八一三”战事继起，感慨消释，就觉得抱歉，我的话似乎冤枉了人家。但是在七年后的今天，又觉得我的旧句子还用得着。一切不好的现象我也不愿说，说起来迹近暴露，触犯时忌，没有什么意思。笼统一句话，如今明明有个共同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不在于朝一席谈话夜一席谈话，不在于横一篇文字竖一篇文章，必须人的态度和习惯彻底改变，昨死今生，大家革自己的命，才有可能；而多数人的态度和习惯，似乎越来越不对了，不但新机不见，而且旧染更深，岂不大大的可虑？

说可虑不就是悲观。这并非强嘴，是事实上不需要悲观。经过这一回战争，谁都得脱一层皮，换一副心眼儿。这番功夫大家自己来，省麻烦，节约人力，自然最好。自己来不成，可是现实的鞭子拍拍的抽下来，逼得你不得不勉强对付，那就差多了。至于勉强对付也办不了的，将会在现实面前倒下，像雪人遇着了阳光。倒下来的越多，麻烦也越多，人力越浪费。然而就整体看起来，脱了一层皮，换了一副心眼儿的人站住了，自然是进步。这又何所用其悲观。

我一向相信多言无益，对于近时，尤其觉得言谈太多，实效太少；现在写些零星想头登在报上，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只因编辑先生再三嘱咐，不好违命，就勉强写了。

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作

革自己的命

间社秉仁先生的文篇，开头叙述他最近遇见的两个青年朋友，彼此的志概跟行为都极端相反，他接着说，“这是个多么显明的对照！”这种对照不只存在于青年界，其他各界都一样。政界、军界、学术界、工商界以及其他，有通达大势，力求前进，一心一意记住国家民族的人物，同时也有短见浅识，言行反动，随时随地妨害国家民族的人物。前一种人物当然是咱们中国的元气，当前的抗战，从当前以至将来的建国，都靠在他们身上。后一种人物却是咱们中国的病患，病患不除，完全健康的希望就无从实现。两种人物同属于一个国家民族，好比同载在一条船上的乘客，到达目的地或者沉没在中途，彼此同其命运。可是后一种人物没有认清这种关系，前一种人物在向前推进，他们却在向后拖住，力量抵消，结果是不进。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事，即使他们并没有故意向后拖住，但是实际上不推进就是拖住。并且，国家民族是彼此共同的，把推进共同的国家民族的责任偏颇的放在前一种人物身上，干起来就很吃力，而且成效决不会圆满。因此，后一种人物非要他们蜕一层皮，换一副心眼不可。这里说“要他们”，不一定由谁来强制他们，他们自己也可以使自己蜕一层皮，换一副心眼，只要他们的识见开扩些，习惯改善些。而且，惟

有这样，最可以减省麻烦，节约人力。

人之相去，大致不远，两种人物的判别，扼要的说，只在"公""私"二字。认识群体，知道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领悟群体的力量最为强大，一切作为，惟有合着群体的力量去对付最为有效，这样的人不必勉强求公而自然能公。只见个己，把个己范围在一身一家或者一个集团的小天地里，一切作为，单就一身一家或者一个集团的利害上打算，这样的人虽然口头说"公"，笔下写"公"，实际上总不免于私。前者发而为行动，就是守职尽分，努力于抗战建国，拥护民主，争取自由，推广到世界的范围，就是扑灭法西斯主义，建立集体安全的世界新秩序。后者发而为行动，就是囤积居奇，贪赃枉法，独裁专横，侵犯他人的自由，发展到极点，就是咱们正在敌对的侵略主义。二者相去很远，本质迥乎不同，但是根究到底里，不过是一方面能够为公，一方面只顾为私。

无论古今，所谓道德教条没有不崇公而斥私的。那些只顾为私的人，如果他们曾经接触过道德教条，一定也能说出为公的好处。可是他们在实际上只顾为私，根据"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说法，可以认为他们的知只是未知，能够说出为公的道理跟好处，只是空口说白话，装点门面罢了。也可以认为他们的知给切身的利害蒙蔽了，给一般的风气笼罩了，不能转化而为终身以之的行为习惯，所以知跟行甚至背道而驰。但是，无论如何，为私的行为必须绝迹于世界，是无可置疑的。时代是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局势是全世界为公的力量集合拢来与为私的力量搏斗，在这当儿，为公决不能只是口头跟笔下的道德教条，而必须是从今以后人人必须终身

以之的行为习惯。就小范围说，一个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的取得，就大范围说，整个世界的集体安全的确保，都生根在人人具有为公的行为习惯上。为私的人必被打倒，必被扑灭，例如日本军阀与希特勒。就是稍稍为私的人也不容于今后的世界，因为世界是个大公的群体。

现在大家侈言革命，革命的事，不在口说，在乎实践。知道为私将不容于今后的世界，就得彻头彻尾，昨死今生，革自己的命，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蜕一层皮，换一副心眼。这不是口头和笔下的事，也不只是意念方面的事，最要紧的是改变为习惯，排除那种种属于为私的，养成那种种属于为公的。说到养成行为习惯，必须在最微细最平常的场合入手，积渐功深，遇到不微细不平常的场合也自然而然能够为公。公家的信封信笺硬是不写私信，买什么票上什么车船硬是遵守秩序，这些事似乎无关大体，但是成了习惯之后，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至于贪污，不至于侵犯他人的自由。这样革自己的命不需要流一滴血，当然牺牲不了什么生命，可是革命完成的时候，将会看见个全新的自己。为私的那个自己死去了，新生的是这个为公的自己。这个自己比以前充实得多，快乐得多，即使退到为私的立场，惟有为公，才成其为私，因而也实在得多。那么，为什么不从今为始革自己的命呢？如果自己不愿革，懒得革，而为公已是当前的大势所趋，非此不可，那就将被革于现实，被革于他人，这其间就不免生出若干麻烦，消耗若干人力。虽说如此，今后的世界仍将是人人为公的世界。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三日作，发表于《中学生》

据理论而言

最近某大学招考新生，国文作文试题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论》。很有些应试的同学解错了题目，作出来的文字牛头不对马嘴，传说开来，大家又攒眉蹙额，认为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又得了个实证。其实这未必能算什么实证。高中毕业，不一定读过《国语》里那篇厉王止谤的文字，是一。什么"甚于什么"的句式，在熟习文言的人自然易于相机解悟，遇到这一句，就会领会"甚于"的意思是"其危险甚于"，但对文言不大熟习的人就办不到，是二。所以，毛病还在于出题目的先生太喜爱引用成语了，如果换个《言论自由论》或者什么，意思差不多，应试的同学作出文字来，该不至于牛头不对马嘴吧。

现在不想多谈作文试题，只想就"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话说说。周厉王施行暴戾的政令，引起了国人的诽谤。大概周厉王自己并没有听见外面的那些诽谤，忠心耿耿的邵公就告诉他说，"外面诽谤流行，可见民不聊生了。"厉王不是什么圣王，自不免与一般皇帝同样脾气，只知道责备人家的错处，不知道反省自己的错处。他觉得国人的胡说八道，实在迹近捣乱，就叫卫巫检举那些诽谤的人，一律杀掉。诽谤果然停止了，民间是一片沉默。厉王快活之极，不免向邵公

夸耀他的有办法。邵公却更着急起来，说了一大篇话，他的要旨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邵公这个话，明明是为厉王着想的。他的话仿佛这么说，你厉王做的有如阻挡河流的工程，一朝河水溃决，会把你一切都淹掉冲掉，也就没有了你。所以这个办法，在你最不合算。你要避免这样大的损失，只有换个聪明的办法，也就是合算的办法，"宣之使言"。可惜厉王让不知什么东西迷了心窍，没有听从邵公的忠谏，结果是"三年乃流王于彘"。

按史家的说法，这到底是上古时代的故事了。至于现在，什么法西斯主义，什么纳粹政治，已经激动了人类的公愤，人类正在竭尽了智慧，牺牲了生命扑灭它们，因为如某先生所说，民主制度在今天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人生哲学。据理论而言，现在不会有"防民之口"的厉王了；试想，在民主制度之下，谁的口要谁防？谁的口容谁防？据理论而言，现在也用不着说什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话了；试想，既没有厉王那种角色，又为谁着想，对他进这番忠谏？这儿还得重说一声，以上是据理论而言。

在民主制度之下，除了触犯刑法的言谈而外，无所谓诽谤。大家开口说话，动笔写文字，如果涉及公众的事，积极方面无非是建议，就是说这件事应该这么办；消极方面不外乎指摘，就是说这件事不该这么办：都不是诽谤。就动机而言，建议显然是希望把事办好；指摘虽然有破有立，也出于一腔认真的心肠，希望把事办好：都和徒然抱怨徒然泄愤的诽谤不同。民主制度的时代该是诽谤绝迹的时代，因为大家是和衷共济的一伙儿，其中没有个厉王，自然没有那些诽谤

的国人。——这又是据理论而言。

在和衷共济的一伙中间，建议和指摘都该是大家乐于听闻的。大家正在寻求最好的办法，有个建议提出来，也许就是那最好的办法吧，自然竭诚欢迎。大家又在检点彼此的错失，惟恐不自觉察，群己双方都吃了亏，有个指摘提出来，也许正中那错失的要害吧，更将虚心听受。在这样情形之下，是何等美善的境界啊！人与人之间，联系着的是情，是天下一家的情；人与人之间，联系着的是理，是惟求至当的理。社会的进步与康乐，当然不待细谈。

决不会有人讨厌建议。讨厌建议的人往往是包办一切，师心自用的人。他以为他的办法是至美尽善，无可更改，谁对他建议，就等于说他的办法欠美欠善，这是卸他的招牌，拆他的衙门，他所不能忍受的。在民主制度之下，谁也不能包办一切，谁也不容师心自用，当然没有人讨厌人家的建议了。

决不会有人讨厌指摘。讨厌指摘的人往往是身有惭德，胆怯情虚的人。他明知自己有若干缺点，可是利害观念限制着他，既鼓不起改革的勇气，又希望遮遮掩掩，不要让人家知道，即使做不到不让人家知道，总望人家不要挂在口头，当面给他个难堪；而所谓指摘刚刚与这种意愿相反，所以他情不自禁，不能不讨厌。

在民主制度之下，大家办的是公众的事，计较利害也只有公众的利害；个人自不能绝对没有错失，但出发点既在公众，也就“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无妨公开。家丑不可外扬哩，授敌对者以可乘之隙哩，在这儿都无须乎顾虑；因为跟

在后头的是“更也人皆仰之”，错失纠正过来了，“丑”就转而为“美”，即使有什么敌对者也就无隙可乘。情形如此，还有谁讨厌人家的指摘？

在民主制度之下，非但无所谓诽谤，也无所谓争取言论自由（分开来说，就是建议自由与指摘自由）。打个譬方，如今世界上，无论穷的富的，村的俏的，总算都能够吸收到他所需要的一份空气，也就无所谓争取呼吸自由。有人嚷着争取言论自由，就证明其时行的不是民主制度。至于有人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话，其时行的当然更不是民主制度。就是喜欢翻案立论的史学家，大概也不会说周厉王当时行的是民主制度吧。

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作

慰念贫病作家

国人一般的健康水平本来就不高，作家们因为用脑子，少运动，营养欠良好，忧国怀乡的感情比一般人敏锐强烈，身体更坏。这个情形，战前已经很严重，到了抗战的第八个年头，简直成了岌岌不可终日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用善意关怀我们的英美友人都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盛衰，国运的隆替，都系于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因为文盲特多，公职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包括工程师、会计师、律师、记者等）对于国家的贡献和影响尤其大；现在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已经憔悴，消瘦，生病，甚至于死亡。说得具体一点，专靠薪金过日子，而又没有枉法经商、旁行斜上的正常阶层，都已经挣扎得很吃力，油干灯熄，等待着那个并不遥远的末日。从他们本身来说，容或是求仁得仁，不以未发国难财而引为遗恨；从国家的立场来看，这个损失未免太大，情况也实在太可虑了。

贫病作家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敬重他们，安慰他们，给予物质的精神的帮助，当然是无可非议的。援助贫病作家的运动，行将继重庆之后，在成都开展，我们除了无条件地赞同以外，还想贡献两点平凡的意见。

援助他们，是出自我们良心的呼吁，他们并没有请求，不

可有丝毫施舍怜悯的念头杂乎其间。其次，援助他们的责任，应该由全社会负责，达官大贾，尤其应该特别出力。专靠小贫小病的作家去援助大贫已病的作家是绝对不够的。除了心里的疙瘩，不存在一个做善事的念头，然后向广大社会大声疾呼，普遍深入，才有成功的希望。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以读者名义发表于《新民报晚刊》

援助贫病作家

关于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本月三日的本刊有署名“读者”的一篇《慰念贫病作家》曾经谈到。那位先生提出两点意见。一点是无论谁捐款援助，是出于良心的呼吁，不可有丝毫的施舍的怜悯的念头杂乎其间。又一点是援助的责任应该由全社会相负，专靠小贫小病的作家来援助大贫已病的作家是绝对不够的。这两点意见，作者自谦是平凡的，其实可贵。

一个人对旁的人最要不得的是冷漠。冷漠就是无视旁的人，除了自已之外，不见其他。其实就是小说中的鲁滨逊，也还有个礼拜五跟他打伙结伴。人注定是群性的动物，无视旁的人不用说是违反本然。进一步是怜悯。怜悯是把旁人放在眼里了，可是，不免把自己和旁的人分站在两边儿，你过不去，我过得去，你痛苦极了，我还逍遥自在，这么想下去，帮助点儿自然脱不了施舍的念头。这种念头为什么不好？就在乎此疆彼界，领会不到大众一体的那种境界。人家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大众的康乐才是我的康乐；这并不是希圣希贤的人的专业，在民主制度的现时代，谁都得躬行实践，不然就不成其为民主制度。“读者”先生特别指出，援助须摈弃施舍的怜悯的念头，真是“乐与人同善”的襟怀，我极端赞同，极

端钦佩。

第二点援助的责任该由全社会相负，也是卓论。在广大的社会里，陷落在困苦之中的岂止作家，简直是各界都有，而且就数量来说，其他的人比作家多得多，不过我们文协力量微薄，只好以援助贫病作家为限。我们把募款的事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其意正如“读者”先生所说，想请全社会来担负这个责任。中间也附带含有一些愿望，想促起全社会的注意，在援助贫病作家以外，对于其他人也作同样的援助。至于这个运动的本身，就我们听见的看见的而言，热烈赞同的占极大多数。偶尔也有些非难的论调，见仁见智，本是各人的自由，我们不想辩驳。我们只看慷慨捐输的人多或是少，来判定我们这个运动在社会心理上发生反应的大或是小。

在这儿代表成都文协分会报告一声，捐款定在八月底截止。各界同情这个运动的，捐助或多或少，无不竭诚欢迎，恭敬领受。结束以后，将在报端详细报告，使大众共知。收到的款项，将汇交重庆文协总会。这个运动原是总会发起的，成都分会是响应总会的号召。还有一点，承蒙《新民报》的盛意，代收这项捐款，各界诸君如果遇不着募捐人，把捐款交于《新民报》，掣取收据为凭。

一九四四年八月六日发表于《新民报晚刊》

暴 露

暴露，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不得。

通常说的暴露，该不与揭发阴私、攻击个人同其意义。至少在文艺家的心目中，他涉想的对象是整个的社会，社会若有什么毛病，经他看出来了，他就像医师发现了人体的毛病一样，不能不宣告出来。这就是暴露。在宣告出来的当儿，他也许连带提供治疗的方案，也许只指出毛病的迹象和根源，让大家来研讨治疗的方案。无论如何，他的暴露是存着一腔悲天悯人的心肠的。

《诗序》解释个“风”字说，“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我以为正好移作暴露的解释。就动机而言，或者就后果而言，暴露都不犯刑法上的罪名。这是所谓“言之者无罪”。暴露出来的那个毛病，犯着的也许是我，也许是你，也许是咱们一伙儿。不知道有毛病，当然不着急，谁听说有毛病，谁就会提起神来，想尽种种方法，务必去掉那毛病。这是所谓“闻之者足以戒”。

刚强磊落的人如果犯了什么毛病，该不怕暴露，因为他惟恐自己有毛病，暴露正可以使他迁善改过。“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见《孟子·公孙丑上》)，就是为此。民胞物与的人自己不犯什么毛病，就也不会厌恶人家的暴露，因为他有己

溺己饥的胸襟，从人家的暴露中间，他可以知道那“溺”与“饥”的底细，当然只有欢迎，不会厌恶。我们读了历代的描绘时弊的好作品，不免慨然深念，也可以算个例证。虽然我们不至于这样狂妄，便自认为民胞物与的人。

厌恶暴露的人似乎可以推阿Q作代表。阿Q头皮上有几处癞疮疤，当然是缺点，可是没法掩盖，他就发明了个“讳”字诀，“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一切厌恶暴露的人的手段离不了阿Q的方式，讳，对于犯讳的骂或者打。

代阿Q设想，你嫌头皮上癞疮疤难看，就该去找美容院的技师想办法，或者换上一块头皮，或者栽上一些头发。你不这么干，即使“讳”字诀克奏全功，可是癞疮疤依然存在，未庄的人谁不看见？

遏止了暴露，就以为天下太平，社会美满，那是愚人的想头。杨震回答纳贿的对手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后汉书·杨震传》）这个话最为通达，其意就是俗语说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暴露的文字和言语可以遏止，可是事实既经成立，就不容抹掉，也就无法教人不知道。事实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最有力的暴露。

至于文艺家，他并不是新闻记者，他的责任原不在报告事实的种种迹象。不过他看见了不如意的种种迹象，因他的理解与怀抱，不由不悲天悯人，由近思远。于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他观察所得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来。虽然厌恶他的

人就将跳起来说："这是暴露啊！要不得！"或者更用什么力量来遏止，他却宁可惹人家的厌恶，在遏止得最凶的时候宁可搁笔，决不肯违心地说些吉祥言语，讨人家的喜欢。假如违心地说些吉祥言语，讨人家的喜欢，他就是清客，是帮闲，不成其为文艺家了。

真正到了天下太平、社会美满的时候，表现在文艺家笔下的自然气象全异。但在从现实的迹象取精去粕，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来这一点上，还是没有两样。依广义而言，那也未尝不可以叫做暴露。

粗浅地打个比喻，暴露犹如镜子的现形，是美是丑，在乎事物本身，不关乎镜子。

暴露，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不得。

一九四四年八月四日作

“八一三”随笔

当年“七七”事起之后，如果不接上个“八一三”，说不定只是个地方事件。这不是当时激昂的民气所能容受。“八一三”炮声一响，“八一四”我空军出动，仗才算是打定了。单说我自己，我被冲激在那股民气里头，在苏州看见报馆发出的号外，虽不免有些惘然，但是再一想时，就来了“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的成语。你主张跟日本打仗，如今真的打起来了，还有什么惘然的？颠沛流离，挨炸挨烧，是你的本分。尽你的绵薄，使仗打好，更是你的本分。可惜想想容易，实践却难。二十八年在乐山遇炸，把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只剩下幸而没有受伤的老幼七口。在不可计数的受难同胞中间，我分享了一份苦难，贡献了一份牺牲，对于前一项本分，我总算尽了。可是，后一项本分呢？实在惭愧，竟没有尽得分毫。住在后方的大城市里，编些无多精彩的刊物，写些不痛不痒的文字，你就交代得过了吗？不，不，绝对交代不过。不想起这一层也罢了，想起来时，不说假话，真有些无地自容。因此我决不敢憎恨战时生活的困苦。就是这样困苦的生活，已经便宜了你了，你有什么权利要求较好的生活？

据一般人说，我国这回抗战是具有革命性的。反抗侵略，争取独立自主，建立真正民主化工业化的国家，所谓革命性

大概指的这些个。那么，以不变应万变虽是最高原则，实践起来却不能不见事行事。仗一定要打到胜利为止，建国大业非完成不可，那是不变。至于封建习性，胡涂头脑，官僚政治，独占经济，还有其他种种，如果也是个不变，那就完了。那些个不变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即使幸而打胜了日本，又有什么好处？变吧，革命吧，该死的赶快死去吧，新生的赶快成长吧。

我所知不广，所见有限，根据我的狭窄的知和见，不免时时愁虑。大家喜爱侈言革命，可是只限于挂在口头，实际上是懒得革命，尤其是懒得革自己的命，懒得见少数的旁人真正革命。这样的不变应万变太可虑了，我想不出补救的办法（我不能不想，虽然没有人要我想）。有些人读熟了曾涤生的《原才》，希望有“一二人”出来开创风气，在报纸上，这样论调的文字登过许多篇。可是那“一二人”始终姗姗其来迟。照我的笨想头，恐怕只有大家一旦灵心忽通，决意革自己的命，才有希望。否则现实板起铁青的面孔，迫得你非革自己的命不可，大家也该会不情不愿勉勉强强的革起自己的命来。除开这两条路径，大概只有个彻头彻尾的以不变应万变。

旁的人我管不着，我管我自己。我不想做那“一二人”，我没有那么狂妄，可是我要革自己的命。好好先生要不得，我不敢说要有所为，只能说要有所不为。我有言论自由，我要享受那个自由，见到什么就说什么，不想畏首畏尾，当然我也决不故意触犯刑法。我若管公家的钱，决不检一个钱藏在腰包里；我若管公家的事，决不“等因奉此”，摘由归档，就此了事。这么噜噜嗦嗦说下去太琐屑了，请即打住。也许有

人要笑我，这也算革命吗？并且，你能不能实践又有谁替你证明？的确，无从证明，发誓又近于迷信，我不愿发誓。不过我真的要照说的做。其他并无希图，只希图这么做了，稍稍减轻几年以来，没有尽前面所说那后一项本分的惭愧。

一九四四年八月五日作

扩大白话文字的地盘

白话文字推行了二十几年，在文艺的各部门里最见顺利，写作些什么，谁都用白话。虽然还有些人吟诗填词，在“雅集”的时候分韵和韵，只不过是小圈子里的“风雅”勾当，跟一般社会可以说没有多大关系。其次，杂志文字大多用白话，报纸的社论跟通信也是白话居多，文言少见，这个现象也可喜。在目前，白话文字不再是少数人提倡的新鲜花样，它已经跟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纠结在一块儿了。

可是有人说过，白话文字要在现代中国立定坚实的根基，必须占领了所有文言的地盘才行。必须使大家眼睛看到的文字，凡是现代人写的，叙述现代的事物的，没有一篇不是白话，白话文字这才跟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真的纠结在一块儿。这个说法假如不错，就觉得推行还得加紧。公文告，团体函启，各业广告，以及报纸上的电讯跟记事，现在还是用文言的多，用白话的少。白话文字应当赶紧占领这些个地盘。

我们要推行白话文字，第一，为它通俗易晓，一般人都能了解。第二，它适切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在发表的人跟领受的人之间，不致因文字上的阻障，发生彼此不相应的弊病。这些都是早年就反复说过了的话，不必再谈。还有一点，语言文字决不仅是纯粹形式的东西，某种形式装不进某种内容，

某种形式带来了某种内容，是常见的事儿。就文字说，因为现在生活内容的改变，日用语言逐渐的精密化了，只有照语言写下来，才可以不折不扣。你如果勉强写文言，就得打折扣，不然就不成其为文言。这就是说，你决意写文言，跟着就会来一套文言的腔拍，这东西绕着你的笔尖，挥之不去，结果是或多或少转变了你原来的意旨。在这篇短短的文字里，不便举出些实例。想来留心语文的朋友一定有同样的感觉，也不必举什么实例。总之，就写作的人方面说，照写语言是唯一的途径。关心语言前途文化前途的人应该鼓励所有写作的人一齐赶上这条途径。

我常常想，我们写些文字发表出去，谈些什么固然对人家有影响，同时用什么文体也有教育人家的作用。我们既然认定白话文字是写作的唯一文体，就得随时随地使用白话，发表一回就是一回教育。这样存心的人多起来，风气就会造成，白话文字的地盘就会比现在广大得多。

公文恐怕暂时还不会改用白话。这跟"官僚政治""公文行政"有关系。在"官僚政治""公文行政"之下，文言是极适用的文体。团体函启应该可以改，只要那团体的人想到了这其间的教育作用。前些时候重庆许多朋友联名发表文书，请求废除图书审查制度，写的文言。我看了觉得朋友们未免疏忽了些，在这种场合是尤其需要写白话的。广告文字，旁的行业且不说，至少书业界的书籍广告应该写白话。书业界不是老把促进文化的话挂在口头吗？至于报纸，现在重庆有一种报纸已经通体用白话，这是个大进步，旁的报纸可以仿效。通讯社发稿，访事员撰稿，其实也没有不能用白话的道理。他

们用了白话，报馆里就省事得多，不必做那“文翻白”的无聊工作了。

我们希望，第一，白话文字的地盘尽量推广；不限于文艺，不限于著述，不限于报纸杂志的部分，凡是宣露在公众面前的文字都用白话。其次，希望大家努力追求写出纯粹的白话，不要“文翻白”，不要把文言腔拍作骨干，换上些“的了吗呢”，需要活生生的上口的语言，有这么些人在这么样说的语言。有人说，目前写文字应该向大众学习，这个话极有道理。向大众学习就是向各地方各种人的口头学习。各地方各种人用语言表达他们的意思跟情感，有糟粕也有精华。写作的人鉴别过后，取其精华，用进文字里去，那文字就见得血肉丰盈。又纯粹又丰盈的白话文字似乎还不多见，我们大家应该在这方面努力。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六日作

纪念辛亥革命

在今年，纪念辛亥革命特别有意义。

就全世界而言，纳粹德国势穷力蹙，一般观察认为今年有被打倒的可能。法西斯日本经美国海空军的进攻，太平洋上的外围防线已被突破，它的本土又将越来越厉害的遭受超级空中堡垒的轰炸，它必然从逐渐削弱直到完全崩溃，命运已经注定。德日的溃败是民主世界的胜利。这个胜利不是个空名儿，是确确实实有若干人在受压迫被奴役的境况中解放出来，享受了自由权利的。

就咱们中国而言，今年是宪政运动蓬勃的展开的一年，从种种的迹象看，跟前清末年的希望“预备立宪”固然大不一样，跟民国以来的几次宪政运动也很有差别。目前咱们同胞所追求的民主主义，是跟世界上最进步的政治理论相应合的，他有新的内容，也真正可以增进大众的福利。这并不是咱们突然聪明了起来；只因咱们历尽了艰难，吃尽了痛苦，从现实中得到了教训，在逻辑上达到了结论，自然而然，以为非如此不可。等待人家施与的东西未必真个到手；自发追求的东西终有到手的一天，只要用了全力，而且始终不懈。将来真正的民主真个到了手，今年自然是值得记住的一年。

辛亥革命的目的是民主。但是经历了三十多年，咱们没

有得到民主。这其间原因何在，是研究现代史的人的一个最急要的课题，同时也是每个关心群己生活的人的一件必须考索的事项。研究下来，考索下来，在民主主义风靡了全世界同时也蓬勃的生长在咱们中国的今日，咱们会得到真正的民主，达到辛亥革命所没有达到的目的吧。所以我们说，在今年，纪念辛亥革命特别有意义。

最近听见两句平凡的话，就是"人当人待，事当事做。"这两句话虽然平凡，我们却以为已经道出了民主的真谛。在这两句话里，前面的"人"字跟"事"字是泛指；后面的"人"字跟"事"字可不然，都含着合理至当的意味。"人"是人权完满无缺的人，包括被尊重跟自己尊重；"事"是处理得十分妥帖的事，包括进行的程序跟预期的效果。无论什么人被待跟自待都当个"人"，还会有被欺侮，被压迫，乃至自暴自弃，为非作歹的情形吗？无论什么事进行跟责效都当件"事"，还会有敷衍文饰，虚应故事，搞了好久，依然老样的情形吗？民主的涵义，细说起来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可是简单扼要的说，也不过要真正做到"人当人待，事当事做。"这是小孩子都能了解的。然而也是如今还没有做到，咱们从生活中体验到，非赶紧起来争取不可的。争取的原因并不在乎"民主"的名目怎样好听；却在乎"人当人待，事当事做"之后，咱们的生活才算得上"生活"，咱们的社会才走上进步的道路。惟其如此，咱们今后的争取不能不死生以之；凡是顺应这两句话的，咱们都要推动，卫护；凡是违反这两句话的，咱们都要阻遏，反抗；直到完全实现了这两句话才歇。

争取民主是人人自己的事儿，不容谁替谁包办，也不容

放开不管，躲在旁边看人家争取；如果如此，民主一定到不了手，因为这事情根本要大家通力合作的。从前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个“达”字，一个“穷”字，指受不受统治者的知遇而言。如今咱们既然要争取民主，统治者只是咱们的代理人，无所谓受不受知遇，也无所谓“达”跟“穷”；所以这两句话全不适用。在如今，群己的关系太密切了，不“兼善”就无法“独善”，即使你但求“独善”，也必须通过了“兼善”才成。这就是说，争取民主，人人要尽全力，为了自己，也为了大众。辛亥革命到现在三十多年，咱们还没有得到民主，不能不责备咱们自己太不“兼善”了。不“兼善”的结果，连“独善”也做不到；这不必举什么例，各人身边都有多多少少的证据。从今咱们要完全改变以往的作风，抱定“兼善”的宗旨，争取真正的民主。

一九四四年十月五日发表

论“长官认错”

在第三七七期《国讯》上读到张云峰、史志敏两位先生的通信，他们都谈到行政长官在参政会里认了错，以后就没有明白的下文，不免使人惶惑。行政长官在参政会里认错，确是今年的新花样，有些人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就起了珍爱之情，很说些赞扬的话。其实认错了所以可贵，在乎跟在后头有改过的一步。不讳言自己的错失，见得磊落光明；跟着改正自己的错失，见得精进不懈：这才是大丈夫行径。若是见对方来势不佳，四周环境欠好，逼不得已认个错，讨个安稳下场，这就是阿Q精神，毫不足取，值不得加以赞扬。

史志敏先生提起“长官们的认错，查办，究竟是良心上的觉醒呢，还是技术上的进步？”我认为这可以不必考求，考求了于事无补。咱们急须追问的是：他们干事干坏了，负不负道德上跟行政上的责任？往后干下去是不是再要错？这儿的前一问是究及以往，后一问是究及未来。倘若回答说不负道德上跟行政上的责任，那不行。或者说干下去保不住再要错，也不行。行政官是什么？无非是民众的代理人，他们代替民众处理种种公共事务，他们不能够作这样毫没有道理的回答。咱们也不要他们作口头的书面的回答，咱们要看实在的施为。实在的施为才是真凭实据，口头的书面的话语尽可

以说得好听而不兑现。

可惜参政会诸君没有作这样的追问。我觉得参政会里的提案太多了，其中很有些近乎迂阔无当。若是通过一个提案，怎样使行政官员负起已往错过的责任，并且保证未来不再有错失，那倒是扼要的办法。现在参政会里没有这样的提案，也不要紧；咱们可以发动舆论，务须使行政官在认错之后有个明白的下文。言论自由是咱们的权利，要说就说，不要顾忌什么。公共事务不是闲事，该管就管，不要存心姑息。大家这样做，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咱们的代理人遇着这股力量，自会渐渐学好。

现在政治的腐败，是继承着历代的官僚政治而来。现时官僚管理的事务更多，方面更广，所以腐败得更利害，几乎超过了以往各代。咱们把行政官看作咱们的代理人，这是民主政治的看法，是与官僚政治绝不相同的看法。看法变了，没有什么实益，最要紧的是实际上也完全变过来。要实际上完全变过来，当然不很容易。按说早就应该变过来了，可是因循复因循，一直到今天，这不能不责备咱们自己的懈怠。现在敌人内侵更急，豫湘桂各省连遭挫失，在惨痛愤慨之中，追索主因，才觉悟官僚政治必须消灭，民主政治必须建立。这好像迟了些，可是并不迟，只要咱们真有力量。“我欲仁，斯仁至矣”，咱们要民主政治，没有谁能够阻挡的。

一九四四年十月四日作

原题为《怎样铲除贪污》

双十节随笔

辛亥革命标榜的是民主共和，到如今三十三年，只不过挂了一块招牌，大家还在呼号咱们需要民主。可见三十三年是白过了，大家没有下什么功夫。不下功夫，却想要收获，那样的便宜事儿根本就不会有。现在的呼号，比较辛亥那时候是深切得多了。大家眼看着当前战事的挫失，心系着此后建国的艰难，查究到根柢，剥落到核心，才知道成败的关键在乎一切施为是否民主。而且，世界上民主思想进步了，单是政治民主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必须兼包经济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这种见解咱们也具有，咱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民主。在辛亥那时候，大家茫茫然，决没有想得这么着实，所以说，现在是深切得多了。今年纪念辛亥革命，我认为这一点是值得提出来说说的。

很有人担心我国不会实现真正的民主，所持的论据很多，贪赃枉法、仗势欺人的事随处都是，不是距离民主太远了吗？我可不这么悲观。只要大家造成民主的风气，养成民主的习惯，那些卑污荒唐的人物也会“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最要紧还在“大家”二字，大家之中如果缺少了你或是我，这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大家，这就减弱了若干分之一的力量。所以我也不能放松，你也不能懈怠，务须使大家真成个完整的大

家，表现出来的是顶充足的力量。

最近我到重庆去，重庆的一切没有使我心慰的。只有一件事，我颇为欢喜赞叹，以为从这上头可以看出我国实现民主并不是没有希望。那就是公共汽车乘客的排队候车，挨次上车，此外在电影院买票，向挑水夫买自来水，大家也养成了排队挨次的习惯。可是洋洋大观到底要数汽车站。单行的人沿着人行道排过去，靠着拐角儿拐弯，有时候多到一两百，后到的人安安分分站在末梢儿，没有一个抢先插进中间去的。如果有一个人硬要插进中间去，我想，整个行列的人都会吼起来，说他不依规矩，不懂道理。这种好风气好习惯，全靠所有的人一致维护，虽然一致维护而实际上行所无事。候汽车上汽车自然只是件小事，如果推广开来，大家对于一切的事都有这样的好风气好习惯，真正的民主不就实现了吗？所以我说我国实现民主并不是没有希望，问题就在大家能不能造成风气，养成习惯。

一九四四年十月六日作

冲破那寂静

一片可怕的寂静。

寂静为什么可怕？因为寂静邻于死亡，有时候也许就是死亡。身体死亡了，在尸躯本身无所谓可怕；看见尸躯的人也许觉得可怕，然而这只是原始的恐惧心理，仔细一想，也就没有什么可怕。唯有身体机能还存在，而精神已经死亡了，才是真正的可怕。说他死亡，明明没有死亡；吃啊喝啊，一切照常。说他没有死亡，又明明死亡了；活着而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该怎么活着，一切没有根，没有源，只是飘飘浮浮的，像个虚幻的影子。这种不死亡的死亡，如果本人觉察出来了，势必大叫起来，“我成个什么东西了！还算个人不算！”他叫出这两句，那可怕的程度就可以想见。在旁人看来，只见他是个行尸走肉，有人之名，无人之实，如果人间多的是这样的人，那还成什么人间？这么想下去，不由你不害怕起来。

一片可怕的寂静。

那寂静就是死亡吗？

得不到个回答，只遇见个寂静，可怕的情绪是只会增高，不会消除的。

幸而回答来了。

在某一个集会上，青年人当着中年人老年人慷慨的说，

"我们青年人并没有忘了我们该做的事儿。你们中年的老年的先生们肯说肯干，我们与你们是一伙儿。"

在某一处地方，青年人把积蓄在心头的种种问题写了出来，说了出来，邀请许多先生进来共同讨论，求个解答。那一天热烈的情况，据说最近若干年间是仅见的。

还有些谈话的片段。青年人说，"我们并没有消沉，您不能只看外表。"青年人说，"我们明白什么是什么，挂羊头，卖狗肉，对于我们不发生影响。"青年人说，"我们知道有所为，也知道有所不为。您不留意，自然看不出，请从今为始，留意看我们的。"

还有其他。

从此可见那寂静不是死亡。那只是动物在蛰伏时期似的一种状态。动物经过了蛰伏时期，不是要起来飞翔，奔驰，跳跃，在世间各自演出一场生动活泼的戏吗？不是死亡，绝对不是死亡，所以并不可怕。到将来起来飞翔，奔驰，跳跃的时候，更将使人们欢欣鼓舞，喜不可支。

动物从蛰伏到飞翔，奔驰，跳跃，由于季节的改换。青年人在寂静了一阵子之后，旧的季节过去了，新的季节到来了，也就会冲破那寂静，起来飞翔，奔驰，跳跃。如今，寂静达到了它的最高限度，可以说旧的季节即将过去，时势等待着青年人起来飞翔，奔驰，跳跃，可以说新的季节即将到来。青年人啊！起来飞翔吧！奔驰吧！跳跃吧！以往你们的寂静不是死亡，凭你们的真诚，没有人不相信。今后你们冲破那寂静，起来飞翔，奔驰，跳跃，更将给人个真凭实据，使人硬要不相信而不可得。

动物从蛰伏状态中起来的时候，也许会遇到一阵寒冷，一阵风暴，因而受到伤害。同样情形，冲破寂静的青年人将会遇到一阵寒冷，一阵风暴。人间的季节是比自然的季节更多变幻的。可是青年人并不顾虑这个，就是伤害等候在面前也不顾虑。因为青年人有所信。没有什么东西比“信”更坚强的。此时此地必须行我所信，那就刀锯汤镬有所不避。

说到“信”，细说起来虽有多端，简要说来不过一项。一切思维行动以大众幸福为本位，那是要得的，值得拥护的，应该身体力行的。反过来，一切思维行动不以大众幸福为本位，甚至要牺牲大众幸福，那是要不得的，必须排斥的，应该加以扫荡的。就是这么一项。青年人就信这么一项。

没有这项信念的，即使年纪轻轻，油头光脸，实际上算不得青年人。具有这项信念的，即使年迈力衰，头童齿豁，实际上依然是青年人。通常说青年，中年，老年，只从形貌上判别；若从精神上判别，就得丢开形貌，看他的信念。而前面所说的信念是与青年的世界相适应的。老年的世界将要消亡了，青年的世界正在成长。凡与青年的世界相适应的，才是真正的青年人，精神上的青年人。

真正的青年人啊！精神上的青年人啊！起来飞翔吧！奔驰吧！跳跃吧！

无视客观环境，当然不对。可是，把客观环境看得太严重，把一切责任往客观环境一推，也要不得。

如果客观环境一向就非常之好，也就不会有你们那一阵子的寂静，也就无须乎你们起来冲破那寂静。惟其客观环境不怎么好，甚至非常之不好，才有以往那样的寂静，以及如

今的亟待冲破。能不能把客观环境改变过来，全看你们的冲破有没有力量。

“我们反对不顾一切客观条件的观念论的梦呓家，我们反对客观条件决定一切的机械论的懒惰汉。我们承认，一定限度的客观条件是精神活动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政治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不是两条平行的直线。不仅如此，在历史上，苦难往往是文化的诞生之母。在西方，古代文化开始于希伯莱的先知，而那些灿若晨星的先知们的预言却正是在犹太国家空前的民族危机中产生的。近代文化开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先驱者但丁的一生，却是在放逐中度过的。在我们的历史中，也不乏光辉的先例。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正是同一的现象。”(《中原》第三期于潮先生作《方生未死之间》)

景慕往哲，固然是好。然而徒然景慕，实际上没有什么好。要紧的是拿出力量来，踏着往哲的道路，从苦难中争取前途的光明。

说到力量，说到争取，说到刀锯汤镬有所不避，那就不是知识方面的事，而是实践方面生活方面的事了。仅仅口头心头有个“信”，不济事。必须一切思维行动贯彻在那个“信”里，沉浸在那个“信”里，久而不渝，终身以之，才成。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坚强的“信”就是这样的“信”。

青年人啊！在冲破那寂静的当儿，你们该有这么个准备。如果你们已经有这么个准备，那么，飞翔吧！奔驰吧！跳跃吧！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作

知 识 分 子

有些研究历史的人说我国的传统政治是“中国式的民主”,他们的论据是：我国的传统，政府中的官吏完全来自民间，既经过公开的考试，又把额数分配到全国各地，并且按一定年月，使新分子陆续参加进来，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成了。

“民主”这个词儿来自西方，不是我国所固有，咱们也不必考据这个词儿的语源，大家心目中自然有个大致共通的概念。总之，咱们决不把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叫做民主，就像咱们决不把一家老板开的店，因为选用了张三李四等人做伙计，就认它是公司组织。在传统政治上，做官只是当伙计。伙计之上有个老板在，就是皇帝。汉唐盛世也罢，叔季衰世也罢，皇帝总是“家天下”的。他行仁政，无非像聪明的畜牧家一样，给牛羊吃得好些，好多挤些奶汁。他行暴政，也只是像败家子的行径，只顾一时的纵欲快意，不惜把自己的家业尽量糟蹋，结果至于家破人亡。皇帝而能“公天下”,站在民众的立场，为民众的全体利益着想，那是不能想象的事。如今咱们心目中的民主却是真正的“公天下”，全体民众个个是老板，成个公司组织，决不要一个人当老板，由一批伙计来帮他开店。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也知道，要是把我

国的传统政治认为咱们心目中的民主，那未免歪曲得过了分，自己也不好意思，因此只得勉勉强强加上“中国式的”四个字，以便含混过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说得委婉些，可以借用《庄子》里所说的，“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说得直捷些，就是他们想做官，为了想做官，宁可违犯几个月以前发布的《审查图书杂志条例》中“不得歪曲历史事实”的条款。

放过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不谈，且来谈谈做官。自古以来，做官好像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固然很有些官儿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就是做官却是事实。换句话说，就是要找个老板，当他的伙计，帮他的忙。“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你看他找老板的心情何等迫切。像孔子那样的人物，虽然时代不同，不会有现代人心目中的民主观念，可是由于他的仁心，不能不说他心在斯民。然而他如果真个找到了个信用他的老板，就不能不处于伙计的地位，为老板的利益打算，至少不得损害老板的利益。而那老板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是先天矛盾的，那老板是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的。所以“致君尧舜上”只成为自来抱着好心肠的知识分子的梦想。尧舜当时是否顾到民众的全体利益，史无明文。咱们只知道一般历史家的看法，尧舜而后再没有比得上尧舜的皇帝。梦想不得实现，于是来了“不遇”的叹息，来了“用舍行藏”的人生哲学。这是说，没有老板用我，我找不到个合适的老板，我就不预备当伙计就是了。那当然与老板毫无关系，他只是我行我素，照样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

做官也着实不容易。做官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

上，总算到了顶儿尖儿了。而且，在前面所说那些研究历史的人看来，宰相制度是“中国式的民主”的最好表现。他们说在明朝以前，宰相是政府的领袖，皇帝的诏命非经宰相副署，不生效力，于此可见皇帝并不能专制。然而，单看汉朝一代，丞相因为得罪而罢黜的，被杀的，自杀的，就有不少。皇帝这个老板是很难侍候的，规谏他过了分，逢迎他不到家，都有吃官司的可能。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实在不算过分。所以二疏勇于早退，传为千古美谈。某人终身不仕，值得写在传记里，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不是说他们看透了皇帝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矛盾，故而不屑当皇帝的伙计，去侵害民众的利益，只是说他们比一般知识分子乖觉些，能够早早脱离危险，或者根本就不去接近危险罢了。一些高蹈的诗歌文章大抵是从这样来的。元朝人写些曲子，极大一部分表示看轻利禄的思想，骨子里只是说明了在异族入侵的时代，皇帝的伙计更不容易当，或者你想当也当不上。

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做皇帝的。历代打天下的与篡位的，都不是知识分子。这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实力，他注定是个伙计的身份。既然注定当伙计，即使他胞与为怀，立志要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碰到老板这一关，就只好完全打消。张横渠的“四句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志大言大了。前三句不去管它，单看第四句，他说要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太平？依咱们想来，该是指民众都得享受好的生活而言。民众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个概念，是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好的生活不是空口说白话，是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

标准。试想，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的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这样的太平是皇帝和他的伙计们所能容许的吗？这样的太平真个“开”了出来的时候，还有皇帝和他的伙计们存在的馀地吗？所以“四句教”只能在理学家的口头谈说，心头念诵，而太平始终开不出来，历代的民众始终在苦难中过活。

能够帮助皇帝的是好伙计。皇帝要开道帮他开道，要聚敛帮他聚敛，要提倡文术就吟诗作赋，研经治史，要以孝治天下就力说孝怎样怎样有道理，这些人所得的品评虽然未必全好，可是在当时总可以致身显贵，不愁没有好的享受。然而与民众的全体利益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从民众的全体利益出发，他们只是帮了皇帝的忙。你看，司马光编了一部史书，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资治”，不是说这是皇帝的参考书吗？司马光当然是个好伙计。还有王安石，他的新政没有能够推行，而今人却认他为大政治家。现在不问他是不是大政治家，单问他计划他的新政，到底为宋室打算，还是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想来也只能说他是宋神宗的一个好伙计，而不是代表什么民众的利益的吧。你要做官，不论做得好做得坏，只能站在皇帝的一边。站在皇帝的一边，自然不能同时站在民众的一边。武断一点说，我国历史上就不曾有过站在民众一边的官。

用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当皇帝的伙计，就说这是民主，那是小孩儿也骗不动的。不料偏有人要想骗这么一骗，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时代过去了，皇帝没有了，国家的名号也换过，改称民

国了，可是看看教育界的精神，还是在那里养成一批伙计，看看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还是一副伙计的嘴脸，这倒不是民主能不能实现，民众能不能做成老板的问题。到机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来这么一个激变，那时候，该实现的实现了，要做成的做成了，只有知识分子守着传统的伙计精神，以不变应万变，却是绝对没有安身立命的馀地的。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作

记丏翁一二事

年中原战争发动以后，直到如今，没有接到过上海丏翁来信。邮路并非不通，人家已经收到了上海九月间发出的信。丏翁为什么没有来信，令人怀念无极。猜想起来，大概没有旁的原因，只因为敌人的深入把我们分隔得愈远了；从前神仙家有什么缩地之方，如今适得其反，彼此居处虽然没有变更，而邮递迟迟，寄一封信就得八九十天，好像把距离拉远了似的。在这么遥远的程途中寄信，收信人开缄细读，无非是些明日黄花。古代人有那么一种习惯，由交通的不方便养成的，书到经年，不以为奇，在现代人可觉得太难受了。并且写信也不能说什么；问个安好，写些近况，原可以心照不宣；米价涨到若干，燃料如何艰难，写了也是徒然，彼此帮不了忙。这样想时，索性不写了事，一切待会面那时候谈它三天三夜吧。我猜想就是这么个原因。

前天N先生到来，嘱我写些文字给《朝华》，因为我与丏翁是亲家，特别"点戏"写些关于丏翁的什么。我正在怀念丏翁，写这个题目倒不觉得勉强。可是想了一想，怀念不过是一种情绪，空灵得很，难以把捉。不如记述一二事实，来得便当。

前年十二月间，丏翁被日本宪兵部捕去，关了十天放出

来。问何被捕，因何放出来，始终莫名其妙；据推测，大概丏翁的名字已列入敌人的“黑单”；黑单中人只关了十天，可见在敌人心目中，情形并不怎么严重。丏翁不会参加什么地下活动，直接打击敌人，我是知道的。在被拘留期间，受审问倒有五天之多；日本人是天南地北的乱问，把回答的话一一记录下来。他们知道丏翁能说日本话，要他用日本话回答。他说，“我，中国人，我说中国话。你们审问有翻译员，翻译就是了。”这个话是去年从上海来的一位朋友转述给我听的，确是丏翁的声口，我听了仿佛看见了丏翁本人。

在被拘留期间，有一天，丏翁家来了个客人，送一封信，说是几个同学凑起来的钱，请夏师母随便使用，夏师母把钱收下了，没有问明来客姓甚名谁。后来丏翁回了家，一定要去还那笔钱；他以为自己虽然窘，那些学生也并不宽裕，不该凭被捕的名义受他们的钱。可是逐个逐个地问，没有一个学生承认送过那笔钱。他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捐给慈善机关，让受难同胞用。那笔钱到底捐了没有，我不清楚，因为那位朋友没有说明。我相信那送钱的确是他的学生，而且就在他问过的若干人中间，说不定那若干人个个都掏了腰包。他们知道丏翁的耿介脾气，才来个闷葫芦。我替丏翁着想，单是学生们的这一份深情厚爱，就足以抵过十天的拘囚生活而有馀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发表

谈“求饶”的效果

上月十九日重庆《大公报》登载一篇社评，题目叫做《为国家求饶！》呼吁官僚们不要再“混”，国难商人们赶快洗手，还有非官非商亦官亦商的人们及早忏悔，痛改前非。主要一句话，国家再也经不起这批人的腐蚀，愿望这批人饶了国家吧。放下口诛笔伐，改用乞恕求饶，舆论微弱到这般地步，实在可怜已极。而执笔者的那种用心，希望激动那还没有灭尽的天良，为国家保存些微元气，是谁都深表同情的。

我们不妨想想，这三种人看了那篇社评将怎么样？一班小学生中间有几个惹了祸，老师知道了，恐怕伤了那几个的自尊心，不给指名训斥，只在班上笼统地说一说，坏事做不得啊，人格要保重啊，诸如此类的一套。那几个听了，也许是欠缺敏感，只是东张西望，以为老师骂的是邻座的同学。也可能灵机感通，知道老师骂的正是他们自己，但是老师既然没有点出谁的名儿来，也就乐得当作不知道，低着头咬嘴唇，剥指甲，把当时的场面敷衍过去。至于从此悔改，那是在《爱的教育》那种小说里才会有的事儿，实际上呢，那几个还不是退出课堂就忘得一干二净，有惹祸的机会还是要惹祸？我想，那篇社评说到的三种人看了那篇社评，情形大概与那几个小学生一样。

并且，这三种人都是太会计较的人，计较的标准是实实在在的私利。如果你说，即使为私，也得在为公之中才能彻底达到，不求兼善，也就做不到什么独善，他们就会笑你弄些词语的玄虚，抱着可笑的理想主义。他们只知道法币是牢靠的目的物，美金比法币更牢靠，吃些好的用些好的是实实在在的享受，自己享受了还要顾到十七八代的子孙，总得想方设法保证他们能有同等的享受。天良，太迂腐了；国家民族，太空洞了；为了这些放弃实实在在的私利，除了傻子谁肯干？这是一种计较。还有一种计较，他们想，如果自己耳朵软，心肠好，听了他们的呼吁，真个革面洗心，真个饶了国家，是不是人人都一样呢？如果这个也不改，那个也不变，改变的只我一个，那时候眼看同伙们捞的捞，摸的摸，享受的享受，岂不是国家仍旧没有被饶，而我却吃了实实在在的大亏？多我一个，未必就坏了事，少我一个，我就吃着实实在在的亏，还是不要上当，一仍旧贯的好。——两种计较合在一块儿，呼吁的效果不等于零也微细得很了。

发霉的东西要在适于发霉的环境里才会发霉。我们中国在抗战严重的阶段，偏偏有这么些发霉的家伙，霉得这么广阔，这么彻底，这么具有沾染不霉的人物的强盛势力，一定是我们中国原是个适于发霉的环境。单就官僚一种人来说，我想，历代的官僚政治就为官僚布置了一个适于发霉的环境。什么是官僚政治？实际上是帮助统治阶级压榨老百姓，形式上是上行下效，等因奉此。帮助压榨，自然不妨顺便捞摸一把；等因奉此，叫他不“混”又能怎样？名为民国，而官僚会大量的发霉，其故就在于此。真正的民国必须由老百姓当主人，

官僚还是要的，可是必须站在老百姓一边，所作所为完全为老百姓服务。从挂名的民国转变到真正的民国，头绪当然多，而铲除官僚政治是最紧要的头绪。这是制度方面的问题。所以“民主”两个字不是一种口号，一种符咒，而是急切需要实现的一种制度。民主政治实现了，适于发霉的环境不再存在了，官僚就不会发霉到如今模样，舆论又何至于向发霉的官僚求饶。

大家在中学时代熟读了曾涤生的《原才》，把渺茫的希望寄托在“一二人”身上，又相信孟子“人皆有四端”的话总该有些道理，于是苦口婆心，好言好语，恳求猎户放下屠刀。心思不能说不好，可惜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要根绝那些发霉的家伙惟有改革制度，把我国从来没有实现过的制度建立起来，让老百姓真个当起主人来。一般人喜欢侈言革命，骂人家反革命，好像究竟谁革命谁反革命没有标准似的。其实标准很具体，绝对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定下切实的办法，贯彻于坚强的行动，就是革命。否则就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在革命之声盈天下的今日，我这么说该不至于犯什么忌讳。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作

塞 源 节 流

年来物资艰窘，供应机构乃设为“塞源”与“节流”两法以应付社会，今以棉花为例：（举例而已）

塞源 乡农运棉入市，可得五百元一斤之市价。但官定价格为二百元，于是棉商尽量收藏，造成无货应市之状态；官方次一步手续，即为严格检查登记，结果农村改种其他植物，而塞源之效大着。

至于走私资敌，则塞源政策之副作用。

节流 领服装者向供应机构造册请领时，其手续之繁重与表册之琐细，当推为全世界最难办之公文。

第一，书册不尽如式，退还重造。

第二，再不如式，再退还，例如章子盖歪一个，再退再造。

第三，合式矣，呈司，司转署，署发司，司发科，科呈司，司呈署，署发另一司，另一司发科，科发股，股拟稿呈科，转司，转署，画“行”，印发，发库，库核复，再呈署，署交司，司交科，科交股，股又签科……循环无已，至少要四五个月之后，领服装者始可得到一纸通知，但具领又另有手续。

再待一个月后，天气热了，棉衣也不需要了。

领服装的人员已精疲力竭，叹了一口气道：“我不领了！”

这是节流！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发表

《前 线》书 后

国文教师找不着题目，往往教学生就读过的文篇作书后。近来匆匆的看过考纳邱克所作剧本《前线》的译本，《流星》编者要我作文，我就选了这个题目让自己作。

这个剧本写一个将领叫做伊凡·高尔洛夫的。他以前立过战功，但是他保守、刚愎，自满自大，不肯学习，因而没有进步。他在这回大战中当前线总司令，仍旧用他以前的蛮干战术，凡是现代化军事科学的研究成果，他都不大在意，以为没有多大用处。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已经受了敌人的包围还不知道。他部下有个年轻的军长奥格燎夫，知道珍重以往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斗经验，又能随时学习新的军事技术，兵士们敬爱他，同僚们信从他。他丢开了高尔洛夫的旧式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和包围，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到全剧结束的时候，他被任为前线总司令，接替了高尔洛夫的位置。此外人物还多，有的站在高尔洛夫一边，有的站在奥格燎夫一边反对高尔洛夫，故事也有些曲折，但是在这儿不必细说。

高尔洛夫的不行，虽然不在吃空额，扣军饷，虐待士兵，不战而逃那些情节上，可是他马虎糊涂，不明战术，不也是极大的毛病吗？而且这些毛病不仅属于他个人，同时也属于

他的军队，他的国家。《前线》描写这样一个人物，不就是暴露国家的弱点，暴露国家关于军事方面的弱点吗？传扬开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是一；让敌人取作宣传的资料，更会有意想不到的不利，是二。按我们中国的经验，这样的剧本，至少描写高尔洛夫的部分应当取缔。而他们苏联非但不取缔，还说作者写得好，给他奖赏，不知道他们的审查机关怎么搞的。（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审查机关，如果有，不知道审查条例怎么说法。）难道他们有所谓"特别国情"，与我们中国不一样吗？

若说有了深通战术、有办法取得胜利的奥格燎夫与高尔洛夫作显明的对照，这个剧本就有了积极性，所以可以刊行，可以上演，而且有受奖的资格。这个说法也许对。然而按照我们中国的经验，还是不对。我们读过一些文告，听过一些训话，知道所要求的文艺积极性是善颂善祷，十全十美。譬如说，明明是民不聊生，遍地血泪，却要写举国太平，民生康乐。明明是贪污公行，廉耻丧尽，却要写人人圣贤，个个爱国。这才是积极性，这才是当前迫切需要的文艺。不管打仗打不打得好，只要把奥格燎夫这个人物写得英勇善战，战无不胜就好。不一定要切实描写奥格燎夫能够取胜的所以然，即使把他写成个孙行者，拔一把毫毛就是一队精兵，也还是好。至于高尔洛夫这个人物，当然用不着写他。写他马虎糊涂，不明战术，岂不失掉了善颂善祷的本旨，破坏了十全十美的意境？按我们的要求，这个剧本应该是一开场就由奥格燎夫大打胜仗，直打到柏林，拿住希特勒，把他装进囚笼里，于是大队人马向后转，齐唱"胜利的凯歌"，于是落幕，

终场。但是《前线》的作者偏要写个不行的高尔洛夫，又让进步的奥格燎夫就在高尔洛夫的部下挺立起来，这除了他们的“特别国情”以外，说不定是从什么“正反合”的观点想起来的。而“正反合”的观点据说是斜门歪道，毫无意义。

不过这个剧本也有些合于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就是说，这个剧本对于整个军事下了一番反省功夫。蛮干，不利用现代战术，要不得。接受以往的经验，又运用崭新的战术，才是取胜之道。这些是反省的结果。所谓反省就是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省”字，不是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吗？

能够反省的，发觉自己有了毛病，一定是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不怕公开，就是让敌人知道也没关系。怙恶不悛，专爱听些吉祥言语的，往往是不能反省的人。能够反省的，发觉了自己的毛病容易改好，因为发觉的当儿往往带来了改好的办法。不能反省的，一错就错到底，末了儿是没落，灭亡。

作者写这个剧本，表达了对于整个军事反省的功夫的全部过程。为求形象化，于是创造了主要的次要的一些人物，构成了这个剧本的故事。这且不谈。我只想说，看了这个剧本，钦佩他们的反省精神，不免发出礼失在野之叹了。

反省也就是“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就字面看，后面两个好像是摩登产品，其实意义与反省毫无二致。

《前线》由聊伊先生翻译，戈宝权先生校阅并作序，重庆新知书店出版。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作

我 们 的 话

有人说，三百六十行，哪一行不好干？为什么偏要弄文艺？

是的，偏要弄文艺。

你们咬定牙根说偏要，必然有所为。

当然有所为。人有脑筋，不能不想。人活在群众之中，不能不把自己纳入群众之中一起想。想到什么，不吐不快。吐出来要用顶好的方式，于是弄文艺。我们为的就是这个。

帮闲凑趣，歌功颂德，沽名钓誉，骋才鸣高，为了这些弄文艺的，以往有，如今也不是没有。可是我们不为这些，也不消说时代不同了什么的，总之我们不为这个。

人家爱听些吉祥言语，我们可不是信口开河的媒婆，说不来。人家盼望在纸面上见到天下太平，我们可不愿意写什么“乌托邦”。人家讨厌一些真实的话，因为揭露了他们的本相，妨碍了他们的利益，我们可不管，只要见得真实，想说就说。当然，真实的话不限于这一方面。如果有功可歌，有德可颂，我们还是要歌颂，这歌颂同样是真实的话。我们要为将要死去的撞葬钟，也要为将要出生的唱“新生之歌”。

我们别无顾虑，单顾虑认识不够，因而所说的话不够真实。为了这一层，我们要随时学习，随时磨练，直到老死。

我们还要反省。文艺还没有在群众之中发生大作用，原因在哪儿？如果在我们这方面，或因内容空虚，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或因形式别扭，像个不协调的曲谱，就得加紧修练，改弦易辙。如果在读者那方面，或嫌口味不对，或嫌格调不合，也足以促使我们改进。怀着一腔真实的话向人说，好比捧着一件珍贵的礼物送人，总望他接受下来，心里才舒服。为了希望读者接受下来，除了真实二个字不容走动而外，自该有些儿斟酌损益。这斟酌损益就是我们的改进。

至于说环境不好，所以不能产生好东西，不容产生好东西，所以文艺在群众之中影响还微弱，这些话当然不错。然而从另一方面想，如果绝对相信这个话，就此低下头来，袖起手来，那就等于向不良的环境缴了械。文艺通常被比作武器，环境越坏，武器越不该放手，越要把它磨得锋快。从前有些科学家，用他们发见的真理与不良的环境斗争，有被囚的，有被杀的。然而他们胜利了，他们发见的真理终于化而为一般人的常识。弄文艺的虽然不敢妄自夸大，也不必妄自菲薄，那些科学家的那种勇气，我们可能有，那些科学家的那种胜利，我们也可能有。

今天是一年的开头，据说在我国，今年将比以前更为艰难困苦。我说这一番话，愿意与同心的朋友共勉，也愿意向一般的读者请教。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作

吃 空 额

军队里的大弊，吃空额是一项，大家都知道了。方今军政役政正在改善，依理说，从前的积弊可以去掉。到底去不去得掉，咱们等着瞧吧。

同样的大弊也发生在学校里，我不知道是否大家知道。教员有空额，校工有空额，为的是钱。学生也有空额，为的是米。我当然没有亲自去调查，我也没有调查人家的资格。可是有好些个当教师的朋友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做这一行买卖的假痴假呆，摇头否认说，“哪里有这回事！”我要请他们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尴尬的脸色。如果教育行政人员一只眼开，一只眼闭，打起官腔来说，“大概不至于吧”，我要请他们问问自己，到底是在做白昼梦，还是没有喝酒假装醉。

吃空额的人不配当校长，主持教育，犹如吃空额的人不配当军官，带领军队。理由何在不必说，稍稍有点儿常识的人都能够说上一大串。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发表

慰　劳

慰劳军士同胞，仅仅限于黔桂前线，似乎不大妥当。如今虽然没有进入反攻阶段，但是哪儿有我军(不分正规军和游击军)跟敌军相持，哪儿就是前线。前线的军士同胞不该受慰劳吗？再说，还有许多军士同胞正在受训练：初步的，正在学立正、稍息；较久的，已经在操野外，练实弹射击。他们虽然还没有上前线，却同样是干城之选，他们不该受慰劳吗？

送些吃的、喝的、用的给军士同胞，叫做慰劳。然而慰劳的意义不止于此。尤其重要的，在于表出对他们的亲切的关心与真诚的爱。亲切的关心与真诚的爱，凭空没法表出，这才寄托在吃的、喝的、用的上。军士同胞吃了，喝了，用了，体验到所有同胞的心都倾注在他们身上，所有同胞都是他们的亲兄弟，亲姐妹，这才觉得打仗真有意义，值得打，必须打。

慰劳不宜取怜悯的态度，不宜存施舍的心肠。若把军士同胞看作灾民饿莩，老实说，还是不要慰劳的好；因为这样做非但不足以鼓励军士同胞，而且使他们更觉得气短了。近来在街头听见宣传家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我们若不出钱慰劳他们，于心何忍？”这个话显然出了毛病。他们吃不饱，

穿不暖，是军政部的事，军政部必须负责，让他们吃饱穿暖，与我们无关。照这几句话的意思，如果他们吃饱了，穿暖了，我们就心头泰然，无须乎干什么慰劳了。那岂不是距离慰劳的本旨太远了吗？

慰劳的事，在抗战初期盛极一时，不知道怎么的，后来就音消响绝了。直到去冬黔境告警，才又热闹起来。到如今一个多月了，还没有消沉下去，这是可喜的事。要希望今后反攻取得胜利，我以为，什么大题目且不必谈，至少慰劳的事应该持续下去。大家认清意义，好好的干，直到战事结束为止。临了再说一回，慰劳应该普及到所有的军士同胞，不限于黔桂前线。

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作

刃锋的木刻与绘画

去年教育部川康社教队在社会服务处举办木刻展览会，我去看了。那些木刻家的名字大半熟悉，可是我特别注意一个初见的名字，刃锋。他多从勤劳大众中取材，与其他木刻家相仿，可是构图谨严，线条有力量，表现什么都表现得出来，其中有些他自己的东西在，似乎最为杰出。我记住这个名字，久久不忘。

最近我与汪刃锋先生认识了，承他带一些作品来给我看。一幅高尔基，侧形，一只手托着下巴，纯用直线条烘托，从遒劲中显出力量，有力量而不觉得粗犷，传出了高尔基悲天悯人的精神。几幅水灾旱灾的纪录，灾民挨饿太久，全都成了皮包骨头，而那面貌，那姿态，谁都能认出确是我们的同胞，不像有些木刻似的给外国人换上了中国人的服装。其中描写水灾的一幅最使我感动。一家老小挤在草屋顶上，草屋顶飘浮在洪水之中。那几个人有的已经咽了气，倒了；有的张着手，似乎在叫喊，眼神都瞪着前方，那表情超出于惊恐绝望之上，背景是淡淡的无边的水。（汪先生用两块板套印，背景另是一块，用淡墨，所以是淡淡的。）二十八年夏天，我在乐山安澜门外，亲眼见过同样的景象，当时只觉得无可奈何，自己安然站在岸上万分惭愧，而此情此景，绝非语言文字所

能描摹。现在汪先生却用他的刀子描摹出来了。还有一幅题名《小组会议》，几个人聚在窑洞里，只见背形与侧形，从他们凑合的部位与身体的姿态，见出讨论的热烈与专心。另外一个人坐在窑洞的后部，眼注着那几个，似乎随时要插几句话的那副神气。这一幅的线条是汪先生独创的，他叫做“金石味的线条”，是从钟鼎碑刻剥蚀的纹路得到的启发。我以为这条途径很可以发展，这也是承受遗产，利用遗产。——此外不多记了。

汪先生善于素描。素描是绘画艺术的基本，这一项功夫没有做到家，胡乱谈创作是枉费心力，要作木刻更无从着手。据我外行人的看法，汪先生的素描，观察正确，笔姿纯熟而富有趣味。承他告诉我关于素描的甘苦之谈，我觉得他的话通于文艺，颇得到些启发。

汪先生又能作国画，山水，花卉，不拘拘于家派。我常常看图画展览，见有些画家太拘于家派了，规宋仿元，八大四王，一一都肖似，可没有自己。汪先生作图画，像他的木刻一样，以表现自己为主，这是我极表赞同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作

覆　信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向来不爱写信。三番五次地给他去信，总是石沉大海，没有一个字的覆音，万一催急了，也不过是三两行的短札。

照他的解释，朋友间没有什么要事，用不到无病呻吟地询安问好。而且，缠绵笃厚的思念，也只有藏之丹田，反复咀嚼，不是文字所能说清楚的。这是佛家不着相的境界，我们凡夫俗子，俗缘未尽，不大能够了解。

偶然读到赵尧生调向仙乔的一首七绝："山中梅子黄雨时，两度传书问子期，但荷故人勤省录，不须著字一函诗。"足见，这种不着一字的系念，原来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发表

“六 腊 运 动”

时令已经入腊，所谓“六腊运动”该又要开始了吧。

为什么会有这个“六腊运动”？

难道一些准备当校长的，怀着满腔的教育理想，拟定成套的教育主张，看看人家搞得太糟了，再搞下去将不成其为教育，唯有按照他们所怀抱的所设想的干去，方能把教育挽救过来，搞得像个样儿，这才来鼓动这个运动吗？

难道一些准备当教师的，自知十分明白，自信非常强，觉得自己的真诚、知识以及能力最适宜作学生的同伴与学习顾问，比较正在那里作教师的人至少要好上十倍二十倍，当仁不让，君子有时也无妨有所争，这才来参加这个运动吗？

难道一些教育行政人员，念念不忘改进教育，时时记着裨益学生，对于以往的选任老觉得不满意，因而不惮不断地简贤选能，调换了又调换，更动了又更动，这才来主持这个运动吗？

教育以学生利益为主的，叫做学生本位的教育。教育以教师利益为主的，叫做教师本位的教育。我不知道在“六腊运动”之下的，是什么本位的教育。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发表

政　治　家

尝思此日而为政治家，其人必先为教育家，而所谓教育家，又必实符其名，非如徒拥校长教授之号，妄操训诫讲述之役者。

彼名实相符之教育家，决不视学子为土坯，可以抟塑随心，亦不拟学子于空瓶，惟事灌注充塞。固知人各有能，始于孩提，因势利导，则其能如木抽条，如水导流，畅然沛然，莫之能御。又知习成于群，群积自人，非善群无以养良习，习弗良即为群之玷。而已之所务，端在善导其能，利养其习于善群之中。不忮不求，不为助长，纯任自然，若无所施者。教育家不当若是乎？彼固不欲有所蕲，有所取，而惟以役于学习，为之辅佐为乐者也。

谓我国弗宜民主，此古德诺袁世凯之言，人皆审其荒谬。谓民主之施，宜先之以训政，此孙先生之言，教育家之心也。然而教育家不出世，恒人每忘役于学子之义，其视学子，不徒为土坯，为空瓶，甚且为刍狗，为牛马。经年累月，学子乃恍然而悟，既未可望于教育家，何尝不可空无依傍，自力求之？于是自学之声洋溢乎中国矣。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作

再谈政治家

昨谈政治家，以为宜如教育家。今复思之，政治家又可拟之导演。

吾人临剧场，莅影院，心赏演艺，低头赞叹；而于导演，初不睹其身影，亲其謦欬。然获观此佳绩，首宜致感夫导演。彼于全剧本事，知之最审；旨趣所在，亦揣摩周至，不遗毫末。编者之撰脚本也，虽已摄其灵思，表为具象，犹若仅存躯体，待赋精魂；经导演之匠心，而后精魂充满，百骸皆活矣。

匠心之运，尤在简择演员，配制景色。何人宜饰何角，何角宜表何情，其能事固擅于演员；而抉而发之，推而出之，咸出导演之炯识。乃至一言一动一颦一笑之微，罔不由导演之衡鉴，而悉中矩矱。景之于情，恒为衬托，情景互生，夙为艺事所尚。故画师工匠，或绘背景，或造器物，期其至当，皆属导演为之考核。而布设之位次，灯光之明晦，亦莫非导演为之案断。其他诸人，凡与于剧事者，固将各司其职，各竭其能；而纲维在握，六辔如濡，则导演之巧也。导演而无能，乌睹所谓佳剧也哉？

以演剧喻为政，虽似弗庄，实颇切近；而其情繁赜，为政乃百倍于演剧。降及现代，自民生日用，公众建设，以迄

学术文化，端绪之多，几于不可数计，要皆出以分工，治以专才，故现代之政治家，去君师益远，与导演益近。导演胜其任，则佳剧登场，斯为盛治。导演徒虚名，则混然淆然，直同儿戏，而治绩莫睹矣。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作

夜　思

午夜乍醒，闻飞机掠空而过。自远而近，而当顶，而复远，而杳然，瞬息间耳。一机方杳，次机赓至，亦不计其何数。去程或指寇巢，或驰辽沈，奏功奚若，读翌日之报而可知。

默念机中战士，深夜出征，凌厉万里，惟欲坏敌寇坚防，早致胜券。言作战则专意作战，一如其言游戏则专意游戏。而吾人一无所为，第于睡梦之馀，屏息耸耳，送其远翻，滋可愧已。不惟若是，逮夫披衣而起，俨然治事，亦复清醒无多，振奋莫见。危幕之燕，釜底之鱼，非徒永日，若将终身。岂止可愧，抑亦可哀之甚者矣。

读小说曰《虹》，观电影片曰《北极星》，激赏之顷，辄萌深感。所感万端，而未尝不可一言以蔽之，则吾不如人也。吾将终不如人乎？抑有所因而然乎？我欲遍提国人之耳，大声而问之。

余尝患失眠症，中年后尤剧，午夜辗转，狼狈殊甚。居蓉后，每闻机声，辄生惶愧。人劳而我逸，人飞行而我安眠，尚何思虑之有？念此辄能安然入睡。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九日发表

四 个 “有 所”

有所爱，有所恶，有所为，有所不为。

四个“有所”联成一串儿。

兼爱是个理想。在还有善恶正邪的差别的时代，不能不“偏爱”那些善的正的。同时就得恶那些恶的邪的。若不恶那些恶的邪的，就是并没有爱那些善的正的。如果恶的一边恶得不强烈，也就是爱的一边爱得不深切。爱了恶了，只是意向方面的事儿，如果不发而为行为，与没有这些意向并无不同。所以要有所为。为，就是把爱的意向恶的意向发而为种种行为，在种种行为上表现出来。行为方面干得愈积极愈有劲儿，就是爱的意向愈深切，恶的意向愈强烈，而且，这才不枉有了这些意向，是真正有了这些意向。同时，凡是与这些意向违反的事儿自然不愿干，不屑干。当前是些所爱的人，却去欺侮他们，给他们吃些苦头，肯吗？明明是件所恶的勾当，却昧良违心的干去，肯吗？这就是有所不为。

所以说，四个“有所”联成一串儿。

行为决定于意向。意向，就是爱与恶，要求其得当，先得辨别善恶正邪，不至于错失。怎么才能不至于错失呢？

就人来说，无论善恶正邪，大家总喜欢自居于善的正的一边。譬如当今时代，革命算是善的正的了，不像前清末年

那样算是反叛，要杀头，就谁都喜欢自居于革命的一边。跟人家不大合意的时候，不免想骂几句，就说人家不革命，或者反革命。这当儿，到底谁革命，谁不革命，谁反革命，不是好像很难辨别吗？

这不过好像很难而已，实际上并不难。所谓革命，无非要摧毁那些束缚人压迫人的制度，钳制那些欺侮人剥削人的人，使大家得以在自由平等的新天地中做人，过日子。这个说法假如没有错儿，那么，无论是谁，他口头嚷着革命没有用，他到底革不革命还得看他的行为来判断。如果他干的是摧毁和钳制这方面的事儿，同时对于建设自由平等的新天地尽一分力，他就是革命的。如果他袖起手来，既不干摧毁和钳制这方面的事儿，也不在建设那方面尽什么力，他就是不革命的。如果他非但不摧毁，还要拥护那些束缚人压迫人的制度，非但不钳制，还要亲自当个欺侮人剥削人的人，他就是反革命的。这不是很容易辨别吗？

以上就辨别人的善恶正邪而言。对于一切事物，也如此。

我们是人，辨别一切事物的善恶正邪，与辨别人的善恶正邪一样，也以人为根据。肠子里帮助消化的细菌是好的，病菌是不好的；足以发电的瀑布激流是好的，洪水险滩是不好的；帮助他人成功立业是好的，帮助他人为非作歹是不好的；说一句算一句是好的，信口开河，说谎欺人是不好的：诸如此类，无非就对于人的利害而言。

我们人又必须合群，离开了群就无所谓人生。所以利害不能单就个人看，要就许多许多人合成的群看。欺人，说谎，贪赃，枉法，囤积，高利贷，仗势霸占，把人当牛马，专制，

独裁，诸如此类，对于干这些事儿的人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其他的人，人数或少或多，范围或小或大，总之是有害的，也就是对于群是有害的。因此之故，这些事儿都是不好的，应该归到恶的邪的一边去。交通发达，世界各地的距离越来越近，各地人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时候，群的范围不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全世界的人就是一个大群。就对于大群的利害看，毫无疑义，侵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应该归到恶的邪的一边去，即使是日本人或德国人，也应该把它归到恶的邪的一边去。自然，这不过举例而言。

有利于群，是好的，有害于群，是不好的。这个话虽嫌平凡而且抽象，却极扼要。据以辨别一切事物的善恶正邪，也就虽不中不远矣。

辨别既明，意向——就是爱与恶——自然不至于不得其当。意向得其当，发而为行为，自然不至于有多大错儿。

于是，有所爱，有所恶，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发表

书院和国学专修科之类

有些地方有私人设立的书院，以及国学专修科之类，以前没有加以注意。最近几个朋友来谈，说起某处又有书院办起来了，这才使我注意这个社会现象。

书院和专修科的主持人以及教师，品类不一，造诣有殊，但是大都戴着个国学专家的头衔。所收学生有初中程度的，有高中程度的，也有大学程度的。学费大抵以米计算，与进一个私立中学不相上下。课程是诵习一些书籍，大凡正式学校里不读的，少读的，正是那里的教材。教师或者连续讲解一两种书，或者随便讲解，今儿是《孟子》，明儿是《礼记》。——情形大致如此。

这些机构站得住，而且陆续有新的办起来，自然因为有那么些学生要去加入。无论加入的动机出于学生本人还是学生的父兄，总之表示了对于正式学校的不信任。进了学校应该学到些什么，可是从正式学校学不到什么，于是不信任。学校毕业的文凭和资格应该在社会上受到相当的待遇，可是事实上未必受到相当的待遇，于是不信任。这两种想头，前一种注重在学习，后一种注意到实利，前一种比较后一种懂得教育的意义，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不信任如今的正式学校，以为正式学校对于学生没有益处，两种想头是相同的。我国

新教育办了几十年，近年来虽然在艰苦抗战期间，还在添设各级学校，据教育行政机关的报告，我国教育大有蒸蒸日上之势，而竟然有人不信任正式学校，宁愿另走别路，这是值得郑重思索的。书院和专修科的学生总数，当然与全国正式学校的学生总数不成比例，然而在正式学校里的学生本人以及他们的父兄，也未必个个都信任学校。据我们的经验，把进学校看作例行公事的居其多数。“进学校没有什么意思，可是不进又怎么办？”心里这样想，距离信任很远也就可想而知。多数人已经在那里不信任正式学校，如今的教育还不该打算改革吗？

改革教育的原则与方案，各人说来可以有种种，但是设立书院和专修科决不是个办法。国学成不成个学科且不管它，专治国学，把一切现代学科都置之不理，这就是个大毛病。而且，功夫是讲解与记诵，充其量只能造成些活书橱而已。要求食古而化，谈何容易？即使真个化了，也只是化了古的东西，未必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在如今这个时代，一个人最要紧的是了解自己与现社会的关系，做一个与人人平等的人，有甲项乙项的生活技能，参加某一种生产事业或是创造工作。专治国学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吗？如果谁说能够，我就一百个不相信。

在十几年前，有人因为不满意现在的教育制度，很赞扬我国从前的书院。我国从前的书院，有些是私立的，往往读书与修养并重，而读书也为的修养，俨然是个生活团体。有些是官立的，弄得不好也只是利禄之途；如果有明师指导，又有丰富的藏书，那就可以出几个通经明史的硕学通才。就

现在看起来，生活团体的办法是可取的，但是那种修养目标却毫不足取。希圣希贤哩，经世济民哩，得君行道哩，一派士大夫的观念。固然，我们不该厚诬古人，古人处于他们的时代只能作他们的想法。然而现在是民主的时代，在现在的时代，谁还抱着古来士大夫的观念就是自绝于群众。你要作圣贤，你要讲经世济民，群众说，“我们是能够自己管理又能够共同管理的凡人，不劳你的驾。”你要得君行道，群众说，“你认错了时代了，如今我们都是主人翁，可没有你所期待的‘君’了，你莫非想做个‘张勋第二’吗？”我不知道现在办书院的是不是想摹仿古来读书与修养并重的那种书院。如果是的，从他们戴着个国学专家的头衔看来，一定是一肚皮的士大夫观念。他们既已自绝于群众，还要招一班学生来，使他们也自绝于群众，他们的罪过是不可恕的。

再就专研旧籍的那种书院来说，钩稽，考订，作杂记，写论文，这些工作相当于现在大学研究所里所做的，大都属于整理的范围。整理固然要紧，但尤其要紧的是扬弃，惟有扬弃，才能使现代人接受古代的遗产，蒙其利而不受其害。现在大学研究所对于这一层尚少贡献，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不知道现在办书院的是不是想摹仿古来专研书籍的那种书院。如果是的，当然也不能令人满意。并且，把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的学生聚集在一块儿，单教他们作讲解和记诵的功夫，即使不谈什么扬弃，但求他们整理出一丝一毫的成绩来，有可能的把握吗？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可恕的罪过，把青年人关在变相的牢狱里，使他们隔离了现代生活，每天每天，只是念诵些符咒似的古书，食古既不能化，处今又毫无本领，简

直成个形体并不残废的残废人。

现行教育有毛病，必须赶紧改革，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改革成那些书院和专修科之类决不是一条正路。这一句话，我要向不信任正式学校的学生和父兄以及主持那些书院和专修科之类的人们郑重的诉说。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发表

谈成都的树木

前年春间，曾经在新西门附近登城，向东眺望。少城一带的树木真繁茂，说得过分些，几乎是房子藏在树丛里，不是树木栽在各家的院子里。山茶、玉兰、碧桃、海棠，各种的花显出各种的光彩，成片成片深绿和浅绿的树叶子组合成锦绣。少陵诗道："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少陵当时所见与现在差不多吧，我想。

登高眺望，固然是大观，站到院子里看，却往往觉得树木太繁密了，很有些人家的院子里接叶交柯，不留一点儿空隙，叫人想起严译《天演论》开头一篇里所说的"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简直不像布置什么庭园。为花木的发荣滋长打算，似乎可以栽得疏散些。如果处在玩赏的观点，这样的繁密也大煞风景，应该改从疏散。大概种树栽花离不开绘画的观点。绘画不贵乎全幅填满了花花叶叶。画面花木的姿态的美，加上所留出的空隙的形象的美，才成一幅纯美的作品。满院子密密满满尽是花木，每一株的姿致都让它的朋友搅混了，显不出来，虽然满树的花光彩可爱，或者还有香气，可是就形象而言，那是毫无足观了。栽得疏散些，让粉墙或者回廊作为背景，在晴朗的阳光中，在澄彻的月光中，在朦胧

的朝曦暮霭中，玩赏那形和影的美，趣味必然更多。

根据绘画的观点看，庭园的花木不如野间的老树。老树经历了悠久的岁月，所受自然的剪裁往往为专门园艺家所不及，有的竟可以说全无败笔。当春新绿茏葱，生意盎然，入秋枯叶半脱，意致萧爽，观玩之下，不但领略他的形象之美，更可以了悟若干人生境界。我在新西门外，住过两年，又常常往茶店子，从田野间来回，几株中意的老树已成熟朋友，看着吟味着，消解了我的独行的寂寞和疲劳。

说起剪裁，联想到街上的那些泡桐树。大概由于街两旁的人行道太窄，树干太贴近房屋的缘故，修剪的时候往往只顾保全屋面，不顾到损伤树的姿态，以致所有泡桐树大多很难看。还有金河街河两岸以及其他地方的柳树，修剪起来总是毫不容情，把去年所有的枝条全都锯掉，只剩下一个光光的拳头。我想，如果修剪的人稍稍有些画家的眼光，把可以留下的枝条留下，该会使市民多受若干分之一的美感陶冶吧。

少城公园的树木不算不多，可是除了高不可攀的楠木林，都受到随意随手的摧残。沿河的碧桃和芙蓉似乎一年不如一年了，民众教育馆一带的梅树，集成图书馆北面的十来株海棠，大多成了畸形，表示“任意攀折花木”依然是游人的习惯。虽然游人甚多，尤其是晴天，茶馆家家客满，可是看看那些“刑馀”的花树以及乱生的灌木和草花，总感到进了个荒园似的。《牡丹亭·拾画》出的曲文道“早则是寒花绕砌，荒草成窠”。读着很有萧瑟之感，而少城公园给人的印象正相同。整顿少城公园要花钱，在财政困难的此刻未必有这么一笔闲钱。

可是我想，除了花钱，还得有某种精神，如果没有某种精神，即使花了钱恐怕还是整顿不好的。

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作

血　和　花

德明小姐主编《血花》副刊，嘱咐我写些文字，情不可却，可是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忽然想起何不就取“血花”二字，仿效从前人作诗钟的分咏格，把两个字分开来各写几句呢。主意想定，就拿起笔来。

抗战到了第八个年头，我国同胞的血流得多了，各个战场上士兵的血，各个敌后游击区爱国志士的血，各条公路铁路上，各个飞机场上男女老幼的民工的血，各处被轰炸的地方受难者的血，各处被占领的地方遭到杀伤者的血，并到一块儿来说“血流成渠”，“血汇成海”，未必是过分的形容。那些流光了血的是死了，死了就无知。那些没有流光的还留着残废的身体和衰弱的生命，当然有知。假定死了的也有知，那么凡是流了血的没有别的恨，只恨滥肆侵略的敌人，只恨不把人当人的法西斯主义，只恨破坏秩序、妨碍自由的国际强盗；同时他们没有别的爱，只爱与他们平等的许许多多的人，只爱真正的“四海皆兄弟”的那种思想，只爱和平康乐，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享受都比以往好的那种社会秩序，这样的恨与爱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决不是只在心头萦绕一下而已，他们将始终执着，强固地执着，假若死了有知的话，死了也还是强固地执着，至于个人生命的丧失，肢体的残废，那是比

较不关重要的事，人谁不遇到衰病死亡，只要恨得到雪，爱得到抒，血就不是白流的，心头也就安然了。如果那些血真的汇流成渠，汇合成海，一定会掀起波涛，那波涛激动的调子一定会表现出前面说的那些意思。

其次说花。什么花呢？就是《棠棣之花》中聂嫈所唱的“我望你鲜红的血液，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开遍中华”的自由之花。这种花不见于植物词典，与这时节成都各处盛开的李花、桃花、海棠花、木笔花不同类。这是一个象征，表示人人心目中认为美好的一件东西就是自由；通常把花认为美好的东西，由于爱自由故而说自由之花。要注意这种花是鲜红的血液迸发而成的，现在已经流了那么多的血，自由之花应该“开遍中华”了，试看看，开了没有？即使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一时不得开，当然不会开遍，试看看，在将来（且不说最近的将来）有开的指望没有？这是必须问的，如果不问，旁的且不说，怎么对得起那些流成渠汇成海的鲜红的血呢？再说，自由之花虽然是个象征的说法，它的含意却是可以具体说出来的。把人当人看，把事当事做；人人自己管理，彼此相助管理；无论物质上精神上，谁也不受谁的欺侮和压迫；大家兼善，也就是大家真个达到独善，兼善与独善混而不分；生活一定要比往时好。不必学梦想家羡慕迹近渺茫的羲皇，也不必学笃古家怀念无征难信的唐虞，只须把目前的情形作准，譬如民国三十四年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吃不饱，到三十五年吃不饱的人减到百分之八十了，以后减到百分之七十六十了，直到每个人都吃得饱了，这就是生活比往时好。譬如民国三十四年事事乱糟糟，认真说话忌讳多，认

真作事窒碍多，到三十五年比较好些了，以后逐步逐步好起来，直到一无忌讳，一无窒碍，这就是生活比往时好……再写下去可以写得很多，但是表明自由之花的含意，上面的话差不多够了。根据上面的话，要看自由之花开了没有就很容易，如果有人报说开了，要鉴别到底是真的自由之花呢还是假的也就不难。当然，谁也不要假的。真的自由之花开了，大伙儿培植它，保护它。真的自由之花没有开，大概是血还没有流够，再流吧，再流吧，"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开遍中华！"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作

刊于《党军日报》

“算了，算了”的态度要不得

读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燕京新闻》，知道武大缪朗山教授教学俄文，被地方当局认为思想不纯正，勒令停课的事。这事件的结果，那期《燕京新闻》载得很详细，读者已经见过，这里不必重叙。我要说的是学校当局处理这件事似乎不甚妥当。教授受到无理的压迫，怎么能在“布告栏上贴出了一张纸条，宣布缪先生暂时不上课”，企图就此了事？又怎么能让缪先生“接到校长的通知以后，为了暂避无谓麻烦，就住到朱光潜先生家去了”，像一个逃避拘捕的罪犯似的？又怎么能要求缪先生接受什么“调停”，遵从什么“协商”，把那两个条件（“不再公开宣扬”与“除正式排定的课程外，不得私自开班”）答应下来？不能，万万不能，这其间的是非必须问个明白。教学俄文，没有错。开“拜伦研究”的课程，没有错。地方官吏干涉大学的行政，错。甚而至于违背政府颁布的保障人身自由的法令，错。即使是路人的事情，只要稍稍有点儿正义感的人，就会站在没有错的一边，与错的一边争辩。何况没有错的一边是学校里的教授，并不是什么路人，又何况这不只是缪先生个人的事！不问青红皂白，惟图息事宁人，那是最无聊的和事老的行径。嘴里嚷着“算了，算了，”两只手拉开争辩的两造，这样的和事老，我们在街头巷口时常看见，心里不免想他们

糊涂。学校岂宜作这样的和事老！何况就事实而论，学校与缪先生明明同在一造，不应该站在和事老的地位！

我说学校处理得不甚妥当，意思大致如上。横逆加身，低头顺受，不能算什么美德。即使事不干己，不加辨别而说“算了，算了，”也算不得什么美德。见恶不抗拒，说得重些就是助长那个恶，那简直是恶德了。如今恶德层出不穷，报上常常有记载，耳闻目睹的尤其多。我们且不要摇头叹息，说这个局面怎么得了，我们先要问问自以为不恶的我们自己，对于那些恶事，我们有助长或是纵容的嫌疑没有？我们若说“贪污已成风气，怎能怪某某一个人，”我们若说“不拉壮丁，兵从哪里来？”诸如此类，我们就犯了助长与纵容恶事的恶德，局面弄不好，我们就该负若干分之一的责任。而且，如今群己的关系愈见密切，我们从实际生活的经验中发见一切的事几乎没有一件“不干己”的。贪污的不是我们的钱，拉去充壮丁的不是我们的子弟，好像事不干己，我们尽可以抱“算了，算了”的态度，不必多管闲事。可是再想一想，贪污妨碍行政的效率，拉丁不利于抗战，难道真是与我们无干的闲事，尽不妨“算了，算了”吗？我们要管，当然会遇到若干障碍，但是，一则“干己”的事不能不管，二则助长与纵容恶事的恶德决不愿犯，障碍虽然存在，也惟有冲上前去。

“算了，算了，”不与恶斗争，就是信善不坚。真正行善的人就是那抗恶灭恶的人。人谁不欲为善，我们应该自勉。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作

独善与兼善

古人谈立身处世，有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说法。穷并不是说没有钱用，没有饭吃，而是说得不到时君的看顾，就是不能够得君行道。那时候只好自顾自，勉力做个好人，这叫做“独善”。达是穷的反面，就是让时君看上了，居高位，做高官。那时候你有什么抱负可以施行出来，使民众得些好处，这叫做“兼善”。古代的知识分子，除开那些没志气的不说，单说那些极端有志气的，他们只能在穷啊达啊独善啊兼善啊两条路上走一条，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因为从前所谓天下是皇帝的私产，谁要对天下作什么事务，必须得到皇帝的任用，至少也要得到皇帝的默许，否则就无法作，硬要作就是违碍，非遭殃不可。譬如著书立说，启迪民众，也算是一种影响到天下的事务，如果你循规蹈矩，不违反皇帝的利益，皇帝就默许你，由你去著书立说，不来管你；如果你要说些不利于皇帝的话，皇帝就不能默许，于是焚稿，劈版，杀头，戮尸，种种的花样都来了。你觉得如果碰到这一套挺麻烦，就只好把要说的一番话藏在肚肠角里，隐居山林，诗酒自娱，实做个独善其身。眼见生民涂炭，天下陷溺，也只好当作没有看见，哪怕你心热如焚，实际上还是形冷如冰。从来真有志气的人往往不得志，看他们写些诗文，往往透露

出一腔牢骚，其故就在于此。再说那些达的，可以举历代得位当政的一班政治家为例，他们未尝不作些好事，使民众得些好处，但是也不过像牧人一样，好好看顾牛马，无非为了主人，使主人可以多挤些牛马的奶汁，多用些牛马的劳力罢了。无论他们怎样存心兼善，民众还是离不了牛马的地位，如果认定牛马的地位说不上什么善，那么“兼善”简直是空话。说句幼稚的话，古代要行兼善只有皇帝才行得通，他若不把民众放在牛马的地位，他就兼善了。但是，不把民众放在牛马的地位，他皇帝怎么做得成？有那样的傻皇帝吗？至于知识分子，注定的只好独善，没法兼善。并且，要能独善，总得有田有地，有吃有穿。得到那些供给，或由祖宗遗传，或由自己弄来，似乎毫无愧怍；可是踏实一想，无非吸了牛马的血汗，与皇帝大同而小异。那么，独善果真是“善”吗？看来也大有问题。

到如今，皇帝的时代过去了，所谓天下是民众的公产。对于这分公产，大家自己来管理，大家共同来管理。就自己管理而言，见到民主的精神。就共同管理而言，见到组织的重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感，在从前是只属于伦理的，如今因为共有一份公产，从实际生活上见到彼此的相需相关，伦理的之外又加上经济的，关系的密切简直达到没法分开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事情干得好大家好，干不好大家糟，没有什么独善可言。也可以这么说，即使你喜欢独善，也得通过兼善才做得到真个独善。如今时代与从前不一样，如今是独善兼善混而不分，而且非“善”不可的时代了。如今无所谓穷，惟有知能不足，不懂道理，办不了事，那才是穷。那

样的穷，独善兼善都谈不上。如今也无所谓“达”，懂得道理，办得了事，独善兼善双方顾到，也不过是尽了本分，没有什么所谓“达”的。虽然没有什么所谓“达”的，兼善却万万不可放松。如果一放松，你就是拆了大家的台，使大家吃亏。并且大家之中有个你在，也就是使你自己吃亏。自己吃亏是最为显而易见的，除了傻子谁愿意？

以上的话虽属抽象，对于如今的知识分子却有些关系。本志的读者是中等学生，在知识分子的范围里，所以我们要在这儿谈这个话。我们以为如今的知识分子固然要继承从前的文化传统，但是继承必须是批判的而不是盲目的，值得继承的才继承，否则就毫不客气，抛开完事。关于立身处世的传统，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说法，就非抛开不可。若不抛开，就将一塌糊涂，做不得民主国家的公民。你讲“穷”“达”，无异承认社会上有个排斥你赏识你像皇帝那样的特权阶级，而这个特权阶级非但不该有，假如实际上有也要把它打倒，如何能加以承认呢？你讲“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无异说你有燮理阴阳，治民济世的大才，你没有看清如今作事，为自己也为大家，为大家也为自己，并没有一种特别叫作治民济世的事，这个错误又如何要得？认识一错，全盘都错，你受教育就不明白为什么受教育，你作事就不明白为什么作事，你成了个古代的知识分子，距离民主国家的公民却有十万八千里。我们想，如今的知识分子第一要不把知识分子看得了不起。知识分子了不起乃是知识封锁时代的现象，民主国家知识公开，知识共享，人人有了知识，人人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无所谓知识分子了。第二，要在实际生活

中贯彻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真正见到彼此同气，不能分开，于是各自去参加"大家自己来管理，大家共同来管理"的某项事务。见解如此，才算脱去了古代知识分子的窠臼。

单管认识与见解，不顾日常的实践，还是不济事。做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随时随地实践，随时随地顾到共有的这份公产，才能使国家真个成为民主国家，自己与他人并受其益。譬如政治，就不能不管，有些人以为政治是罪恶的渊薮，管政治是卑琐龌龊的勾当，不去管它才是清高。其实这是古来知识分子的想头，与如今全不相干。按如今的说法，管政治并不等于做官（进一步说，官也可以做，只要明白做官是为公众办事，并不是去作威作福，鱼肉公众，就好了），只是管理自己与公众都有份的事而已，那些事太切身了，非管不可。选举保长乡长了，知道这关系到一保一乡的福利，就不该随便填个人名了事，更不该放弃选举权，不去投票。见到了什么意思，或者是积极的建议，或者是消极的指摘，知道不建议不指摘将会坏事，就不该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见到的意思在头脑里消逝。诸如此类，不能尽说。总之，凡是该管的样样都认真的管，才是实践。又如与大众为伍，要真个感到彼此为一体，这种习惯也不能不努力养成。从前的知识分子大多抱个人主义，喜欢超出恒流，即或有所交往，也只限于同辈，对于操劳力耕的工人农人，就看作下贱之徒，避之若浼，民胞物与，只在谈道学的时候那么说说，在作文的时候那么写写而已。如今彼此既同为国家的主人，无所谓高贵与下贱，而实际生活中又必须相济相助，搅在一起，所以文艺作者有深入民间

的切需，知识青年有回到乡村的必要。其实说“深入”似乎未妥，深入了可能还有出来的时候，如果出来，岂不是仍在民间之外？若说“没入”民间，像一滴水，顺着江河归于大海，永不复回，那就更妥帖了。说回到乡村，也不是回去调查调查，考察考察，或者劝说一番的意思，大致也在于“没入”，乡间比之于大海，回去的青年就是一滴水。要真个做到如此地步，必须脱胎换骨，把沾染在身上的从前知识分子的坏习气完全消除，向大众学习，与大众共同学习。这又是非实践不可的事。

如今虽然有人嫌民主讨厌，又有人以为我国谈民主还早，可是我们相信民主是当前最好的共同生活方式，必须求其从速实现。就知识分子而言，其知识是可贵的，可是传统的精神必须革除，新的实践必须养成，才能够排除民主的障碍，促进民主的实现。这儿说了一番话，请读者诸君加以考核，如有可取，希望采纳。未尽的意思以后再谈。

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发表

“五四”文艺节

今年“五四”是第一届的文艺节。把“五四”定作文艺节，有意思。

我国的新文艺跟着“五四运动”发了芽。就文字体制说，在“五四”以前运用一贯相承，代有渐变的文言，白话文只是引车卖浆之徒的工具，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从“五四”开始，白话文才占领了著作的地盘，到如今虽然还得努力扩大，脚跟总算站稳了。就文艺精神说，“五四”以后的作品，在观点上，在表现上，几乎与以前完全不一样。虽然细按起来也有种种的派别，各异的风格，但其间差别之大，远不如”五四”以后的全部作品与“五四”以前历代传下来的文艺。通常说新文艺，那个“新”字就表示这么个意思。

“五四”的旨趣，是对内反封建，对外反帝。读者诸君读过现代历史，也读过每年逢到“五四”报纸杂志上刊载的论文，这儿不必多加说明。民国的招牌虽然从民国元年早就挂起，可是一般知识分子从实际的生活经验中感到，要使自己与所有同胞做个现代人，过现代人合理的生活，非反封建反帝不可，却是到了“五四”才真正开了端（“反帝”二字的使用与通行还在以后几年，可是“五四运动”本身，就其政治意义而言，就是个反帝运动）。这个开端带来了又沉重又艰难的任务。几

千年来的封建旧束缚，一百年来的帝国主义新压迫，要解除，要摆脱。而且，单由知识分子来干，济得甚事，必须大多数同胞都起来担当这个任务才成。而大多数同胞由于知识的封锁，传统的拘束，虽然也有改善生活的想望，却不知道该往哪条道路走。给他们开导，引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与他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在道路上迈步前进，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从“五四”到如今二十几年了，凡是明白的人都认定这个任务，从种种方面贡献他们的力量，明知它沉重，艰难，硬是要担当起来。他们深信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家的生活才会改善，那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故而非完成不可。八年来的抗战，他们坚持着必须取得真正的胜利，在抗战的同时，他们又坚持着争取民主——政治的与经济的民主。现在胜利还没有取得，民主的实现更是障碍重重，他们知道“五四”以来一贯的反封建反帝的精神，还得发扬光大，力量求其更结实，范围求其更广大，才可以完成任务，大家过现代人合理的生活。以往的中国人肩膀上没有担当过这样的任务，反封建反帝完全成功之后，中国人也不须再担当这样的任务了。这是现代中国人特有的任务，开端于“五四”，结束于将来。这个“将来”是近是远，要看大家的努力如何。

就身份来说，文艺作者与其他同胞一样，都是现代中国人。一般人既已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感到反封建反帝亟需实践，否则就什么都谈不上，文艺作者哪有别唱一调，或者丢开不管之理？他们也是现代中国人，他们也以反封建反帝为自己的人生哲学。根据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写下若干东西，虽然取材各各不同，手法互有差异，自然而然有共通的精神，并

不是谁要强同于谁。这就是文艺的时代精神，也可以叫作时代思潮。如果有些作品抓不住这种精神，赶不上这个思潮，读者与批评者就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或多或少表示不满意。有人把这个现象叫作“差不多”，显然带着嘲讽的意味，认为“差不多”的现象若不改变，文艺的前途就将暗淡无光。其实这是不劳过虑的。时世到了现代，难道还要写那些继承传统的封建文艺，以及开埠通商以后的洋场文艺，以见文艺的多样化吗？难道还该脱离现实，追求纯美，给读者以虚无缥缈的梦境吗？文艺本是内心的吐露，如今人同此心，当然小异之外有其大同。此心又都集中在切近自己与大群的事儿，写下来的文艺当然是现实的，人生的。用这样的看法来看“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就比徒然说声“差不多”得其真谛了。

就文体改用白话来说，一方面固然由于现代人的思想情感，用活的语言来表达最为亲切明确，用那文言，就不免隔膜一层，打些折扣。另一方面，这个改变也含有反封建的意味。文言经历代的运用，不只是一种形式，其间也流荡着一种精神，一种承袭封建传统的非现代的精神。现代人也可以写文言，但是写文言的时候，那种精神就缠绕着你的笔尖，使你无法摆脱。有人说，白话达意，文言也达意，白话文言都只是工具罢了，主要的还在于意。这个看法未免简单了些。文言并不是纯工具，你要运用它，就不能不多少受它的影响，更改你的意，甚至违反你的意。谁愿意受它的影响，愿意自己笔底下流荡着那种承袭封建传统的非现代的精神，当然可以写文言，那是各人的自由。但是文艺作者决不愿意，他们的人生哲学规定他们决不愿意，所以他们抛弃文言，采用白

话。白话也不是纯工具，新的文体必然带来一种新的精神，是一。从前虽然也有白话的东西，可是并未广泛运用，其间尽有开创发展的馀地，是二。"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用白话，似乎应该这样理解，如上面所说的。

我国的新文艺跟着"五四运动"发了芽，所以说，把"五四"定作文艺节，有意思。我国的什么节什么节很多了。节日的意义，无非纪念以往，策励未来，而后一层尤其重要。如果不从心底里发出策励的热情，不在践履上表出策励的实迹，徒然开个会，举行个仪式，发表一套八股式的演说，那就毫无意义，尽可以不要那个节日。我们看见许多的节日化为毫无意义的了，说得正确些，是人没有搞清楚那些节日的意义。希望文艺节决不如此，从今年第一届起，直到永远，始终是个有意义的节日。就目前说，现代中国人特有的任务尚未完成，文艺作者自然该加紧策励，向这方面努力，第一届文艺节就是大家加紧策励的一个信号。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发表

诗人节致辞

今天是诗人节。

诗人节想到诗人，头一位当然是屈原，诗人节定于今天端午日，就为的纪念他。他在他那时候，吸收了南方民间文艺的长处，把它发展，把它加深提高，写下他的光辉的诗篇。除了无名作者以外，他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我国的诗史。屈原所以值得纪念，就他作诗的宗旨来说，太史公有两句话很扼要，叫做“眷顾楚国，系心怀王”，记住这两句话读他的东西，可以说“虽不中不远矣”。

想到的第二位该轮到杜甫，他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他能运用他以前的各种体裁和技巧，可是取材的范围超出了古人很多，他把生活和诗融和在一起，生活里的一切全是他的诗料，读他的诗就好像读他的生活，这是在他以前没有的，在他以后，同样的诗人也找不出几个，我们会立刻想到他，原是非常自然的事儿。他有几句诗说明他作诗的宗旨，叫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希望最高统治者特别贤明，比传说中的尧舜还要强，他自己愿意帮他做些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历来批评家往往说杜甫继承的是儒家精神，就是为此。

屈原“系心”的是怀王，他“眷顾”的楚国只是怀王的楚国，

杜甫希望皇帝比尧舜还要强，希望他自己当个高明的帮手，按实说起来，他们二人都站在统治者一边。而从前的统治者，不管他昏庸也好，贤明也好，实际上总是与人民对立的。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层，就说屈先生杜先生他们要不得，意识太落后了，不配称为诗人，那是不应该的。我们知人论世，最需要的是"了解的同情"，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尺度去衡量古人。在屈先生杜先生的时代，想使社会秩序好一点，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了解的同情"是一回事，我们正确地自处又是一回事，若说我们从前有两位大诗人，屈先生和杜先生，他们都是站在统治者一边的，我们现在也该照他们的样，走他们的路子，那就是不善于自处了。

现在没有什么怀王了，也没有什么皇帝了，是一。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了，人民是主人，不容许有谁跟人民对立了，是二。现在做人，且不说诗人，只说做个寻常的人，注定混合在人民中间。人民好比草原上的草，每个人是其中一棵。风吹着，阳光照着，彼此同样承受，霜冻着，冰雹打着，彼此也同样承受。由于息息相关，所以心心相印，必须把社会秩序弄好，必须把共同生活弄好。寻常人是这样，诗人难道另外一个样吗？简单一句话，现在的诗人注定要以人民的心为心。比起屈先生杜先生来，这当然可以说是进步，并不是现在诗人比他们二位高明，只是现在的时代使然。假如他们二位生在现在的时代，按照他们那么伟大的精神推想，他们作诗的宗旨也必然是表达出人民的心声。

在"人民的世纪"，"人民的诗人"没有旁的要写，要写的就是"人民的诗"。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作

我 的 侄 儿

我的侄儿，年纪三岁不足一个月，体量重，躯干大，与躯干比起来，脑袋尤其大。圆脸庞，不说夸张话，脸色真个像苹果那么红。一对大眼珠灵活，有神。

他发育比较迟，与我哥哥一个样。听母亲说，普通小孩子一岁过就能说话，十三四个月就能走路，他到十八个月才能扶着椅子移步，二十个月才能发个单音，算是开始说话。他走的迟，或许因为他的体量重，医生解释是少吃了钙质；他说得迟，或许因为他懒得学习，或者不需要学习，要什么吃啊玩的，像哑吧那样用手势和面部表情示意，就能满足他的要求了。

到现在，他的话还很简单，限于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或者一个形容词，名词在前，动词或者形容词在后。如说“桔，剥”，“门，开”，“房房，去”，“花，好”，“灯，亮。”

不知怎么的，他把肉叫做“傍傍”，并没有人教他，人家说肉，他硬是说“傍傍”。又不知怎么的，他知道碗里切成块切成丝的肉，就是挂在铺子里的半爿猪上割下来的，他看见铺子里的半爿猪就指着说“傍傍”，甚至看见活猪也指着说“傍傍”。有时候看见牛也说“傍傍”，大概是吃了牛肉的缘故。看见马他只说“马”，决不说“傍傍”。

他识得茶，却把各种饭菜的汤也叫做茶。吃饭时候，他要泡些汤，就指着某一碗菜说："茶，茶。"我们喝酒，问他是什么，他只说"酒"，决不说"茶"。

"冷"字的发音似乎不很难，可是他自己创造的说法，叫做"火没有"。他从火得到了热的感觉，又知道冷是热的反面，"火没有"就表示了冷：这大有"基本英语"的意味了。

我们说的话他大多能懂，有时候也学他的说法朝他说。阴历新年里买了个汽球，玩了一会儿破了，对他叙述道，"汽球，好，高高，啪，坏坏。"他笑了。

我们教他叫他的父亲"爹爹"，他又听我们叫父亲"爹爹"，于是父亲与祖父都叫"爹爹"。我们教他叫我们的母亲"阿婆"，他又听我们叫祖母"阿婆"，于是祖母与曾祖母都叫"阿婆"。我们纠正他，一个叫"爹爹"，一个叫"阿爹"，一个叫"阿婆"，一个叫"太太"，他照叫了，但是过了些时，他又用他的一律称呼了。为什么我们叫"爹爹""阿婆"的，他不能叫"爹爹""阿婆"，这时候他还搅不清楚。

他看些图画本子，见有胡子的就是阿爹（那时候他不弄错了），见壮年男子就是爹爹，见老妇人就是阿婆，见壮年女子就是妈，见打扮入时的女郎就是孃孃（姑母），见男孩子就是哥哥，见女孩子就是妹妹。

他自称为哥哥，同居人家的孩子比他小几个月，他叫他弟弟，他认的清淡黄毛的鸡是我们的，叫做"哥哥鸡"，深黄毛的鸡是同居人家的，叫做"弟弟鸡"。凡是我们说话用"我"的地方，他一律用"哥哥"。称他说话的对手一律用称谓，如说"妈，坐"，"阿婆，饭饭"之类，他还没有运用代名词的观

念。

书上画着草地，花木，游人，他说是公园。画着汽车，他说“呜呜”。画着各种的花，他说是花，没有花的枝叶也是花。画着猪或牛，他说“傍傍”。临睡之前，早上醒来，他一定要把几本书翻过一回，嘴里咿咿呀呀唱些不成腔的调子。躺着看书据说是不好的习惯，以后总得把他改过来。

他喜欢央人为他画些什么，他有个专门说法，叫做“鸭鸡，画”。大概因为头一次画了鸭与鸡给他看之故。只要看开头几笔，一张尖嘴，他就认出是鸡，一张扁嘴，一个弯弯的项颈，他就认出是鸭。画个长脸，他说“马”，画个扁脸，他说“啊呜”(猫)，不等你添上身体和四条腿。两条曲线凑在一起，一边儿现出鱼尾的形状，他就连声说“鱼，鱼”。方才画一朵花或是一条枝条，他就连声说“瓶，瓶”，意思是还得加上个瓶。无论圆瓶方瓶长颈瓶短颈瓶他都满意，足见他已经有了个瓶的概念。有时他要自己动手，说，“哥哥，鸭鸡，画”，把笔抢在手里，涂满了一纸的黑杠子，就拿去给妈或是阿婆看了。

他已经能识数。要他数书上的人或物，数桌子上的茶杯，数停在路上的汽车，三数以内往往不错。他还不能说“一，二，三，”只能用手指头来比，看看所数的对象，又看看他自己伸直的手指头，两相符合了，就扬一扬手，表示这就是数目。

他的反应很敏捷，心思很精细，有一回电灯忽然熄了，点起蜡烛来，可是没有什么插的，他却从桌子肚里检出个玻璃瓶来，正好插蜡烛。他见过一回祀先，供上祭菜，点起香烛，就取拜垫来大家跪拜，以后每回祀先，取拜垫成为他的

职务，决不忘了。又有一回，他的母亲忽然肚子痛，痛的很利害，大家忙着找一瓶麻醉剂，希望暂时止一止她的痛。大家也没有说药啊什么的，他却从形色上看出来了，就在抽屉里检了一包咳嗽药送来。

他认得清各种的店铺。书店里陈列着书，皮鞋店里陈列着皮鞋，见什么说什么，当然很平常。可是茶叶店里的茶叶都藏在缸子里，他也说得出“茶”，不知怎么搞的。还有理发店的陈设各各不同，有讲究的，有简陋的，他进去过的只是中等的店铺，大概他已经抓住了一些要点，无论指哪一等的理发店问他，他总举手在头顶上作势，摹仿理发的形状。还有西药铺和中药铺，问他都说“药”，两种铺子的陈设截然不同，我们又从来没买过中药，教自然有人教过他的，但是他不会把中药铺与陈设相似的纸铺缠错，这却奇了。

他看电影是最近几个月内的事，以前常想让他去尝试尝试，看他的反应如何，只因电影院里空气不好，又恐他没有耐性，说起了又延搁了。一天，他父亲带他去了，起初看见幕布上映得很大的人形，有些害怕，看了些时，也就没有什么。头一回居然终局，一点二三十分的时间，注意力没有完全涣散；后来看了卡通片《白雪公主》，回来就学七个矮仙的走路模样，反剪了手，身子左一歪右一歪的，看了几回，他上瘾了，吃过午饭，就嚷“票票，电影”，意思是说带了钞票看电影去。母亲朝我们说，“你们五六岁的时候闹着看电影，现在他胜过你们了，三岁还不到，就是‘电影，电影’的。”她的话里含着不很赞成的意思。

最近二十几位作家举行《现代美术展览》，母亲嫂嫂带了

他去，回来时他把画面上的东西，凡是说得来的一一说出来，很有兴味似的。美术展览的会所是美术协会，他认得那个门面了，现在每走过一趟，看见门开着，就要拉住他母亲进去看看。前天看的是什么人的书展，不知他看了那些楹联屏条，行书正楷，小头脑里想些什么。

他喜欢作事，派他作什么，常是高高兴兴的。每天三四回送报纸来，他抢着去接“报，报”，接着总是送到他祖父手里。他母亲洗衣服，他去取肥皂缸。他父亲脱皮鞋，他去取布面鞋。晒在阳光中的小东西他抢着收，还能辨别晾着的衣服干不干。什么地方的东西归在什么地方。他似乎有一种性格，刻板，照旧样。一张广漆方凳是他进餐时的坐位，他认定那方凳坐，不肯随便。

他已经有了一种习惯，买了什么吃的东西来，大家均分，他拿一份，不再想侵占人家的。有时派他去送，妈一份，阿婆一份，……他，达达达跑去送了，回来拿自家的一份。他与同居人家那孩子玩，起了争端的时候，那孩子就打他，用手指甲抓他，他却没有照样回敬过，他还没有这一种反应。前一种习惯当然是好的，后一种，从一方面说，也不能算坏。希望他永远保持，并且普及到种种行为方面。

他不能看人家表示憎厌的嘴脸。谁对他摆起那副嘴脸，他就转头不顾，仿佛没看见似的，当然，小嘴垛起来了。如果拗了他的意思，他就放声大哭，声音很宏亮。禁止他不要哭是无效的，有效的办法只有转移他的注意。突然间讲飞机怎么样，汽车怎么样，他噙着眼泪听，哭就止住了。脾气发得利害，也有把手头的东西摔得一地的时候。好在我们难得

拗他，故而他也难得哭，除了身子不好，气管炎发作的日子（他极容易发气管炎），他总是笑嘻嘻的。

我觉得他的资质很不坏，如果我们有耐性抚导他，又有了解儿童心理的素养，随时随地因势利导，使他往好的方面发展，前途一定未可限量。现在把他的琐屑记在这儿，待过了一年半载，再取出来比较，看他的进步如何。

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发表

茶馆

看见副刊的名称叫做《茶座》，就想到茶馆，想到前几年的禁止新式茶馆。坐茶馆废时失业，是一。乱"摆"闲扯，容易造言生事，是二。那架起了一条腿悠然抽烟卷的样儿，很不像抗战时期的紧张情况，是三。茶馆确实应该禁。不过单禁新式茶馆，放过旧式茶馆，未免美中不足。这且不去说他。单说若把所有的茶馆都禁绝了，是不是就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怕也未必。时间根本不值钱，事业呢，有些人是想干没得干，有些人是要干不许干。你不容人家在茶馆里废时失业，人家自会找到种种的地点，想出种种的花样，实做他们的废时失业，你又怎么办？再说，造言生事确乎讨厌，可是把茶馆关光了，人家有嘴有耳朵，还是可以造言生事。即使做到极点禁止偶语，人家还是可以在房间里，放下窗帘儿偶语起来，你又怎么办？至于不像紧张情况，又何尝限于茶馆？坐在办公室里，画几个"行"，盖几个私章，算是紧张情况吗？抬起了形体上以及精神上的头，等待有朝一日胜利在握，太平实现，算是紧张情况吗？如果都算不得，又怎么能单独责备坐在茶馆里，架起了一条腿悠然抽烟卷的那些朋友？

这样说来，似乎是主张茶馆不须禁止了。事实上，如今茶馆与以前一样的多，只有想发横财而开了新式茶馆的人倒

了椢。然而我是极端赞成禁止茶馆的，不过据我想，要收禁止茶馆的效果，在禁止茶馆以外,还得干些最关重要的什么。类此的事，都可依此类推。

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作

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

我与雁冰兄初次会面，记不清是民国九年还是十年，总之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小说月报》革新之后。列名发起“文学研究会”，经常投稿《小说月报》，都由郑振铎兄来信接头。那时振铎兄在北京，彼此也没有会过面，他见我在《新潮》上登载几篇小说，就通起信来了。《小说月报》革新号印出来，我的一篇小说蒙雁冰兄加上几句按语，表示奖赞，我看了真有受宠若惊之感。到了上海，就到他鸿兴坊的寓所去访问他。第一个印象是他精密和广博，我自己与他比，太粗略了，太狭窄了。直到现在，每次与他晤面，仍然觉得如此。那时还遇见他的弟弟泽民，一位强毅英挺的青年。振铎兄已经从北京到上海来了。我们同游半淞园，照了相片。后来商量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拟订译本目录，各国的文学名著由他们几位提出来，这也要翻，那也要翻，我才知道那些名著的名称。

雁冰兄是自学成功的人。他在商务印书馆任事，编译工作不仅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磨练自己的课程。在主办《小说月报》以前，已经有好些著译问世了。那时候似乎还不大有人注意世界文艺思潮，杂志上的一些译品，以及成本的翻译小说，无非像苏州人所说“拉在篮里就是菜”，碰到什么就翻

什么。雁冰兄却专心阅读外国的文艺书报，注意思潮与流派，又运用他的精审识力，选择内容与风格都有特点的那些小说翻出来，后来编成的集子如《雪人》《桃园》等，大家认为是最好的选集。他把许多书堆在床头，纸笔也常备，半夜醒来，想起些什么，就捻亮了电灯阅读，阅读有所得，惟恐遗忘，赶紧写在纸片上。当时我闻知他有这样的习惯，非常钦服，我是从来没有这样勤奋的。

《小说月报》的革新是极有意义的事。这种杂志记得创刊在宣统年间，原只是供人消闲的东西。后来恽铁樵先生接办，要在小说之中讲求古文义法，未免矫枉过正。恽先生办了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又由先前的编者王莼农先生接办，恢复了以前的格调。但是“五四运动”起来了，喊出了“新文学”的名称。就粗处说，新文学好像等于白话文学，其实不尽然；除了使用白话以外，大家心目中还有一个朦胧的影象，要求一种骨子里全新的文学。于是雁冰兄接办《小说月报》了，理论与作品并重，对于文学，认认真真做一番启蒙工作。在以前，梁任公先生以及其他几位也出过小说杂志，用意也在启蒙，然而他们的观点太切近功利，刊载的作品又是谴责性质的居多，反而把文学的功能缩小了。我不说革新以后的《小说月报》怎样了不起，我只说自从《小说月报》革新以后，我国才有正式的文学杂志，而《小说月报》革新是雁冰兄的劳绩。

雁冰兄起初不写小说，直到从武汉回上海以后，才开始写他的《幻灭》。其时《小说月报》由振铎兄编辑，振铎兄往欧洲游历去了，我代替他的职务。我说，让我试试。虽说试试，答应下来就真个动手。不久，《幻灭》的第一部分交来了。登载

出来，引起了读者界的普遍注意，大家要打听这位“茅盾”究竟是谁。徐志摩先生曾经问我，“《幻灭》是你的东西吧?”我摇摇头，“我哪里写得出这样的东西。”他也不再问究竟是谁了。我想他一定厌我不肯坦白告诉他，雁冰兄在第一部分原稿上署名“矛盾”，他自有他的意思。可是《百家姓》中没有矛姓，把“矛”字改写成“茅”字，算是姓茅名盾，似乎好些，这是我的意思。与他商量，他不反对，就此写定了。谁知道后来有少数人以为“茅盾”是“矛盾”的正写，在用到“矛盾”的地方有意把“矛”字写成“茅”字，这贻误的责任应该由我负担。

《幻灭》之后接写《动摇》，《动摇》之后接写《追求》，不说他的精力弥满，单说他扩大写述的范围，也就可以大书特书。在他三部曲以前，小说哪有写那样大场面的，镜头也很少对准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我很荣幸，有读他三部曲的原稿的优先权，又一章一章的替他校对，把原稿排成书页。那时我与他是贴邻，他的居室在楼上，窗帷半掩，人声静悄，入夜电灯罩映出绿光，往往到深更还未捻灭。我望着他的窗口，想到他的写作，想到他的心情，起一种描摹不来的感念。如今回想起来，那种感念依然如新，但是时间相距已经十七八年了。

他作小说一向是先定计划的，计划不只藏在胸中，还要写在纸上，写在纸上的不只是个简单的纲要，竟是细磨细琢的详尽的记录。据我的记忆，他这种工夫，在写《子夜》的时候用得最多。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品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近来他写《霜叶红似二月花》与《走上岗位》，想来仍然是这样。对于极端相信那可恃而未必可恃的天才的人们，他的态度该是个可取的模式。

最近问起他《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后文如何，他告诉我还没有写下去。我心里想，《霜叶红似二月花》缓些也无妨，按照他以前写三部曲的先例，在这个时日，他有更急于要写的题目，大家在等待写那种题目的作品，而他正是适于写那种题目的作者。可是我没有把这个意思说出来，我知道说了出来他将怎样回答我。然而，那种沉闷的天气会长久吗？“争自由的波浪”终将掀动整个海洋。今年雁冰兄五十岁，算它十年，到他六十岁的时候，他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必然写了起来而且完篇了。我们等着吧。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发表

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胡愈之先生是我们《中学生杂志》的老朋友，从《中学生杂志》创刊到复刊，他一直给我们许多帮助，不但为我们写文字，还帮我们出主意，定规划。如今的新读者也许不很知道胡先生其人，可是从五年之前起往上溯，那时候的读者一定知道他。假如那时候的读者在《中学生杂志》以外还看旁的杂志，接触他的文字更多，那就不但知道他，并将永远的记住他了。

今年得到消息，说胡先生在南洋某地病故了。朋友们听了，都感到异样的怅惘，与他作朋友很少会是泛泛之交的。消息极简略，可是据说十之八九可靠。我们真个失掉了这位老朋友吗？于是大家作些文字来纪念他，汇刊在这儿，成个特辑。万一的希冀是"海外东坡"，死讯误传。如果我们有那么个幸运，等到与他重行晤面，这个特辑就是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也颇有意义。

我不想在这儿说我与胡先生的私交，因为这在一般读者看来，没有多大关系。我只想说胡先生的自学精神。他没有在中学毕业，从职业中学习，从生活中学习，始终不懈，结果既博且通，为多数正途出身的人所不及。我们经常标榜自学，也许有人以为徒然说得好听，难收真实效果。但是我们

可以坚决的说绝对不然，胡先生就是个最可凭信的实例。

我只想说胡先生的组织能力。他创设了许多团体，计划了许多杂志与书刊，理想不嫌其高远，而步骤务求其切实。他善于识别朋友的长处，加以运用与鼓励，使朋友人人尽其所长，把团体组织得很好，把杂志书刊办得很好。这种能力，在现代社会中是极端需要的，却又是一般人所极端缺乏的。章程议定，计划通过，招牌挂起，下文就没有了，是我们常见的事。但是我们深切的知道，要真个干一些事，非有胡先生那样的组织能力不可。

我只想说胡先生的博爱思想。我想这或许是从他学习世界语种下根的。世界语原来不仅是一种工具，其中还蕴蓄着人类爱的精神。后来他入世更深，知道普遍的人类爱还是未来的事，在当前，有所爱就不能不有所憎，爱的方面越真切，憎的方面也越深刻，深刻的憎正所以表现真切的爱，而表现的方式不限于用口用笔，尤其紧要的是用行为。在后半截的生涯中，他奔走各地，栖栖皇皇，计划这个，讨论那个，究竟何所为呢？为名吗？为利吗？都不是。无非实做“有所为”三个字而已。为什么要“有所为”？本于他那种博爱思想，只觉得非“有所为”不可而已。

我只想说胡先生的友爱情谊。这与前一点是关联的。朋友之可贵，不在聚集在一起吃点儿，喝点儿。一个人既要“有所为”，他知道无论什么事决不是独个儿办得了的，必须与他人通力合作才成，那时候朋友就像自己的性命一样，友爱情谊自然而然深挚起来。近来有几位朋友与我谈起，朋辈之中，胡先生最笃于友谊，他关顾朋友甚于关顾他自己。在感

叹家说起来，这是“古道”，如今不可多得了。其实这也是“新道”，惟有不“古”不“新”的人物，才以为友谊是无足轻重的。

以上说了四点，自学精神，组织能力，博爱思想，友爱情谊，是胡先生的长处，我们一班朋友所公认的。关于这四点，都没有叙及具体事实，因为几位朋友的文字中都有叙及，不必重复了。

在纪念人物的文字中，有句老调，“我们要学某人的什么什么”。我不想学这句老调。我以为看了几篇纪念文字就会学起某人来，没有这么简单，“学”的因素很多，种种因素具备了才得完成个“学”字。不过，看了几篇纪念文字，在思想行为上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如茅盾先生说的，受了那人物的感召力，是可能的。现在我们纪念胡先生，一位可敬的朋友，写了几篇纪念文字，这几篇文字如果能在读者的思想行为上发生若干影响，那就不是浪费笔墨，我们对于胡先生的怀念也可以稍稍发抒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发表

文艺工作者的另一种任务

扫除文盲，已经嚷了许多时日，到底扫除了百分之几，谁也不知道，大抵为数很少。有人以为，这由于文盲实际生活上不需要识字；这种解析跟说穷人不需要什么卫生清洁一样，显然是胡扯。试看夜学校以及成人识字班的实施情形，再调查国民学校的分布与教学现状，倒让人起了疑心，似乎扫除文盲其名，希望文盲一辈子盲下去其实。马马虎虎请个教师，“天”啊“地”啊乱念一阵，不把识字连系到实际生活上去，修习期满，事情就此完毕，也不替那些勉强识了几个字的人预备适当的读物，经过不久，让他们把勉强识了的几个字又忘了，就又回到文盲的境界里去。若不是希望文盲一辈子是文盲，若真有扫除文盲的诚意，肯这么办吗？这种希望，当事人不一定清楚地意识着，也许含在他们的下意识里；但不管怎样，希望的原因并无二致：他们觉得文盲一旦不盲了，对他们多少是不利的，不如不扫除的好。

就文盲一方面说，识字有种种利益，而接触文艺是其一。就作者方面说，期望文盲不盲，与一切爱着大众的人相同，因而急切期望把文艺献给他们。两方面的相因相需如此，不就可以见到在今日，文艺运动得赶紧与扫除文盲真正配合起来么？

文艺固然要求能为大众所理解，却决不能故意迁就，写成些不三不四的东西。而大众在向来不受文艺陶冶的情况之下，要求了解也不十分容易，哪怕他们已经识了不多几个字，哪怕他们仍旧不靠视觉而靠听觉。很可能接触文艺是一回事，了解文艺是另一回事，如果接触而不了解，与不接触又有什么分别？接触与了解之间必须打通。打通的工作由旁人去做，不如由作者自己去做，作者从作品中间，或者谈说指导中间，想出方法把它打通，那就不但普及了，而且提高了，也才使得文艺有了应有的作用。

不知道干文艺工作的朋友们觉得怎样？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发表

原题为《文艺者的另种任务》

手工艺对心理建设之贡献

今天要我讲的题目是《手工艺对心理建设之贡献》。把“手工艺”和“心理建设”连在一起，想得很玄妙。而且题目实在太含糊：所谓“对心理建设”，究竟是对哪些人的心理建设，是怎么样的心理建设，都不确定。但讲的内容早已被题目所决定：“对心理建设之贡献”，那就是说手工艺对心理建设是有贡献的；究竟有无贡献，或怎样才有贡献，何时才有贡献，已不容讨论。不过题目既这样出了，卷子总得交。从前做八股文章，有所谓“搭题”。我只能袭用这方法，把“手工艺”和“心理建设”搭起来讲一下。

要讨论手工艺，可把手工艺的“艺”和从事此“艺”的“人”来作对象。我们发动改进手工艺运动，就是为了“艺”和“人”。改进“艺”，有文化的价值；而改善“人”的生活，则有民生的价值。“艺”虽然精粗不同，然而很多人以此为生，所以要改善“人”的生活，就得改进“艺”，使“艺”的产品有出路。同时，“艺”是人的产物，所以要改善“人”的生活，使他有能力和兴趣去创造发展。

手工艺的门类甚广，就经济意义言，可包括很粗的“艺”，很多日常生活必需品，都是手工艺品。从文化意义言，可包括很精的“艺”，许多名贵的艺术品，也都是手工艺品。我们

为了发展经济建设而从事此改进手工艺运动，当然是以经济意义为主，尤其是注重于几种可以发展外销市场的手工艺品。但我们进行一种事业，要有“无一夫不得其所”的胸襟。最好把艺术品和经济品同包含于手工艺中，改进之初，可先选定几部门着手，逐渐扩大推广。

其次要讲到“心理建设”。所谓“心理建设”，当然是要建设对人群有益的心理，这就是教育的意义。记得从前有人对教育下了个定义，他说：“把所学的东西忘记了，剩下来的才是教育。”这定义似乎很滑稽，其实却含有至理。学生在学校读书，一天到晚上课自习，等到毕业，大部都忘记，这些忘记了的知识，不能说是教育，这学生在校所养成的生活习惯，以及所得到的与他日后生活有关的知识和技能，这才是教育。现在学校大多只注重书本。四维八德，精神讲话，成为家常便饭，但讲者自讲，听者自听，言和行决无关系。甚至劳作也用书本，教员在坛上讲，用什么原料，怎样做，方式怎样，学生记笔记，这就算劳作。这样书本的讲授，对实际生活没有一点作用，因此很容易忘记，这怎能算是教育呢？所谓“教育即生活”即是此意。所以要从事心理建设，必须注重实际生活。

手工艺的心理建设，可分三方面说明：

一、从事手工艺运动者的心理建设。既以提倡手工艺自居，则不可取抱残守阙主义和救济施舍的态度。因为人有怀古的情绪，例如一块石头，曾经苏东坡坐过，后人即珍视爱惜，加以装饰，如同至宝。其实苏东坡坐过的石头尽多，要把这些石头搜罗陈列，非但不可能，就算能办到，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抱残守阙。此种观念，决不可用以作为提倡

手工艺者的心理。因此，有些手工艺，对民生毫无关系，或艺术上毫无价值，尽可任其淘汰。如以抱残守阙的心理从事此运动，便是认错时代，便是开倒车，且亦不能成为运动。

至于出乎救济施舍以提倡手工艺运动，也是不正确的观念。因为救济与施舍，其心理出发点是“怜悯”。因此遂有“人”“我”之分，而且“人”为不幸者，“我”为幸运者。倘站在人我一体之立场以观，则相差太远了。要认为提倡或扶助乃是分内之事。提倡手工艺，是为了手工艺，而非为了救济和施舍而来。再如一般人常说：“某些人没有知识，可怜可悯”，其实仔细分析，无知识自有种种原因，不当以怜悯的态度对待，而要消灭这些原因。并且从事此运动者亦当向工人学习。如有这种心理建设，也就差不多了。

二、手工艺者的心理建设。工作者要认为理想的目标就是工作，工作即所以满足其创造冲动，一方面获得生活，一方面得到愉快，这就是达到艺术的境界。但要达到艺术的境界，就是艺术家也往往不能兼得，普通手工艺者更谈不到。最近英国威洛克先生发表两篇文章，劝中国莫走英美经济发展的路径，担心工业化了，人就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其实手工艺者还不是等于“技艺”的奴隶，从小学得一艺，遂藉以糊口，终此一身，并无创造可言。例如康熙窑，乾隆窑，是手工艺而近于艺术品。那时因皇室贵族的提倡，集全国艺术家而从事改进，遂成精品。但工人也无非依样画葫芦，对此工作也许感不到丝毫兴趣。而且从前的师徒制度根本不讲这一套，学手艺为了糊口，故墨守成法，因陋就简。此后在技术方面希望有所改进，最基本的还是养成工人的创造兴趣，无论何种手

工艺者，都抱艺术家的心情，则其作品必可日趋精巧。

三、享用者的心理。有许多手工艺品，大家认为奢侈品。其实奢侈品与必需品很难分别，要以生活程度而定。例如花瓶台布等，在贫苦农家中认为是奢侈品，而在大都市的中上层家庭中，则几乎被认为必需品。在解决民生问题呼声中，生活水准应该普遍提高，除了吃饱穿暖而外，也希望大家享用很好的工艺品，以供精神上的享受。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四日

无名英雄铜像

——纪念"七七"的艺术品

成都城各门，原有的城墙城楼都拆除了，开辟成很宽的街道。在东门，立着一座无名英雄铜像，面朝着东，形体比真人大约大半倍，台座有两个半人那么高。那座铜像是刘开渠先生的作品。承蒙刘先生和摄影的高岭梅先生赠给我们铜像的相片，我们就把它制成铜版，印在这里，让全国少年都看到。

立铜像无非是纪念的意思。某人为社会国家立了大功，某人为学术文化开了新路，就替他们立个铜像，表示大众对于他们的劳绩永远不忘，同时也鼓励大众自己，谁都该像他们一样有很好的劳绩。

无名英雄是谁呢？他不姓张，不姓李，也不姓别的，他不叫克胜，不叫国华，也不叫别的，可是代表了姓一切姓叫一切名字的人。换句话说，他是大众凝结而成的人，他是代表大众精神的人。有许多劳绩，不是某一个人做下来的，是大众竭尽了心思和力量做下来的。要纪念那种劳绩，造某一个人的铜像当然不对，就应该造无名英雄铜像。各国往往有无名英雄铜像，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说成都东门那个无名英雄铜像。他是士兵，眼望着前，手拿着枪，作准备刺击的姿势，左腿弯曲，右腿点在后

面，好像刚从战壕里跳起来就要冲锋的模样。这样的铜像纪念什么人？想来谁都会立刻想起是纪念抗战的大众。直接与敌人对垒的固然是士兵，士兵而外，贡献出所有的心思和力量的人，他们同样的志在消灭敌人，争取胜利，他们和士兵是一体，他们也是士兵。所以，一个士兵的像可以代表抗战的大众。他面朝着东，是因为四川在我国的西部，是我国的抗建根据地，而我们的敌人在东面的缘故。

刘开渠先生造那无名英雄像，花了七个月的工夫。原来造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作篇文画幅画一样，先得在心意中有个底子，那底子朦朦胧胧还不行，必须清清楚楚，才可以动手。如果造某一个人的像，只要就某一个人本身或者他的相片观察，看出他的精神情态来，心意中就有了个底子。现在刘先生造的像不是某一个人，是代表大众的人，把握那底子就更难。他得就大众观察，看出他们共通的精神情态来，才可以得到他的底子。刘先生告诉我说，我国人最大多数是农人，实际上当士兵的又全都是农人，所以他那个像是个农人的型式。现在许多画家木刻家都喜欢替农人造像，可是他们往往把嘴唇画得很厚，又把面部表情画得像西方的工人。据他的观察和理解，我国农人的嘴唇并不那么厚，面部表情也并不像西方的工人，稍带长形的脸，颧颊略高，眼睛有神，表现出能想，肯干，质朴而不迟钝的本色。就体格说，我国农人一般的不丰腴，可是强健有力。他心意中把握住这样的底子，才动手造那无名英雄像。

看一个造像，通常有几点应该注意。第一，看他匀称不匀称，自然不自然。既是人的像，当然以真人为标准。肢体大

小长短的比例与真人相合，那就是匀称。所取的姿态与真人的姿态不相违背，那就是自然。第二，看他稳定不稳定。造像是建筑性的东西，所谓建筑性，就是建筑物必备的条件。比如一所房子，底部很小，上部却伸展开来很大，虽然用了种种方法可以使他不坍，但是人看了总觉它不稳定，心理上感得不舒服。房子是必须看起来稳定才行的。造像与造房子是同类的事，不能失了建筑性。那些惊险的姿态，稍纵即逝的瞬间动作，通常说来都不适于造像，就为这个缘故。第三，看他那形象之中，含蓄不含蓄某种精神。前两点做到了（就是说匀称了，自然了，稳定了），不一定就是艺术品，成不成一件艺术品还得看第三点。艺术家利用形象，造成艺术品，就为要表出他所见到的某种精神。如果没有那某种精神，那就是空虚，就不成其为艺术品。

现在请把铜版图翻出来，依据以上说的三点来看那无名英雄像。他匀称而自然是一看就明白的，不消多说。他的姿势是冲锋以前的姿势，眼睛望着前方，上身稍稍向前，脚正要向前跑，枪尖也指着前方，全身是统一的。全身充满了力量，但是不太泄露，重量落在跨开的两腿之间，所以见得稳定。所谓含蓄着的某种精神，也就从这里见出。全身统一，表出举国一致的抗建精神。力量不太泄露，表出大众的潜力无穷。马上要拔脚冲锋，表出战斗的场面还在前面。抗战固然是剧烈的战争，就是建国也是剧烈的战争，在那战争中都要由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去冲锋陷阵，才能取得胜利。这么想开来可以想得很多，都是含蓄在那铜像里的所谓某种精神。因此，一般批评都说刘先生那无名英雄像是一件成功

的艺术品。

关于那铜像的眼睛，还有些可以说的。多数铜像都照真人的眼雕出眼球儿来，但是真人的眼球有眼黑，看起来有神，铜像石像的眼球儿没有眼黑，光线射上去起了反射，就像盲人了。我们看过一些造像，又看过一些造像的相片，凡是照样雕眼球儿的，都觉得像个盲人。刘先生为了要避免这一层，他造那无名英雄像没有雕眼球儿，在眼眶里，他只雕了个圆洼儿，光射上去不起反射。从下望去，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了。在铜版图里可惜看不清，最好到成都东门看那铜像的本身，就比看我在这里写的容易明白了。

刘开渠先生是从法国学习雕塑的。二十三年回国以后，在各处造了许多铜像，这里不细说。无名英雄像是去年的作品，七月七日立起来的。今年他造成了中山先生的坐像，不久将要安放在成都中山公园门前。

附带说一说造铜像的步骤。心意中有了个底子之后，先塑一个一尺光景高的泥像，这好比文字的草稿。心意中的底子合适不合适，要看塑成的像才可以断定，如果不合适，凭塑成的像就可以修改。合适了，修改停当了，把他放大，又塑一个两尺多高的泥像。放大用衡量的工具，所以全体各部与小的一个比例相同，不会差错。这一回是研究细节了，如衣服的褶纹，肌肉的凹凸之类。像高两尺多，体积大了，这些细节目才可以仔细推敲，仔细塑造。细节目都妥妥帖帖了，又把他放大，塑成预计中的铜像那么大小的一个泥像。然后取石膏粉和以水，拌成石膏浆，涂在泥像的某一部分。石膏浆不到五分钟就干了，结成很坚硬的一块。照同样方法，再涂

其他部分，直到周身都涂遍为止。把那些结硬的石膏一块块的取下，拼合起来，就是个阴模。然后把石膏浆灌进阴模，灌之前先得在阴模内层涂上肥皂水，以免与灌进去的石膏浆胶粘。待它结硬的时候，解开阴模，中间就是个石膏像，与泥像一模一样。再就石膏像用湿沙做成个阴模，烤干之后，把熔化的铜灌进去。待它冷却的时候解开，中间就是个铜像。石膏的阴模不能灌铜，因为它经不起熔铜的热度。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发表

木　刻

板画是图画中的一个部门，由于所用材料不同，又可分成铜板画、石板画、玻璃板画和木板画四种。木刻属于木板画，也称作板画或刻画，普通就称作木刻。

木刻的材料当然是木材。木材以梨、枣、白杨最为合适。这几种木材的质地都比较细密。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木刻，大多也用梨枣为材料。所谓“灾梨祸枣”，就是说梨木枣木可以作为刻书的材料。倘若刻的是一部坏书，那么这两种木材未免白白地遭殃了。

木刻最主要的工具当然是刻刀。刻刀大致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偏刀，一种是角刀。偏刀用来刻凸起的线条，把大片的木质铲去，剩下凸起的线条。角刀是三角形的，为了使用的方便，又有大小宽狭各种形式，都用来刻凹陷的线条。

我国木刻曾因佛像的印刷，有一个时期很为发达。后来佛教势力衰落了，木刻也跟着消沉下去。至于现代的木刻，与我国古时候的木刻并不完全相同。古时候的木刻是“白纸黑图”，画面本身像张白纸，刻出来的东西像画在纸上的素描，通常只绘出轮廓，而不用阴影来烘托。要是拿已经刻好的木板来看，画的东西是凸出来的，好比“阳文”的印章。现代的

木刻恰恰相反，是“黑纸白图”，刻出一些线条表现明亮的部分，留下的表现阴暗的部分，使人看了有立体的感觉。这进步其实和绘画一样。要是拿已经刻好的木板来看，就像“阴文”的印章。

当然，现代的木刻也不是绝对不用古时候的方法，常常在一幅画上，两种方法同时参用。不过比较起来，现代木刻采用“黑纸白图”的方法的来得多些。

有了木板和刀，就可以动手刻了。木板有时候该用横断面的，有时候该用纵剖面的。大凡刻精细的画，就得用横断面的，因为横断面的木纹比较细。普通木刻就用纵剖面的。前者称为木口木刻，后者称为木面木刻。

木板先要磨光，涂上一层墨，又用铅笔在上面把画稿打好，然后动刀。别的国家的木刻家也有先把画稿打在透明的纸上，又用蓝色晒图法印在木板上，然后动刀的。我国现在的木刻家大多把画稿直接打在木板上。

把图画直接画在纸上，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经过刻木的手续？这不是浪费吗？不，木刻非但不浪费，还具备着更经济的条件。普通一张图画，常常为一个人独占，供少数人欣赏。木刻画却可以拓成许多许多张，供许多许多人欣赏。另一方面，木刻画具有明快、朴素、有力的特色，在艺术上有它独特的价值。

在苏联，木刻艺术特别发达。在我国，经鲁迅先生的提倡，才开始有人重视木刻，从事木刻。十多年来，我国从事木刻工作者相当努力，到现在，我国的木刻已经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产生了特有的作风，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这里选载了一幅木刻，古元先生的《运草》。

古元先生在鲁迅先生提倡木刻的时候，就热心从事木刻工作了。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创造了他自己的风格，有了很大的成就。古元先生作风上的特点，是参用古时木刻与现代木刻的刻法，就是在一幅画面上，一部分的线条属于“白纸黑图”那一种，一部分的线条属于“黑纸白图”那一种。主题方面的特点，是专从平民生活取材，尤以描摹农民生活的为多。所以很多人都尊敬他，称他为服务人民的艺术家。

《运草》是以现代木刻的刻法为主，表现农民生活的一张木刻。因为画面上黑的部分比较多，所以能给我们一种情调浓重的感觉。在北方，大家爱好农民的生活，重视农民的工作，这也许是古元先生把这幅木刻的情调表现得很浓重的原因吧。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发表

“胜利日”随笔

今天“胜利日”，你作何感想？

当然是极度的高兴。我有生之年是甲午，从甲午到今年五十二年，这五十二年中，我国人受了日寇不知多少侵害，就我一家而论，也受了日寇好几回直接损伤。现在日寇投降了，以后他们会不会彻底悔改，固然要看同盟国家的管制如何，日本全国人民的觉醒如何，可是仇恨的“前账”可以结一结了。结清前账，心头一松，极度的高兴在此。

从今天起，第二次大战结束了，世界上法西斯的最后堡垒倒塌了，虽然有些“法西斯细菌”还待各国人民努力清除。若问“老百姓的世纪”什么时候开始，就全世界而言，可以说开始于今天。老百姓的世纪与以前的世纪有什么不同？我回答说：老百姓的世纪将实现法国革命时候的三大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与罗斯福先生提出的四大自由“发表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三大原则与四大自由是实实在在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都有好处的，怎能叫我不极度高兴呢？

还有旁的感想吗？

我愧对牺牲在战场上的士兵同胞，愧对牺牲在战场上的盟军。

我愧对挟了两个拐棍，拖了一条腿，在东街西巷要人帮忙的“荣誉军人”。

我愧对筑公路修飞机场的“白骨”与“残生”。

我愧对拿出了一切来的农民同胞。

我愧对在敌后与沦陷区，坚守着自己生长的那块土地，给敌人种种阻挠，不让他们占丝毫便宜，同时自己也壮健地成长起来的各界同胞。

我恨着——今天算是吉祥的日子，恨着的话暂时不说吧。

还有吗？

当然还有，说起来将无穷无尽。“三句不离本行”，单就有关本行的说一些吧。战争结束了，老百姓的世纪开始了，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应该立刻取消了。要彻底的无条件的取消，再不要什么尺度与标准。凡是身体与精神都健康的人，凡是认认真真生活的人，他们想要发表些什么自有尺度，自有标准。什么是他们的尺度与标准？要自己好，要大家好，不损伤自己的自由，也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就是他们的尺度与标准。除此而外，如果还有什么尺度与标准，由某些人定下来，要他们遵守，这就是加给他们的精神上的迫害。无论你定得怎样客观，怎样公平，怎样有道理，总之是加给他们的精神上的迫害。只要想，由人家定下尺度与标准，就是划定了个范围，只许在范围里面发表，不许在范围以外发表，四大自由的第一项“发表的自由”不就受了侵犯吗？说这是精神上的迫害，理由就在此。所以这个制度要立刻取消，要彻底的无条件的取消，让大家得到发表的自由，像检回一件失去已久的宝贝一样。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作

发表的自由

罗斯福先生提出的四大自由为全世界的人所信从。并不因为罗斯福先生提出了大家才信从，只因为四大自由表示了人类改善生活的真切需求。四大自由的第一项就是发表的自由，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一项自由（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是九月初，所谓“现在”就指一九四五年九月初）。

我们必须得到这一项自由，无条件的得到发表的自由。

凡是身体与精神都健康的人，凡是认认真真生活的人，他们发表些什么自有标准，自有尺度。什么是他们的标准与尺度？要自己好，要大家好，不损伤自己的自由，也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就是他们的标准与尺度。除此而外，如果再有什么标准与尺度，由某些人定下来，要他们遵守，这就是加给他们的精神上的迫害，无论你定得怎样客观，怎样公平，总之是加给他们的精神上的迫害。只要想，由人家定下一些标准与尺度，就是划定了个范围，只许在范围之内发表，不许在范围以外发表，发表的自由不是受了侵犯吗？我们说这是精神上的迫害，就在于此。

我们不要某些人或某一集团定什么标准与尺度了。我们要无条件的得到发表的自由。

从今以前，我们没有发表的自由，为了这个，受了不知

多少的气。但是，在抗战期间，一切为了抗战，好容易隐忍过来了。像孟子所说的孤臣孽子似的，“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发表一些意见，却被认为诐辞邪说。不肯摹仿八股腔调，不肯像喜鹊似的叫出些吉祥的声音，就被认为不依规矩，别有用心。好像为国为民只是少数人的专利，此外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为国为民，所以也没有权利为国为民。其实哪里有这回事！多数人的真心为国为民，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竟然受到了非议，气就气在这一点上。

过去的事不说了。现在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要建立社会新秩序，大家好好儿过活，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没有发表的自由了。

主张发表的自由决非要与人捣蛋，教人捣蛋。如果这是一种捣蛋的主张，全世界的人哪里会信从它，给自己添麻烦？这一层原是简单不过的道理，大家知道，只恐有少数想不通的人还不大明白，所以要提一提。

最浅近的比方，所谓民主政治好比公司组织。张三李四赵五王六都是股东，高级低级的官员是经理与各级职员，是代替股东办理公司种种事务的。股东有无条件的发表的自由。发表出来也许你说东，我说西，你说正，我说反，但是大家要把公司办好是一致的，要于公司有利从而于自己有利也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发表无害于一致的目标，因为最后取决于多数。如果有一个公司，股东没有发表的自由，一切事情不经讨论辩难，不取决于多数，只由经理与各级职员去胡搅，那还成什么公司？股东的权利给经理等人抢去了，股东是被侵害者，经理等人是侵害人家的罪人，这么两批人凑在一块儿，

还成什么公司？公司办不好，股东的吃亏至多是折了本，还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参加国家这个大公司，当它的股东，却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它办不好的，如果办不好，社会秩序就乱了，我们非但要折本，而且要生活不下去。发表的自由列入四大自由之中，理由就在于此。

我们要得到发表的自由，像检回失去了的宝贝一样。

一九四五年九月作

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

就古的说，秦始皇的焚书，就近的说，清朝的搜禁书籍以及窜改历代书籍，都与现代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若合符节”。

从秦始皇到清朝，行的是所谓专制政治。专制政治的要点，一面是统治者，一面是被统治者。统治者居于主人的地位——牛羊所有者那样的主人的地位，被统治者只有实做牛羊的份儿，牛羊该怎么样，全凭主人的意志：这就是专制政治。

既是牛羊，还有自由思想的资格吗？还有自由发表的馀地吗？当然一切都得听从主人，于是来了焚书，禁书，改书，图书杂志审查那一串的办法。

我们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从一个基本的理解出发：现在无所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两方面了，所以行不通专制政治，所以用不着合于专制精神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

按我们的理解，政治是一切公众的事的总名称，大家都得参预。不是为了好事才参预，是为了要自己与他人的生活都好，不得不参预。参预的方式，大家发表意见，商量商量，求其至当，是一项。大家贡献力量，认认真真，做到至善，又是一项。至于各级行政人员，他们是受了公众的信任与委托，

办理公众的事的人。必须特别点明，他们不是统治者，他们也只有一份参预的权利，与任何人一样，不多也不少。又必须特别点明，他们必须是最精熟的技术人员与最负责的实行家。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当然没有存在的理由。要审查就得定出什么标准与尺度来，思想言论要合得上标准与尺度才可以发表，就等于有一部分思想言论不能发表，就等于不让大家尽情发表，仔细商量，这成什么话？而且，担任审查的人就是代替公众办理公众的事的人，用自己的手扼住自己的喉咙，除了傻子，谁愿意干这样的傻事？

推开一步说，即使所谓标准与尺度定得非常之宽，目前没有一种图书杂志被禁被删，将来也永不会有一种图书杂志被禁被删，这个制度还是要不得。有这个制度在，有所谓标准与尺度在，编书作稿的人去送一回审，盖个“审讫”的图记，精神上就受一回极严重的迫害。为什么我的思想言论要待盖上个“审讫”的图记才能发表出去呢？这好比每回上街先得去领一张通行证，不由你不感到过的是拘囚的生活。

所以标准与尺度紧也好，宽也好，全都一样。我们不讨论什么紧与宽，总之我们永远不要这个制度。我们不甘受精神上的迫害，我们要享有发表的自由。

我们不要这个制度，并不因为我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你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他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即使我的你的他的思想言论都没有被禁被删，将来也永不会被禁被删，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制度。制度存在，总有我你他以外的人受着精神上的迫害，我们与他人精神上是共通

的，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们受到迫害。

以上说的是一种全新的想头，至少在我国是一种全新的想头。我国向来行专制政治，处于牛羊地位的公众无所谓发表的自由。现在专制政治要结束了，发表的自由成为公众生活的要素，大家必须努力争取享有它，同时必须努力学习，使发表的自由收到充分的效益。一面争取，一面学习，从今开始不算迟，可是非开始不可。

切不可牵涉到一些因袭观念方面去。

陆放翁的诗道："近传下诏通言路，已卜馀年见太平。"如果把主张废除图书杂志审查制度认为"通言路"，那就牵涉到因袭观念方面去了，大错特错。试想，"诏"由谁"下"的？"言路""通"了由谁发表意见？发表的意见是不是就有实施的指望？"通言路"与"见太平"是不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把这些问题想一想，就知道与我们现在的情形全不对头。放翁那么想，作他那两句诗，我们不能说他胡涂，他处的是南宋时代。可是，我们倘若与他一般想法，那就是我们胡涂了。发表的自由与"通言路"完全是两回事，决不能连到一块儿。

还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呀，"下情上达"呀，这些说法与我们现在的情形也不对头。试辨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那句话的意味，防民之口是危险事啊，这是为什么人打算？现在还容得这种人存在吗？又试辨辨"下""上"二字，就见得阶级意味显然。现在在公众之间，还该有"上""下"的阶级吗？

有些人受因袭观念的影响太深，逢到一件事物，总爱往古书、故事、成语那方面胡扯。不要说口头笔头胡扯无关紧要。你会胡扯，就见得你认识不清；认识不清，就会使新事

物变质，搅得毫无实际效益，而且产生意料不到的弊病。

我们不妨重说一句，主张发表自由是全新的观念。这种自由，我国人以前没有享受过，从今起要享受它了，而且要绝对的享受它。

最后说出我们的具体的话。新闻检查要从十月一日取消了，很好。图书杂志审查也该取消，不要延缓，不要有什么过渡办法，取消就是立刻而且干脆的取消。

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发表

十月十二日随笔

依据经验，集会讨论什么事务，往往到写成会议录为止。在讨论的时候，大家不怕劳唇费舌，往复辩难，句斟字酌，一丝不苟。但是，会议录写成了，缮录，印刷，分发，归档，往后就没有下文。好像大家辛辛苦苦开个会，作一番讨论，完全为了造一份会议录似的，完全为了供他日查档之用似的。这是历来官僚政治的影响，深入到大多数人生活习惯方面的一个凭证。官僚政治讲究有凭有据，有交有代，也只讲究有凭有据，有交有代。会议录写成了，不是开过了会的凭证吗？人家问会议开得怎样，就捧出一份会议录来给人家看，这就是着着实实的交代，还该要求什么呢？不错，有凭有据，有交有代，是好的；但是凭据与交代只在一份会议录，就是彻底的形式主义，官僚政治的精华。如果只取这么个形式主义，为节省精神气力起见，索性不要什么形式，不要开什么会，岂不更好？

开会原为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务，小孩也能推知，应该到事务办妥为止。议决的怎么样，全照样办了，不打一丝折扣，才是成功的凭证，才交代得过去。因此，紧跟在议决之后的是实干。由谁干，怎么干，用多少时间干，都是实干之前必须规定的。为恐延误时期，走错路向，又得随时检察，务

使它不出岔子。这些不过是起码的常识，但是大多数人都不能身体力行。小而言之，学校里的班会级会，大而言之，商量国计民生的什么会议，都是议决的时候像模像样，若问实干的结果就无影无踪。大家把“干”字忘了，把检察忘了，总括一句，把要办的实实在在的事务忘了。我们不能不自己承认，我们中的官僚政治形式主义的毒太深了，这个毒不除去，什么事务也办不起来，更不用说办得好了。

以上的意思是看了今天的报想起的。今天的报上登载着国共商谈初步协议的会谈纪要。我不是说这一份会谈纪要将会与许许多多的会议记录一样，写定，发表，归档，往后就没有下文。现在大家已经明白官僚政治形式主义要不得，大家又很有认真实干，竭力除去以往所中的毒的表示，这一份会议纪要该可以成为实干的张本，所记的各项将从此进展而不是就此终结。我要说的是：改弦更张，走新的路子，往往因新习惯没有养成，旧薰染没有洗尽，以致做不到家，甚至落入向来的窠臼。这一点是大家需要警惕的。在这一份会谈纪要里，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有些问题解决了，但是只有了个原则。根据这些原则，确定办法，按期办妥，是今后紧要的事。要随时检察，国共两党检察，全体人民也要检察。办法确定了吗？如期办妥了吗？成功的凭证在哪里？是不是真个交代得过去？这些是检察的项目。为什么全体人民也要检察？因为那些事务都是关涉到全体人民的，关涉到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虽然会谈的只是国共两党。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作

看报偶得

说“不要失了人心”，话自然不错。退后若干步，加上个“太”字，说“不要太失了人心”，尤其见出悲悯之怀。不过听那声气，不免令人想见摇鹅毛扇的姿态。

摇鹅毛扇的，自己是无所为的，一切为的“主公”。从积极的策划到消极的诤谏，一切为的“主公”。“不要失了人心”，“不要太失了人心”，当然属于诤谏一类，其心良苦，非常显然。

站在人民的立场，声气该有不同吧。该会说“你们必须称我们的心，合我们的意”吧。

这儿所谓“你们”，按道理说，该是接受了人民的信任与委托，代替人民办事的。按事实说，固然无所谓信任，也不曾有过什么委托。可是“你们”既然在其位，谋其政，就有“称我们的心，合我们的意”的责任。否则又何必要“你们”。

“人民的世纪”开头，一切都得彻底改变，因袭观念完全要不得。舆论作摇鹅毛扇的姿态，就是因袭观念。办事的人不顾“人心”，胡为瞎搅，也从因袭观念出发。那因袭观念就是作君作师，由我摆布，固执成见，自以为是；再坏些，就是自私自利，作威作福。存着这样的观念，干这样的事，哪像什么“人民的世纪”？专制世纪的延续罢了，法西斯世纪的延续罢了。但是，人民已经是主人公了，怎么能容许延续？

所以大家要学习，大家要排除因袭观念，革自己的命，开创全新的作风。自己不革命，势必被革。到了被革的时候，就像大卡车轮子下的泥土，睬也没人睬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发表

也算呼吁

按传统观念说，干实际政治的人最紧要的事是“得民心”；在“人民的世纪”里，说法就不同了，干实际政治的人最紧要的事是为人民服务，替人民办事，服了务办了事还不算，必须使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受到实际的好处，才算做到了家。

无论传统观念与新型观念，无论“得民心”与为人民服务，替人民办事，其间有个共通之点，就是必须真正做到个“治”字。这个“治”字就是“政治”的“治”字，也就是字书上训作“处理”“整理”的“治”字，凡是叫做“政”的，原来必须处理得妥贴惬当，整理得有条有理才成啊。

治的反面就是乱。凡是叫做“政”的，决不能搞到乱的方面去。如果搞到乱的方面去，就特别称为“乱政”；按传统观念说，必至于“失民心”，按新型观念说，就是违反了人民的利益，必至于受到人民的斥责与唾弃。

以上是原则方面的话，以下就事实方面说。

打内战，就人民的立场说，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的。套一句滥调，兵凶战危，古有明训。法西斯势力蔓延起来了，侵略国家攻打过来了，为要保持各自的生存，为要维护人类的和平，才硬着头皮，拼着性命，打了一次惨酷无比的仗。

并不是人民喜欢打仗，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人类的几个公敌算是倒下去了，怎样扑灭他们的残焰馀气，使他们永远不得还魂，正是目前有心人绞尽脑汁的课题。看看各个战区的劫后情况，无非是粮食缺乏，衣料缺乏，经济混乱，交通阻梗。饿啊，冻啊，穷啊，行不得也哥哥啊，这一类的呼声到处可以听见。只要不是忍心害理的人，自然会与自己周围的人通力合作，把社会秩序恢复过来，把大家的生活安定下来，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大家过着欣欣向荣的生活。只要不是忍心害理的人，在这个时候，谁还愿意打仗，而且是打内战？内战，算什么呢？自己人打自己人，中了枪弹倒下去的是自己人，受了战事的影响，伤残死亡，颠沛流离的是自己人。这能与消灭法西斯的战争，抵抗侵略国家的战争相比并吗？这也是个不得已而为之吗？岂但并没有什么不得已，简直是完全不顾人民的利益，故意跟人民捣蛋的举动。万不要以为“人民”两字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像“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流，尽可以不必管他，要知道这两个字实在包容着张三李四赵五王六等等无量数具体的人。他们没有枪，但没有枪不就是没有力量。他们能想心思，能做工作，他们知道公众的事该怎么办，自己该怎么办；他们又知道信任谁，委托谁：这就是他们的力量。他们并不像可怜的羔羊似的，看见危机在眼前，就跪在地上乞求道：“求求你们老爷们，请不要打内战吧！”他们不容许打内战，就将凭他们的力量制止打内战。在人民的力量之下，即使是最愚笨的人，也会知道胜负属于谁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作

和　平　说

《扫荡报》改称《和平日报》，这个名字改得好，我极端赞同。在这个时候，"和平"两个字太可爱了。单是两个字没有什么可爱不可爱，可爱在"和平"两个字包容着无限的生意。好比看见了方才有点绿意的柳条，好比看见了从云层里透露出来的朝阳，好比看见了摇摇摆摆学走路，咿咿呀呀学说话的小孩儿：完全是生意，丝毫没有萧索、颓唐、衰败、死灭的意味，怎不教人可爱？说好比看见了什么什么，其实不大切当。人人心里有生意，人人不希望萧索、颓唐、衰败、死灭，这就可见和平是人人内心的愿欲，是坚强的抱持着的，不是存在外面，要待看见了才觉得可爱的。内心抱持着的愿欲，经人指名提示出来，见得人同此心，吾道不孤。这时候的欢喜是超过了看见了可爱的事物的。

凡是愿欲，必然期望它施于实际，见于事实。抱持越坚强，期望越真切。现在人人心里抱持着和平的愿欲，当然期望着事实上得到全面的和平，真正的和平。说人人，不免有些武断，难道没有一些人不要和平要捣乱吗？说我武断，我也承认，我的确不曾把每一个人的心作过测验。但是，我有个辩解，至少表面上没有一个人说过不要和平，要捣乱，这就可见和平是多数人共同的愿欲；即使有人不要和平，也不

敢公开表示，所谓“众怒难犯”，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没有一个人公开表示不要和平，我们就形迹上说，就是人人抱持和平的愿欲，似乎也未为不可。

要事实上得到全面的和平，真正的和平，单靠期望是办不到的，要实做，要大家努力，所谓“事在人为”。实做与努力的时候，有一些意识与态度必须去掉，否则就南辕北辙，和平绝对得不到。现在只说两点：一点是必须去掉私心，一点是必须去掉戾气。

私心是最愚蠢的心思。只知有自己，不知有人家，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人家的利益，以为这样做去，自己就占便宜了，其实这是最吃亏的。私心充其极致，一个人只好独个儿生活，像鲁滨孙那样去住在荒岛上。试问，鲁滨孙的生活好不好？人是靠着合群才能生活得好，个人与大群是息息相关的，这些道理在小学的公民教本上就有提起，并不是骗骗小孩子的胡言乱语，实在是积聚人类经验的精要之谈。要讲合群，就得去掉私心。去掉私心不是抹煞自己，是放开怀抱，与大众同心协力，从而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大家都好，个人会不好吗？要计较便宜吃亏，这是最便宜的了。然而偏有人连小学公民教本上的话都忘了，以为私心是便宜，去掉私心就是吃亏，岂非愚蠢之至？个人愚蠢原也无所谓，无奈私心不去，人家就受到他的坏影响。权力，他要抓在一个人手里，钱财，他要藏在一个人袋里，主意要他一个人出，饭要他一个人吃，这么搞起来，大群会不乱吗？会有什么和平吗？要得到和平，必须合群，必须人人去掉私心。去掉私心容易不过，只要把小学公民教本温习一遍，加上身体力行，就成了。

戾气，是与私心有关联的。内里怀着私心，表现在外面大体可以分两路。一路是笑嘻嘻，假殷勤，甜言蜜语，说得人家看不出他的私心。一路是竖眉横脸，大声嚷嚷，动不动举起拳头，表示谁要碰他，他就不客气，这是毫不隐藏他的私心，就他的神情姿态说，这就是戾气。我说戾气与私心有关联，就指后面一路而言。戾气充其极致，就成希特勒、墨沙里尼、日本军阀。就微细而言，街头巷尾，扭住胸膛，骂声满口，也是戾气之所钟。戾气在哪里，哪里就没有和平可言。希特勒、墨沙里尼、日本军阀的戾气，搅得全世界天翻地覆，人类若真有一星一毫的聪明，还不赶快觉醒，把中在身上的戾气消除净尽吗？消除戾气，要存仁心，要有诚意。用仁心诚意对人，就觉得人人是我的好朋友，好伙伴。无论商量什么，合作什么，自然有一种慈祥之气表现出来。仁心诚意，并不是道学家的艰难的工夫，实是匹夫匹妇都办得到的：谁去掉私心，谁就没有戾气了。

我写到这里，自己把前面的文字看过一遍，好像在什么学校里作训话似的。各样的说话，惟有训话最没有效果。这个人也训话，那个人也训话，几曾见在听众身上收到了实效？我一向看清这一点，却偏偏要说些训话似的话，要去掉私心啊，要去掉戾气啊，这叫明知故犯。我不怕我的话等于白说，只望抱持着和平的愿欲的人，并非听我的话，却从实生活中体验出来，自己勉励，与人相互勉励，去掉私心，去掉戾气，使全面的和平真正的和平从早抓在我们手里：在这个时候，和平太关紧要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作　发表于《和平日报》

暴露的效果

在先严禁暴露。凡是越真切越深入的写叙一些事象的文篇，越难出头露面。理由颇为正大，一则说，恐怕动摇了大家对于抗战的信心；二则说，恐怕被敌伪利用作为他们宣传的资料。谁都巴望大家对抗战的信心坚若金汤，谁都不愿意让敌伪得到什么宣传的资料，就觉得严禁似乎情有可原。

其实这样想未免近乎好好先生。你说情有可原，就是同意了“家丑不可外扬”。家丑外扬，固然大煞风景。可是家丑如果永远丑下去，或者越来越丑，岂不是实际上大糟其糕？你既同意不可外扬，同时必须赶紧消除那个丑，才是正理。否则那个丑本身会长了翅膀“扬”出去，你愿意替它遮遮掩掩，也只是空有了个好心；而那个丑到了本身长了翅膀“扬”出去的时候，它的灾祸更将厉害万倍了。好好先生的想头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的。

现在检查制度表面上算是取消了。虽然禁止的法门还是不少，如不许发刊，如扣留邮寄；但是就见到的报志来说，暴露的文篇的确比先前多了些。别的不说，单是包办复员的那些大人先生的举措行动一项，已经占了大部分篇幅：使人起其丑不可向迩之感。外扬吧，尽量外扬吧，直到再没有家丑的时候。

但是，影响如何呢？似乎也看不大出。在身当其事的人，以前是自己心虚，只怕人家知道，所以造出种种理由来，严禁人家暴露；如今是不再心虚了，心窍翻了个身，胡作非为是正道，偷窃抢夺是权利，为国为民是梦话，为己为私是哲学，所以你们描摹也好，谩骂也好，我总之只当没看见，没听见，还是按照我的哲学我行我素。到此地步，使人觉得暴露的效果竟然等于零。

莫非暴露的确无济于事吧？其实并不然。一般人把家丑作为茶馀酒后的谈资，那当然无济于事。或者愤慨一阵，痛骂一通，事过情移，也就罢了，那也无济于事。如果想，家是我的家，丑不该出在我的家里，现在既然出在我的家里，必须把它消灭了才罢休——暴露就产生了效果。

身当其事的人，心窍既已翻了个身，就只能希望一般人都作如是想："家是我的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发表

赠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诸君

政治协商会议要开了。各党的英才和社会的名彦聚在一起开这个会，很不容易，也很关紧要。依我浅陋的想法，诸位必须把政治两个字作最常识可是最基本的解释。政治就是公众的事，不仅是在朝党在野党的事，不仅是为写论文开座谈会的学者名流的事，在重庆街头肩起一条扁担等人来雇用的挑夫也有份，在小龙坎田地里舀起粪水浇大脑壳青菜的农夫也有份。诸位协商，必须商出一些切切实实的纲领和办法来，把公众的事办得上轨道，有进步，使公众的生活渐渐好起来。

想到公众，国内的打仗就得立刻停止，正在动手的自己停手，站在旁边的劝他们停手。现在仿佛有人这么想，反对内战是川省人所谓"乱说"。那真岂有此理。公众不要内战当然表示反对内战。公众所以不要内战，就只为内战要把生活搅得更苦更惨。倘若说反对内战是"乱说"，难道发动内战才是正理？一些无谓的宣传，骂人的言辞，都应该收拾起来了，与会的诸位必须尽力协商，制止那些宣传和言辞。人与人之间，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合，称做"诤友"。这儿有条件，发言的一方必须忠恕存心，具有希望改善的诚意。没有这个条件，出言不择，信口乱骂，把所有最恶劣的字眼都用出来，那

是自己宣告人格破产，其中毫无“诤”字的意味。人家听了，也知道无非那一套，徒然引起人家的厌恶，决不会发生积极的作用。党与党之间亦如此。即使是指摘，斥责，也不要违忠恕。不仅口头笔头要忠恕，尤其存心要忠恕。组政党，争政权，照我的迂拙之见，无非要把自己的知识才能贡献出来，为公众服务。不为公众服务的党虽然名属政党，实际上是私党。名副其实的政党一定存心忠恕，因为“公”与“忠恕”是亲生兄弟。

我常有一种幼稚的念头。历来当政的惯用“治民”两个字，所行的或是善政，或是暴政，他们都说自己是在治民。现在则是民国时代，这个传统并无改变。我以为这个传统必须改变。你要治民，你自己就不是人民，你超出于人民之上，这在从前是讲得通的，从前有皇帝，有贵族，他们不是人民，他们超出于人民之上，现在可讲不通了，现在谁都是人民；人民不要由一种特殊的人来治，人民要自治，而且自治是治事不是治人(治民就是治人了)。所谓政府是系取“选贤与能”的意思，人民信任某一些人，就委托他们组织政府，替大家治种种的事。信任愈深，委托愈切，政府的权力愈强固。不经信任与委托，政府就无所谓权力，如果还有权力，那一定是夺而来的，非人民所能容许。政府该是专家的集团，服务擐于人的实行家的组合，而不是“作之君，作之师”的治民的机关。——我写以上那些话，并不是炫耀我的幼稚的想头，既已幼稚了，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我只望与会的诸位根据你们的经验，凭借你们的识见，看该用怎样的办法使政府成员受信任被委托，使政府成为受信任被委托的政府。不是要定和

平建国纲领吗？纲领定得十二分完美，还是要有个受信任被委托的政府才有效，否则只是白纸黑字。

诸位比我高明多了，我见得到，诸位哪有见不到的，写在这里，聊以备忘而已。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作

去　　私

照我这样谨愿人的想法，人之相去不会很远。抗战胜利了，侵略者已经倒下，这正是黄金的时机；大家把应改革的改革，应兴建的兴建，和衷共济，通力合作，期望十年八年之后，大家有个好日子过。大家有好日子过，张三李四会没有好日子过吗？这样想法虽然简单，可是顺情合理；只要大家这么想，这么做，准会实现。然而偏有些人不这么想，黄金的时机任它溜走，和衷共济的诺言证明都是嘴边的浮词，务私为己，恃强称霸，故态依然。这可以证明人类是劣等的动物吗？一定有许多人不肯承认，我也不肯承认。但是其中确然有些劣等的家伙。你说像我这样的人都想得透，见得到，人家比我聪明百倍，高深百倍，会想不透，见不到吗？我想也不会。但是事实证明确然有些人想不透，见不到。说来说去，就是个私字作怪。抓住了个权力不肯放手，拿惯了的东西不肯牺牲，过惯了的生活不肯稍稍将就些儿，以为一放手，一牺牲，一将就，自己就将毫无依傍；大地茫茫，竟无容身之处。所以他们死命的抓，死命的拿，死命的享受。他们不知道如果换个方式，人家就会好得多，他们也不会吃亏，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份。

为大众着想，那个私字非要他们去掉不可。怎样叫他们

去掉？大概不是写几篇劝告文字，开几个临时训导班能够济事的了。大战的炮火没有警醒他们，民主的浪潮没有冲醒他们，几篇文字几个训导班怎么成？必须从组织与制度方面着手，让他们从组织与制度方面得到切实的答案，知道不得不去掉那个私字，大众并不要他们的命（谁有权利要人家的命呢？），只要他们去掉那个私字。原则说说不过一句话，着手起来可得要一辈子乃至几辈子的艰苦工作。虽然艰苦，可是不怕，因为有个大家要过好日子的愿望在前头领导着。现在不得过好日子，将来必须过好日子，子孙必须过好日子。这样的愿望排除了一切失望与悲观。坚决的意志自然而然使自己与没有去掉私字的人站在两边，直到他们去掉私字的时候为止。

一九四六年一月发表

附　录：

原《西川集》自序

收集在这儿的文字大部分是今年写的。取名《西川集》，所以记写作的地点。

文字全都是被逼写成的。承日报和期刊的编辑先生嘱托，他们的意思极诚恳，不能辜负，只得勉力写一些。识见有限，不敢放笔乱写，就把范围限制在文字和教育上。对于文字和教育，也不敢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只因平时想的无非是这些，如果放开这些不写，将没有什么可写了。

反映现实，喊出人民大众的要求，是文学的时代的使命，这个纲领我极端相信。教育不是孤立的事项，在如今的现实情况之下，教育不良不能全怪教育者，这个说法我极端同意。可是我的文字没有提及这些。只因我的文字不过触着些小题目，小题目上不一定要戴一顶大帽子。

末后几篇小说是我的试作。规模不大，文字无多，适于我的才力和时间。以后还想继续写些。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作

現實與理想



我们的态度

重庆暴徒捣乱市民庆祝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郭沫若章乃器先生等几十人被殴受伤的事件，是继续去年十一二月间昆明惨剧之后的又一幕大惨剧。在民主自由声里，这种令人悲愤令人痛心的惨剧一再发生，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其实不仅是少数人民，而是整个政府和国家！

争取和平民主与自由，在当前，不仅是咱们一个国家民族的事，而是全世界许多国家民族的总趋向。这个总趋向是必然要达到的，然而达到的途径异常迂回曲折。尤其在咱们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馀毒以及一二十年来法西斯主义的模拟学步，要一举而加以廓清，真所谓谈何容易。所以对于去冬的昆明惨案和这回的陪都惨案，我们实在也无所用其愤慨，徒然愤慨，于事何补？咱们只有把自己一群的力量赶快加紧团结，与全国人民的总力量相互配合。团结愈牢固，配合愈紧密，咱们所能发挥的力量就愈坚强，愈伟大。我们相信青年朋友一定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本社同人不敢妄自菲薄，愿意参加全国青年的队伍，为争取国家的和平民主与人民的自由而共同努力。

最后，我们要向这次在重庆受暴徒伤害与侮辱的诸位先生致深切的慰问，并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

一九四六年二月以《中学生》杂志社名义发表

根本的改革

我想，日本的教育，跟我们中国同样需要彻底改革。我们中国受着传统的教育观念的影响，只图造成些统治阶级的帮手，虽然到了民国时代，骨子里还是没有变更。日本在钻研知识，遵守公德那些方面，显然比我们中国收效得多，但是在根本精神上，教育却要求大家作皇帝的忠臣。这跟现在“人民的世纪”绝对不合拍。所以中国跟日本的教育都需要彻底改革。

我知道在最近期间，两国的教育都会有若干改革，在制度方面，在教学方面，更要改变既往的成规。但是最为重要的在于精神方面。就我们中国说，不再作统治阶级的帮手了；就日本说，不再作皇帝的忠臣了：这是消极的方面。咱们都得成为一国的自由公民，世界的独立分子；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到大群与自己的不可分离，爱着大群，服务大群，就从这中间发展自己，供给自己：这是积极的方面。改革教育，如果不能在受教育者的精神上奠定这样的基础，其他枝枝节节的改革都是徒劳，“人民的世纪”就不会有美善的前景。

我说日本教育在遵守公德方面收了效，其实只限于平时。在战争时期，日本军人在各地干下的暴行几乎叫人不能相信，可是证据确凿，我们身受的目睹的耳闻的都可以证明日本军

人真是那样干了。在感情激动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对于敌对的人，甚至不备武装的人，不惜加以非人的残害，归究到根源，不能不说由于教育上出了毛病。我们知道日本人的生活艺术是高明的，起居的整洁，艺事的爱好，成为多数人的风尚。但是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爱玩浮世绘、三弦、尺八的人，一个看花、游山，倾心于自然美的人，当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比野兽还不如。为了这个不如，就见得生活艺术无论怎样高明，总之只是浮面的，不能认为教育真收了效。今后的教育，第一要发展人间的爱，彻头彻尾，无条件，无例外的爱，要绝对排斥遗留在人性中的兽性，也就是狠心与私心，这种兽性发展起来就是法西斯主义。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作

“众人当中的一个”

——怀念罗斯福先生

战争结束不满一年，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已经感到失望。虽然组织了个联合国，订定了一份联合国宪章，可是那联合好像没有太多的粘性。彼此之间仍然是你猜我忌，尔诈我虞，不肯推诚相与，真正奠定和平的基础，为并世的人民造成较好的生活，为后代的子孙预备幸福的摇篮。尤甚的，有人竟然不顾簇新鲜的中在全世界人民身上的灾祸，在那里鼓吹不妨再来一次大火并。又有人显出欢迎的脸色遥望那幻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好像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发作起来那才好了，顶好今天就发作。人类果真是这样不长进的吗？和平果真是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吗？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感到深切的失望。失望之馀，不能不怀念逝世才满一年的罗斯福先生。

罗斯福先生如果还在，凭他的政治理想，凭他的笃爱人类的热诚，凭他的号召世界的魄力，这一年来的世界局面或许会完全不同，至少，对于原子弹秘密，他一定会坦然主张把他公开。因为，据我们的认识，他是个心中不再存有假想敌的人，没有假想敌，捧住原子弹当活宝贝做什么？至少，对于苏联，他一定会不存什么疑忌心理，像以往的若干年一样。因为，据我们的认识，他是个最懂得集体安全的道理的人，集

体安全必须在心理上相互谅解，在事实上相互协作，才可以实现，而疑忌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的。仅仅凭上面说的两点，世界局面就将改观了。

罗斯福先生逝世几天以后，他的夫人写了一篇哀悼辞，题目叫做《众人当中的一个》。其中有几句道："一个领袖可以划出了路线，指示出了到永久和平的道路，不过许多领袖及许多民族应该去做建造的工程。这不能是一个人的工作，也不能把责任放在他的肩上，因此，当各民族更其充分地负担起责任的时候，他被人允许去休息了。愿上帝保祐我们可以有智慧与勇气去建造一个有正义与予全世界各民族机会的和平世界。"那个题目，那几句话，最足以表示罗斯福先生生时所负的使命。他只是"众人当中的一个"，他已经"划出了路线"，他永远休息了，没有辜负他的使命。目前的问题在于"许多领袖及许多民族"是不是"更其充分地负担起责任""去做建造的工程"。罗斯福先生逝世才满一年，而世界好像已经走上了歪路，这该是大家没有好好的"去做建造工程"的证明吧。

就我们普通人说，我们不是什么领袖，可是我们每个人是"众人当中的一个"。徒然对当前的局面感到失望，悲观叹息，这算不得"负担起责任"，甚且是绝对没有"负担起责任"。必须各自尽心竭力，一点一滴的"去做建造的工程"，那才是真的"负担起责任"。这需要远大的眼光与明澈的理智，并且认定个切实不过的目标，就是人人都要享受物质上精神上满足的生活。任何人不宜妄自菲薄。在世界已成一家的今日，世界搞好搞不好，任何人肩膀上都有一份责任。我们必须负责

任把他搞好，因为我们像罗斯福先生一样，人人是“众人当中的一个”。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发表

我坐了木船

从重庆到汉口，我坐了木船。

木船危险，当然知道。一路上数不尽的滩，礁石随处都是。要出事，随时可以出。还有盗匪——实在是最可怜的同胞，他们种地没得吃，有力气没处出卖，当了兵经常饿肚子，没奈何只好出此下策。假如遇见了，把铺盖或者身上衣服带了去，也是异常难处的事儿。

但是，回转来想，从前没有轮船，没有飞机，历来走川江的人都坐木船。就是如今，上上下下的还有许多人在那里坐木船，如果统计起来，人数该比坐轮船坐飞机的多得多。人家可以坐，我就不能坐吗？我又不比人家高贵。至于危险，不考虑也罢。轮船飞机就不危险吗？安步当车似乎最稳妥了，可是人家屋檐边也可能掉下一片瓦来。要绝对避免危险就莫要做人。

要坐轮船坐飞机，自然也有办法。只要往各方去请托，找关系，或者干脆买张黑票。先说黑票，且不谈付出超过定额的钱，力有不及，心有不甘，单单一个“黑”字，就叫你不愿领教。“黑”字表示作弊，表示越出常轨，你买黑票，无异帮同作弊，赞助越出常轨。一个人既不能独个儿转移风气，也该在消极方面有所自守，帮同作弊，赞助越出常轨的事儿，总

可以免了吧。——这自然是书生之见，不值通达的人一笑。

再说请托找关系，听人家说他们的经验，简直与谋差使一样的麻烦。在传达室恭候，在会客室恭候，幸而见了那要见的人，他听说你要设法买船票或飞机票，爱理不理的答覆你说："困难呢……下个星期再来打听吧……"于是你觉着好像有一线希望，又好像毫无把握，只得挨到下个星期再去。跑了不知多少回，总算有眉目了，又得往这一处签字，那一处盖章，看种种的脸色，候种种的传唤，为的是得一份充分的证据，可以去换一张票子。票子到手，身份可改变了，什么机关的部属，什么长的秘书，什么人的本人或是父亲，或者姓名仍旧，或者必须改名换姓，总之要与你自己暂时脱离关系。最有味的是冒充什么部的士兵，非但改名换姓，还得穿上灰布棉军服，腰间束一条皮带。我听了这些，就死了请托找关系的念头。即使饿得要死，也不定要去奉承颜色谋差使，为了一张票子去求教人家，不说我自己犯不着，人家也太费心了。重庆的路又那么难走，公共汽车站排队往往等上一个半个钟头，天天为了票子去奔跑实在吃不消。再说与自己暂时脱离关系，换上别人的身份，虽然人家不大爱惜名器，我可不愿滥用那些名器。我不是部属，不是秘书，不是某人，不是某人的父亲，我是我。我毫无成就，样样不长进，我可不愿与任何人易地而处，无论长期或是暂时。为了跑一趟路，必须易地而处，在我总觉得像被剥夺了什么似的。至于穿灰布棉军服更为难了，为了跑一趟路才穿上那套衣服，岂不亵渎了那套衣服？亵渎的人固然不少，我可总觉不忍。——这一套又是书生之见。

抱着书生之见，我决定坐木船。木船比不上轮船，更比不上飞机，千真万确。可是绝对不用请托，绝对不用找关系，也无所谓黑票。你要船，找运输行，或者自己到码头上去找。找着了，言明价钱，多少钱坐到汉口，每一块钱花得明明白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木船好极了，我可以不说一句讨情的话，不看一副难看的嘴脸，堂堂正正凭我的身份东归。这是大多数坐轮船坐飞机的朋友办不到的，我可有这种骄傲。

决定了之后，有两位朋友特地来劝阻。一位从李家沱，一位从柏溪，不怕水程跋涉，为的是关爱我，瞧得起我。他们说了种种理由，设想了种种可能的障碍，结末说，还是再考虑一下的好。我真感激他们，当然不敢说不必再考虑，只好带玩笑的说"吉人天相"，安慰他们的激动的心情。现在，他们接到我平安到达的消息了，他们也真的安慰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作

木刻连环图画《一个人的受难》

街头巷口常常有些小书摊，陈列着小说，唱本，连环图画，可以买来看，也可以租来看。小朋友们最喜欢连环图画，那些本子经过好些人的手，脏了，破了，可仍旧是看过的和没看过的小朋友的宝物。

连环图画以画为主，每一幅画上方或是下方，印着说明那幅画的文字。譬如画的“三国”，在长坂坡那幅上，就记着长坂坡一段经过。从头一页一页看下去，图画与文字同看，看到末了儿，你就知道全部的“三国”故事了。

那种连环画画得不怎么好。当然男的还他个男的，女的还他个女的，长胡子决不漏画长胡子。可是，这个男的与那个男的很难分别，没办法，只好在旁边写上人名字。还有，各幅画的布置大都相类。譬如战争，无非画几员大将骑在马上，一些兵卒跟在背后，没法显出这回战争与那回战争的分别。要知道这回战争到底是谁跟谁打，前因后果如何，非看上方或是下方的文字不可。这样说来，并非以画为主，却是以文字为主，图画为副了。

既然叫做连环图画，最好当然是只有画，不用文字，使人家看了画就可以知道那故事。这须是很好的画手，能把故事的每一个节目扼要画出，他的画法又能吸引人家的注意，触

动人家的悟性。不然，人家只见一幅幅不相关涉的画，看不出全部是个什么故事，就不成其为连环图画了。

现在介绍一种不用文字的连环图画，那是比利时麦绥莱勒（生于一八九九年）的木刻作品，叫做《一个人的受难》。一共二十五幅，看了那二十五幅画，谁都可以理会那个受难的人怎样过了他的一生。完全复制印在这里太占篇幅了，只能选载四幅。光看四幅不能理会全部故事，不得不先把全部故事说一说。

在一间除了桌椅别无所有的屋子里，一个女人怀了孕。生产以后，她被逐出了，只好在街头流浪。终于跟了别人，她的孩子混入野孩子的群中。那孩子稍大，去学木匠，担负不了笨重的工作，被人踢了出来。他饿得慌，就去偷面包。立刻被警察抓住，送进牢监。罚期既满，释放出来，于是轮到他在街头流浪了。幸而找到了修路的工作。一天到晚挥着鹤嘴锄，疲劳不堪。这时候他交了坏朋友，受了诱惑，就去会妓女，玩跳舞。归途中却又悔恨起来，决计进厂作工，而且还看书自习。在这样的环境里，才遇见了真的相爱的女子。可是劳资双方冲突起来了，他登高呼号，联合工友，与资方斗争。于是奸细刺探他们，军警弹压他们，结果他被捕了。在耶稣像前，他受了裁判，是死刑。于是他挺挺的站着，等候行刑人开枪。

现在可以就选载的四幅看作者的手法了。第一幅是那个人幼年学木匠时候的情景。孩子处在下方的正中扛起笨重的木料，支持不住的样子。后面两个大约是师父师叔之类，眼睛瞪着他，绝不帮他一手。挂着的锯子比他的身体还大。这

造成一种气氛，见得那童工是处在四面八方的压迫之中。

第二幅是那个人当了工人，深夜里在路灯下看书的情景。他靠着电线杆子，这姿势显出他的有力和用心。

第三幅是那个人在同伙中间登高呼号的情景。工厂的背景，密密簇簇的听众，可以教人想见这是个阔大的场面。

第四幅是那个人临刑时候的情景。他挺然站着，眼望着前方，前方是什么呢？显然是一排举了起来预备放的枪。因为图的下方有横在地上的两条腿，那两条腿的主人先吃了枪弹，倒下了。

看那些粗壮的线条，爽利的刀法，扼要的安排，含蓄的省略，都足以吸引人家的注意，触动人家的悟性。以外不多说，请读者自己去欣赏吧。

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作

驾　长

白木船上的驾长就等于轮船上的大副，他掌着舵。

一个晚上，我们船上的驾长喝醉了。他年纪快五十，喝醉了就唠唠叨叨有说不完的话。那天船歇在云阳，第二天要过好几个滩。他说推桡子的不肯卖力，前几天过滩，船在水面打了个转，这不是好耍的。他说性命是各人的，他负不了这个责。当时就有个推桡子的顶他，"'行船千里，掌舵一人'，你舵没有把稳，叫我们推桡子的怎么办！"

在大家看来，驾长是船上顶重要的人物。我们雇木船的时候，耽心到船身牢实不牢实。船老板说："船不要紧，人要紧。只要请的人对头，再烂的船也能搞下去。"他说的"人"大一半儿指的驾长。船从码头开出，船老板就把他的一份财产全部交给驾长了，要是他跟着船下去，连他的性命也交给了驾长。乘客们呢？得空跟驾长聊几句，晚上请他喝几杯大曲。"巴望他好好儿把我们送回去吧，好好儿把我们送回去吧。"

舵在后舱，一船的伙计就只有驾长在后舱做活路。我们见着驾长的时候最多，对于驾长做的活路比较熟悉。一清早，我们听驾长爬过官舱的顶篷到后舱的顶篷，一手把后舱的一张顶篷揭起，一片亮就透进舱来。我们看他把后舱的顶篷全

收了，拿起那块长长的蹬板搁在两边舱壁上，一脚蹬上去，手把住舵。于是前面的桡夫就下篙子，船撑开了。

驾长那么高高的站在蹬板上，头露出在顶篷外，舵把子捏在手里，眼睛望着前面。我们觉得这条船仿佛是一匹马，一匹能够随意驰骋的马，而驾长是骑手。你要说这是个很美的比喻吧？可是，他掌着舵只是做活路，没有大野驰马的豪兴。我们同行有两条船，两条船上的驾长都喝酒。我们船上的年纪大多了，力气差些，到滩上，他多半在蹬板上跺脚，连声喊："扳重点！扳重点！……就跟搔痒一样！"有一回，舵把子打手里滑脱了，亏得旁边几个乘客帮他扳住。他重新抓住舵把子的时候，笑了笑说："好几个百斤重呢，不是说着耍的。"另一条船上的年轻人什么时候都喝酒，他夸张的摆给我们听："不喝酒可有点儿害怕呢。脚底下水那么凶，不说假的，你们看到就站不住。喝点酒，要放心些。"我们的驾长就不然，做活路的时候他决不喝酒。这不是说他比那年轻人胆大。对于可怕的水他们两个抱着不同的害怕态度。

木船上禁忌很多，好些话不能说。偏偏那些话关于航行的多，我们时常会不知不觉的说出来。推桡子的听见了，会朝我们说："说不得，说不得。"驾长听见了，会老大的不高兴，好像我们故意在跟他捣蛋。是的，人家把性命财产交给了他，他把这个责任跟他自己的性命一半儿交给了"经验"，还有一半儿呢，不知道交给什么，也许就是交给那些禁忌吧。船上的伙计们说，"船开动了头，就不消问哪天到哪里。这是天的事，你还做得到主啊？"

川江的水凶，水太急的地方，单凭一把舵转不过弯来。

所以船头上还有一根梢子，在要紧时候好帮帮舵的忙。扳梢子的大家也把他叫做驾长。到滩上，他总站在船头比手势，给掌舵的指明水路，好像是轮船上的领江。他拿的工钱跟掌舵的一样。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发表

从此不再听见他的声音

二十二日上午，去看丏翁。他朝里侧睡，连声呻吟。医生还没来，昨日医生说他心脏转弱，开了强心剂给他服下，又吩咐预备葡萄糖，将给他注射。

过了一小时光景，他作势要坐起来。龙文把他扶起，他摇摇晃晃的，似乎坐不稳。给他把枕头被袱垫在背后，他不要，只摇着折扇。坐了一会儿，又睡下了，出了一身汗。经过二十分钟，又想坐起来，大家劝阻他，免得又出汗，他不听。坐了起来仍然摇摇晃晃的，指着床的另一头，似乎要调头睡。给他移过枕头来，他又示意，不是那个意思。最后才知道他要横着睡，把枕头靠北墙安放，他就倒下了。

将近十一点，我要走了，朝他说明天再来。他望我一眼，勉力说出以下的话："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虽然舌头有些木强，声音还听得清楚。那凄苦的眼神带着他平生的悲悯，使我永不能忘。

我心里难过，没有回答他什么，我走了。从此不再听见他的声音。二十三日午后又去看他，他已经闭上眼睛，只剩抽气了。就在那天下午九时四十五分，他离开了我们的世界。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发表

答丐翁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去看丐翁，临走的时候，他凄苦的朝我说了如下的话："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这是我听见的他的最后的声音。二十三日下午再去，他已经在那里咽气，不能说话了。

听他这话的当时，我心里难过，似乎没有回答他什么，或者说了现状诚然一塌糊涂的话也说不定。现在事后回想，当时没有说几句话好好安慰他，实在不应该。明知他已经在弥留之际，事实上说这句话之后三十四小时半就去世了，不给他个回答，使他抱着一腔悲愤长此终古，我对他不起。

现在，我想补赎我的过失，假定他死而有知，我朝他说几句话。我说：

胜利，当然属于爱自由爱和平的人民。这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不是一句喊滥了的口号，是事势所必然。人民要生活，要好好的生活，要物质上精神上都够得上标准的生活，非胜利不可。胜利不到手，非争取不可。争取复争取，最后胜利属于人民。

把强大武力掌握在手里的，耀武扬威。把秘密武器当作活宝贝的，奇货可居。四肢百体还繁殖着法西斯细菌的，摆出侵略的架势，独裁的气派。乃至办接收的，发胜利财的，一

个个高视阔步，自以为天之骄子。这些家伙好像是目前的胜利者。正因为有这些家伙在，才使人民得不到胜利，才使你丏翁在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消释不了你心头的悲愤。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胜利者。如果把他们目前的作为叫做陷溺，那么他们的陷溺越深，他们的失败将越惨。他们脱离人民，实做人民的敌人，在爱自由爱和平的人民的围攻之下，终于惨败是事势之必然。这个"终于"究竟是何年何月，固然不能断言，可是，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胜利者也就够了，悲愤之情不妨稍稍减轻，着力之处应该特别加重。你去世了，当然不劳你着力，请你永远休息吧。着力，有我们没有死的在。

丏翁，我不是向你说教，我对于青年朋友也决不敢说教，何况对于你。我不过告诉你我的简单的想头而已，虽然简单，可的确是我的想头。

你对于佛法有兴趣，你相信西方净土的存在。信仰自由，罗斯福先生把他列为四大自由之一，不是说罗斯福先生说的就一定对，信仰的确不该受他力的干涉。因此，我尊重你这一点，而且，自以为了解你这一点。不过我有一句诗"教宗堪慕信难起"，要我起信，至少目前还办不到，无论对于佛法，基督教，或者其他的教。我这么想，净土与天堂之类说远很远，说近也近。到人民成了真正的胜利者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净土，就是天堂了。如果这也算一种信仰，那么我是相信"此世净土"的。

我比你年轻，今年也五十三了。对于学问，向来没有门径，今后谅来也不会一朝发愤，起什么野心。做人，平平，写

文字，平平，既然平平了这么些年，谅来也不会在往后的年月间，突然有长足的长进。至于居高位，发大财，我自己剖析自己，的确不存丝毫的想望。总而言之，在我自己，活着既无所为，如果死了也不足惜。可是在“临命终时”以前，我决不肯抱玩世不恭的态度，因为我还相信“此世净土”，觉得活着还有所为。

丏翁，你以为我的话太幼稚吧？我想，如果多数的人都存这种幼稚的见解，胜利的东家就将调换过来，“此世净土”也将很快的涌现了。

我回到上海来不满三个月，由于你的病，虽然会面许多回，没有与你畅快的谈一谈。现在我写这几句，当作与你同坐把杯，称心而言。可是你已经一棺附身，而且在十天之后就将火化成灰。想到这里，我收不住我的眼泪。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发表

革　心

辛亥革命那年，我十八岁，对于革命一下子就成功，感到莫名其妙的高兴，看看事实，似乎跟理想中的革命不大对头，又感到莫名其妙的忧虑。我就写了一篇文字，题目叫做《革心》，寄给一家报馆，居然在报上登出来了。是什么报，记不起了，文字里说些什么也记不起了，总之是些非常幼稚的想头。现在只觉得“革心”两个字还有些意思。抗战胜利了，当前的大事业是建国。要建什么样的国？大家心中有数。国是大家的，不是专属于张三李四的，但是张三李四也必须得到好处，跟大家一样，不特别多也不特别少，人人这么样，国才是适应大家需要的国，才是大家见得可爱的国。所谓好处，就是人人都可以享受到自由，人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有保障，可以各自发展，共同合作，走上欣欣向荣的道路。这是货真价实的好处，为了争取这些好处，才起来抗战，也为了争取这些好处，才着手建国。建国建国，千头万绪，可是有个根本要点，就是上面提起的“革心”两个字。人人要革心，要像成语所说的“革面洗心”。不要以为这两个字太迂腐了，换个时新说法，就是改变意识，就是改变人生观跟世界观。心跟意识跟什么观，如果只顾闭起眼来胡思乱想，不跟实际打交道，同样会迂腐。如果能从实际出发，认得清，想得透，说

心说意识说什么观都一样，不会因为说了心就迂腐了。

说到革心，最要紧的是改变对于政治的了解。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很古了，可是在今天以前，我国并没有人人做这种动物。一般的了解以为政治是治人者的事，治人者行政叫做治国治天下，其馀的人只有恭候他们来治。从今以后，可真要人人做政治的动物了，政治必须成为各人生活里的重要项目，谁不管政治，谁就是跟自己捣蛋，同时间接地捣旁人的蛋。管政治并不等于做官，管政治只是参与公众的事，参与有关于自己跟旁人的事。以前是一部分人替大家代劳了——代劳是好听的说法，实际上是抢了去，不让大家参与，大家就吃了不知多少的亏，若要不吃亏，唯有事事参与，一件也不放松。这才对得起自己，同时间接地对得起旁人。人人参与，结果取决于多数。多数人信任的办法必须照办，多数人信任的人就接受委托去照办。这里后面的一句很关紧要，“信任”，“接受委托”，“照办”，把行政人员的性质跟职分规定了。行政人员不是治人者，他们是替公众办事的人，以前的行政人员，大的，小的，高级的，低级的，历代有种种名目，从没有接受过公众的委托。最高级的一些往往是乘机会凭武力取得了天下，就居之不疑，硬要管公众的事了，这当然不是接受委托。其馀各级的人员接受了这班最高级的人的委托，帮他们硬管公众的事，没有接受公众的委托自不待说。既然没有接受委托，当然说不上公众的“信任”，更说不上依据公众的意见“照办”。这个局面必须改变，就因为公众太吃亏了，不是名义上的吃亏，是生活上实实在在的吃亏。今后的行政人员必须得到公众的信任，接受公众的委托，又必须依

据公众的意见照办。这一层，公众要绝对了解，接受委托的行政人员也要绝对了解，大家才有好日子过。

还有一点，今后的行政几乎全是技术工作，绝对用不着君师主义了。公众要把经济调整，要把工业兴起，要把教育办好，诸如此类，都是一个题目，一个纲领。行政人员必须切实做到调整，兴起，办好，才不负公众的信任和委托。而切实做到调整，兴起，办好，其间是一串的技术工作，要有计划，要有方法，还要有锲而不舍，做成方休的毅力。什么叫君师主义呢？君师主义是行政人员自视甚高，最高的时候竟自认为哲学家，把公众看得一钱不值，以为你们懂得什么，我的意见才是无所不周，无所不至，由我来“作之君，作之师”吧。这种君师主义的最大毛病就在于抹煞了公众，自己要为君为师。至于流弊怎样，也不必再说。总之，今后的“君”跟“师”就是公众，行政人员如果抱着君师主义，其人就不配当行政人员。

今后的局面是全新的，切不要搬古书，翻旧皇历，说什么什么古已有之，现在的什么什么就是从前的什么什么。试问，人人参与政治，多数人相信的办法必须照办，这种情形，在我国哪朝哪代见过？又试问，各级的行政人员必须受公众的信任跟委托，照办公众要办的事，这种情形，在我国哪朝哪代见过？水必有源头呀，文化不能没有根本呀，这些话诚然不错，可是不能作为现在必须继承以往的借口。我国政治如果必须继承以往，那唯有照抄一脉相承的专制。专制，试问你要不要？如果不要，就得把古书上说的，旧皇历上载的，一刀斩断，不回头，向前走，从开创中学习，从学习中得到享受。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表

夏丏尊先生追悼会启事

上虞夏丏尊先生朴实真诚，笃行拔俗，廉顽立懦，化遍朋从，治教育则归于至情，研语文则时获创见，受者悦服，听者惬心，虽未以宗师自期，而实为举世所仰。不幸于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九时四十五分病殁上海寓舍，丧耗乍传，识与不识同深伤痛。爰定于六月二日下午二时，在上海槟榔路玉佛寺集会追悼，致敬精魂，祈其永息，兼励后死，交勉精修。凡愿参与者，务希准时命驾。花圈挽联等物，系属浮文，为先生生时所弗喜，宜推其意，概勿惠赐。同人拟募集“夏先生纪念金”，别有文启，倘荷赞许，幸各解囊。此启。

夏丏尊先生治丧委员会

附：募集夏丏尊先生纪念金启事

纪念金之举，世多行之。其意在于推爱，不忘一人，而惠不止于一人，则其不忘广矣。今欲纪念上虞夏丏尊先生，循例募集金财，将以资助中学国文教师，请陈其由。先生尝谓我不胜大学教师，差堪自信，其唯中学。而先生所以为教，要不出国文之藩，平时研讨，亦以语文为多。先生往矣，谋有以推爱，言其极致，自宜如杜老之广厦千间。然为力有限，弘愿难酬，狭其界域，事乃克集。彼中学国文教师者，悉心

教学，甘苦深尝，与先生尤为同气。苟为资助，先生泉下有知，必将谓吾道不孤，惠同身受，而受之者亦可以得所慰藉，益加奋勉。命意如是，敬希公鉴。办法如下：

一、组织夏先生纪念金委员会，由治丧委员会推定七人至九人为委员，主持保管及审议事项。

二、各界捐赠，数量不拘多寡，由各地开明书店代收，汇转本委员会。此项捐款之收集，定于八月底止。

三、纪念金之支用，限于孳息。其运用生息办法，以维持基金，不随币值低落为原则。

四、此项纪念金，专赠与任职十年以上，成绩卓著，或于语文教学上获有创见之中学国文教师。其名额视子金多寡而定，但每年至少二人。

五、收支帐目，由会计师审核，每年公布一次。

一九四六年五月发表

谈丏翁的《长闲》

丏翁的《平屋杂文》中有三篇小说，《怯弱者》，《猫》，《长闲》，都用自己生活中的事情作题材。比较起来，我最喜欢那篇《长闲》。

“长闲”两字从陶渊明的“勤靡馀劳，心有常闲”的句子采来。这两句确是名句，对于生活的体验极为深切。一般人往往心里想着“忙啊忙啊”，口里嚷着“忙啊忙啊”，却懒得用心去想，动手去做。越不去想，越不去做，事情堆积得越多，就越见得“忙啊忙啊”。许多人在这样情形之下虚度一生，毫无成就。我们虽不见得经常如此，但是偶尔有几段时期也会陷入那样的境地。那时候总感觉烦闷，犹如牙齿痛，时时刻刻都想着它，再也丢不开。又如便急，使你浑身不痛快，任它好吃的东西，好看的风景，好玩的事情，都没有心绪去理会。这种烦闷的难熬不输于受冻挨饿。一生“忙啊忙啊”的人就一生经受这种烦闷，某一时期“忙啊忙啊”的人就在某一时期经受这种烦闷。要解除这种烦闷，惟有用心去想，动手去做。想是想怎么做，做是做那所想的。想了，做了，稳当妥贴，那心头的舒快是无比的。用吃了好东西来比，用发了大财来比，都不大对。吃了好东西，发了大财，都是取之于外，不免带来别的烦恼。吃饱了，胃里感觉胀胀的，这就不舒服。发了财更

难，怎样去管理，怎样去运用，足够教你几天几夜睡不成觉。刚才说的那种却是内在的，自发的，舒快就在乎本身，舒快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换个字眼来说，那种舒快就是真正的“闲”。谁要永久享受那真正的“闲”，必须时时刻刻去想去做，好像来不及似的。“闲”不是无为和懒散可以取得的，惟有“勤靡馀劳”的人才能“长闲”。这中间，包含着工作即是人生的意思，包含着快乐源于工作的意思。谁说陶渊明是个逍遥尘外的遁世者！

丏翁那篇《长闲》用的第三人称写法，写某一天从下午到午夜的自己的杂事。想作文，心不定，起来修剪树枝。随后就独酌。酒罢，与家人闲谈。待家人睡了，才开始执笔。写了几行，又被墙上的画幅引动了注意。于是起来除去画幅，换上字幅。直到打呵欠想睡，文稿终于没有继续写下去。事情是这样的简单，平凡。因为中间叙及玩味柳色，欣赏树的姿态，喝酒，观玩字画，以及湖边小立等等，颇带一些隐逸之风，曾经有人指谪过那篇东西。现在记不清了，大致说他写些身边琐事，自己夸耀享受清福，是士大夫的旧传统，要不得。在我看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篇东西的主旨在厌恶自己的懒散，要策励自己，向着勇猛精进的方向走去，只是没有像誓愿文似的，写出正面文字，说以后一定要怎样怎样。他只把心绪不能宁定的一段光景写出，即在其中托出本意。如：

> 想享乐自然，结果做了自然的奴隶，想做湖上诗人，结果做了湖上懒人，这也是他当初万不料及，

而近来深深地感到的苦闷。

“难道就这样过去吗?”他近来常常这样自讼，无论在小饮时，散步时，看山时。

又如“猛忆到某友人‘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但是也不能抵一钱用’的话，不觉对于这素所心爱的画幅，感到一种不快。”那画幅是题有“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负此梧桐月色也”的句子的山水小景。由于不快，就把它除下了，换上“勇猛精进”四字的小额。看着这小额，又提起笔来，书写在午睡前从陶集中看到的“勤靡馀劳，心有常闲”的句子。于是，“身安逸而心忙乱”，整篇东西就是写的这一点。

《长闲》很有日本风味，自然因为丏翁与日本文艺接触很多的缘故。青年人或许不喜欢看，中年人就不然，要想做些工作而心不宁定做不出来的中年人，看了尤其引起同感，能够了解那种苦闷的深度。至于与丏翁熟识的人，便觉《长闲》中间活活画出个丏翁自己。可以想见他的性情神思，声音笑貌。

在丏翁追悼会的第二天，我把《长闲》重读一遍，写下这篇短文。

一九四六年六月四日作

十五天后能和平吗?

停战十五天以后，你说会和平吗？请问保证在哪儿？讲保证，从去年十月以来的什么“会谈纪要”、“停战命令”，政协会议里的“四项诺言”、“五项协定”、“整军方案”……还不够吗？事实又怎么样？你说一定不会和平吗？那么就从去年十月到现在这一段时期说，边谈边打——大谈小打，小谈大打，那样“拖”的局面，已经“拖”了这么大半年，除掉在东北所谓“收回主权”的大战算是明争之外，都还只能算是暗斗。国民党对共产党还没有用“国民政府”的名义下过讨伐令，共产党也还没有说过要革国民党的命。

停战十五天以后会和平吗？这个问题不是短短几句话可以解答的，就现在一般的情形说起来，似乎要看双方力量的对比如何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如何而定。最可能的结果，还是“拖”的成分居多。然而“拖”真可以“拖”出个满意的结果来吗？

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对于好战分子要大声警告：你们不要再做武力统一的迷梦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无耻想法，更得赶快抛弃。你们不是最喜欢引经据典吗？你们知不知道“以德服人者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些道理吗？现在我们说“人民的世纪”，那

决不是一句抽象的空话，那是有它的具体内容的。你们纵不想为国家留一点颜面，为民族保存一点元气，你们也得为你们自身留一点馀地呀！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发表

与王伯祥、周予同等六位先生一同署名

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

马叙伦先生等并非“自称人民代表”，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推选他们的都可以站出来说，“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

我们要争取发表的自由，我们有意见，就得发表。我们要争取委托的自由，我们相信马先生等不负我们的委托，就委托他们。发表跟委托这些事项，难道也要登记，核准，圈定吗？岂有此理！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发表

桡 夫 子

川江里的船，多半用桡子。桡子安在船头上，左一支右一支的间隔着。平水里推起来，桡子不见怎么重。推桡子的往往慢条斯理的推着，为的路长，犯不着太上劲，也不该太上劲。据推桡子的说，到了逆势的急水里，桡子就重起来，有时候要上一百斤。这在别人也看得出来，推桡子的把桡子推得那么重，身子前俯后仰的程度加大了。过滩的时候，非使上全身的气力，桡子就推不动。水势是这样的，船的行势是那样的，水那股汹涌的力量全压在桡子上。推桡子的脚蹬着船板，嘴里喊着“咋咋——呵呵呵”，是这些沉重的声音在教船前进呢。过了滩，推桡子的累了，就又慢条斯理的了。

这些推桡子的，大家管他们叫“桡夫子”。

好些童话里说到永远摇着船的摆渡人，他老在找个替手，从他手里把桨接过去；一摆脱桨，他就飞一样地跑了，再不回头看一看他那摇了那么久的船了。在木船上二十多天，我们天天看桡夫子们做活，不禁想起他们就是童话里说的摆渡人。天天是天刚亮他们就起来卷铺盖。天天是喊号子的一声“喔——喔嗽——嗽”，弟兄伙就动手推桡子。天天是推过平水上流水，推过流水又是平水。天天是逢峡过峡，逢滩过滩。天天是三餐干饭。天天是歇力的时候抽一杆旱烟。天天听喊号

子的那样唱："哥弟伙，使力推，推上流水好松懈"，"弟兄伙，用力拖，拢到地头有老酒喝"。这样，天天赶拢一个码头。随后，他们喝酒，耍钱，末了在船头上把铺盖打开，就睡在桡子旁边。

那个烧饭的（烧饭的管做饭，看太平舱，是船上的总务，他的工钱比别的桡夫子大）跟我们说起过，"到了汉口，随便啥子活路跟我说一个嘛，船上这个饭不好吃。"他说："岸上的活路没得这么'讨神'，一天三顿要做那么多人吃的，空下来还顶一根横桡，清早黑了又要看舱，是不是？船漏了是你的责任嘛。"他说："这么点儿钱，哪儿不挣了？"他年纪还轻，人很精灵，想要放下手里的桨，换个新活路。在他看来，除了自己手上的都满不错。

别的桡夫子们，有好几个已经三十多了。一个十六七岁的，上一代也吃船上饭，也是推桡子的。这些人却不想放下手里的桨，都是每天不声不响的提起桡子，按着节拍一下一下推着。他们拿该拿的钱，吃该吃的饭，做该做的活。推船跟干别的活无非为了挣钱，他们干这一行，就吃这一行饭，靠这一行吃饭，永远靠这一行吃饭。"钱是各人各自挣的嘛，做得到哪一门活路，吃得成哪一门饭，未必是说着要的．随随便便就拿钱给你挣了！"他们这样说。

我们下来的时候，从重庆到宜昌推一趟，每人拿得到四五万元。

在船开动的前一天，就散了一些工资。这是给桡夫子们安家买"捎带"的。"捎带"各人各买，有买川连的，有买炭砖的，有买柴火的，也有买饭箕的。买了各自扛上船，老板有地方给

他们安放。老板说："我不得亏待你们，总有钱给你们办'捎带'的。"桡夫子们说："牲钱（工资）拿来有屁用！不办点'捎带'，回来扯不成洋船票，还走不到路呐。"这些"捎带"有赚有蚀。听到底下哪门货色行市，他们就办哪门。也许这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信息了，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不过他们总是高高兴兴地把"捎带"办了来，找个顶落位的地方放好，心里想，也许在这上头可以赚一笔大钱呢。

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发表

多说没有用，只说几句

紧接着李公朴先生的被害，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被暗杀的消息又赫然在报纸上出现了。

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是被谁暗杀的，谁都明白。尽管罪恶的制造者用种种方法掩饰，他们自以为掩饰得异常巧妙，都没有用。

“暗杀是最卑怯无耻的行为”,“政治暗杀足以招致国家于混乱”,用这一类话对罪恶的制造者说，显然是无用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从自身的利害上想一想。使用这种残暴恐怖的手段，是不是真能够把人民的声音压下去？还是会更加激怒人民,引起人民用行动来答覆？“人生自古谁无死”,今天，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呼号的人士，没有一个怕死的。

在人民的世纪里，竟容许这种卑劣残暴，灭绝人性的事件在中国发生，这是全中国人的耻辱,也是全人类的耻辱。我要向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控诉,大家要用行动来洗雪这种耻辱。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作

致《文汇报》

《文汇报》诸位先生：

被罚停刊，你们当然不颓丧。你们问心没有错，连那罚你们的人也必然自知是借端生事，你们为什么要颓丧呢？可是停刊的确吃了实实在在的亏，你们不能不考究，弄个明白。人家借端生事，成不成个理由？人家要你们停刊，合不合手续？不能说现在没有道理可讲，吃了亏就算了。如果这么想，没完没了的亏就等在后头。我国弄到这么糟，一半固然要怪那些为非作歹的，一半也要怪大多数人，大家存着吃了亏就算了的想头。这种想头对为非作歹的是极大的鼓励，鼓励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为非作歹。必须考究，必须讲道理，除非他们正正式式公开宣告，现在不讲道理了。书生之见，也许很迂，不知道你们以为如何。愿你们精进不懈，继续努力，在许多种无可看的报纸之外，永远有一种像模像样的报纸。

叶圣陶谨启　七月十九日

开明书店二十周年

开明书店创办于十五年八月间，到今年这一个月，二十周年了。《中学生》是开明书店发行的刊物，本志的同人都是开明书店的从业员，现在逢到开明书店二十周年，请容许我与读者谈谈开明书店。

开明书店是一些同志的结合体。这所谓同志，并不是信奉什么主义，在主义方面的同志，也不是参加什么党派，在党派方面的同志。只是说我们这些人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家愿意认认真真做点儿事，不求名，不图利，却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是这么样的同志。这些同志都能够读些书，写些文字，又懂得些校对印刷等技术方面的事，于是相约开起书店来，于是开明书店成立了。

书店有各种的做法。兼收并蓄，无所不包，是一种做法。规定范围，不出限度，是一种做法。漫无标的，唯利是图，又是一种做法。我们以为前一种需要大力量，不但财力要大，知力也要大，我们担当不了。后一种呢，与我们的意趣不相容，当然不取。与我们相宜的只有中间一种，就是规定范围的做法。我们把我们的读者群规定为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出版一些书刊，绝大部分是存心奉献给他们的。这与我们的学识修养和教育见解都有关系。我们自问并无专家之学，不过有

些够得上水准的常识，编选些普通书刊，似乎还能胜任愉快。这是一层。我们看出现在的新教育继承着旧教育的传统，而新教育继承着旧教育的传统是没有效果的。我们也知道教育不是孤立的事项，要改革教育必须其他种种方面都改革，但是改革教育的意识不能不从早唤起，改革教育的工具不能不从早预备。这又是一层。

二十年来，我们出版了不少书刊，有的已经绝了版，现在的读者不再能称说它们的名字，有的一直畅销，到现在还是读者爱好的读物。对于这些书刊，我们都是认认真真地编撰，审读，校对，印刷的。我们不敢说辛苦，辛苦原是做事的人的本分。我们觉得安慰的是在读者界造成了口碑，好多人说开明的书不马虎。不马虎，就内容而言，也就形式而言。可是我们宁愿认为这个话是鼓励，不是的评。如果认为的评，说不定会走上自满的歧途。认为鼓励，才可以加紧努力，期望做到百分之百的不马虎。

在二十年中间，竟有八年是抗战时期。战事初起，炮火就把我们的栈房厂房给烧了。后来迁移内地，心力交瘁，损失屡屡。湘桂战役中，损失尤其惨重，在黔桂路上，在金城江边，几百大包的书被抛散了，被烧掉了，这些都是我们心力的结晶啊！可是我们并不颓丧。我们这么想：战时损失当然越少越好。然而在无可避免的时候，也只有咬紧牙关忍受。忍受下来，想到自己与全国死的，伤的，亡家的，破产的同其命运，自然而然加强了同胞之爱，振起了努力再干的勇气。因而我们并不颓丧。

去年八月间日本投降，我国赢得了胜利，我们兴奋极了。

在战后建国的进程中，在推进文化的工作中，我们的力量虽然微薄，该可以尽其可能地贡献出来吧。不料美妙的希望禁不起无情的现实的打击，到现在才只一年，已经证明去年我们想的未免太天真了，就在这一年间，出版业遇到了比抗战时期更甚的困难。物价激剧上涨，运输依然阻滞，由于生活资料一般地贫乏，原该与日用品并列的书刊降到了奢侈品的地位。出版业虽然称为文化事业，但同时也是工商业中的一个部门，所有工商业都已奄奄一息，出版业岂能独居例外？因此，这一年间，我们出版的书刊不比往年多，我们书刊的销场不比往年广，什么出版方针呀，编辑计划呀，想得好好的，只能收藏起来，目前还是与抗战时期一样，只能勉力支撑。支撑下去总该有一条出路，正如其他各业总该有一条出路，咱们中国总该有一条出路。我们站在出版业的立场，也觉得民主与和平太需要了。实现民主，大家才可以商商量量，各尽知能，把千头万绪的公共事务办好。实现和平，大家才可以休养生息，培植元气，共同过那盼望了好久好久的安乐日子。就在这中间，书刊才会恢复到日用品的地位，我们才真可以尽其可能地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我们不能独自找出路，但是我们必得汇合在大势所趋之中找出路，这是我们此刻的信念。

我们与读者谈起开明书店二十周年，不能把出版编辑方面的什么好消息告诉诸位，我们非常抱歉。好消息不是听听就算的，要能实现才有意思，现在呢，却是什么方针计划都实现不了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笼统地说一句，读者界鼓励我们的那个意思，我们愿意继续奉行，直到永远，那就是“不马虎”。

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发表

有志青年何必一定要高攀学府的门墙

对于青年的升学与就业两个问题，我总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我常以为有志的青年大可不必进学校。现在的学校虽然名为新式教育，实质上与前清的教育初无二致，在精神上是始终一贯的。从前的教育要人读五经，要读通儒家的书本，以便代“圣人说话”，而现在则名目改变，形式改变，性质与目的却完全一样，同样的不管读的人是否受用，不管所授的知识是否合乎实用。这种学校培植出来的青年又有什么用呢？刚才杨卫玉先生说企业家已经不要学校的毕业生做助手了，那么读了书除了当统治者的帮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再看如今的教师教授们，真能给学生以理想，真能培养学生终身受用的知能的有多少？我不是说没有好教师，只是说在现在这样的学校制度教育制度之下，即使你是有理想有天良的教师，除了讲解钦定书本之外，又能做些什么？那么，有志的青年，有为的青年，不想做帮闲客帮凶者的青年，又何必去进这种学校呢？

我这种意见也许太不得体了，《文汇报》要我来谈升学指导，我却反对进学校。可是事实明明如此，我不能昧着良心，为了粉饰太平说谎。我的一个孩子在高中读了一年，他自己觉得在学校读书实在没有意思，不想读了，他举出的几点理由都很充足，家庭会议就通过了他的要求。现在他在书店编

辑部里做一点类乎"打杂"的事，他倒觉得满有兴趣，并且自以为学得了很多东西，比十年窗下学得的还多些，而且实用些。我亲自经历的事实如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了陶行知先生，他主张"做、学、教"的教育。在做的时候学，在做的时候教，唯有这样的教育，对青年，对国家社会，才会有益处，否则还是在家里做做柔软操，锻炼锻炼身体的好。陶行知先生生前积极筹办的社会大学，也能够解决我所说的问题。有志的青年不必进正统的学校，要读有用的书，求有用的知识，就该进社会大学，这是个自由的天地。可惜陶先生死了，青年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与陶先生一起奋斗的教育战士的身上了。

我心目中的升学问题就是如此。至于就业问题，那就更难说了。内战频仍，凶杀未已，工商凋零，农村破产，社会上失业者已经很多，未失业的天天战战兢兢，说不定哪一天会敲破饭碗，试问青年人又能到哪里去找职业？他听信了你所指导的原则，熟记了你的理论，他就能有饭吃吗？何况你今天站在这里指手划脚地指导人家怎样找职业，说不定明天你就要请求别人大发慈悲收容你。

所以，我想来想去总觉得无话可说，更觉得贵报在今天提出这两个问题来讨论，实在太不合时宜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发表

也来个比喻

近来有人用比喻谈国事，说我国有一段盲肠，盲肠须得割去，否则迟早会出毛病。这个比喻贴切不贴切，不是我要说的，我只是借它引起我的话，我也来个比喻。我说我国生了癌，极为危险。

手头有一本杂志，其中有一篇翻译文字谈到癌，抄几句在这里。

> 人是一块无数的细胞积聚而成的物体，而细胞是生命的最小单位。每一个细胞都有它特定的机能，构成皮、骨、腺、肌肉和血，而后造成一个人体。如果正常的话，这些细胞经过成熟分裂，成为新的细胞，以修补受了伤的组织，代替死去了的细胞。这个生长的程序是整齐有序的，由某一“管理员”控制着细胞生长的速率，使它平均。
>
> 突然地，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个“管理员”开了小差，细胞就变成了没有管束的野孩子。它们以极大的速率繁殖，积叠起来成为一块一块的肉。它们又侵入各种组织，可是这些组织里面本来是没有地位空给它们的，结果就造成雀巢鸠占的局面，侵入的细胞不但把原有细胞的食料夺去，甚至把它们毁灭了。一队一队的凶暴的细胞从原来那个地方生长出来，并在全身游荡，到处建立无政府的组织。这就叫做癌——细

胞发狂。

这些话说的是癌，但是说它说的是我国的某一个集团，也非常贴切，句句拍得上。你看，“它们又侵入各种组织……雀巢鸠占……不但把原有细胞的食料夺去，甚至把它们毁灭了。”你看，“一队一队的凶暴的细胞……在全身游荡，到处建立无政府的组织。”我们就生了这么样的癌。不过所谓“管理员”并不是“开了小差”，而是力量不够强，或竟是袖手旁观，以致任某些细胞“变成没有管束的野孩子”。在那篇文字，系就生理而言，他给“管理员”加上“某一”两字，显见他指的是一种尚未确知的机能。我们把国家看作人体，那所谓“管理员”却是显然可知的，就是广大的人民。

生了癌病，据那篇文字说，有三种方法治疗。一是用X射线，二是用镭，三是动手术。现在把关于动手术的原文抄在这里。

> 这种方法素来是被认为最危险最无望的，也许竟是最有效的方法。外科手术的日渐进步，新的技术的不断发明，已使手术治癌超过了以前认为不可能的境界。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发表

善　　忘

“八一三”日，无话可说。

我善忘，九年间的日子，过去了就算了，要在遗忘了的事件中找些材料，说些意见，实在不容易办。当然有些人是非办不可的，如要人，如名流，如代拟文稿的秘书先生。可是我并非这一类人，也就乐得自由自在，无话可说就老实不说。

善忘似乎不只是我个人的毛病，这个毛病似乎蔓延得相当广遍。大家似乎把“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这些日子以及这些日子的意义全忘了，把八年的抗战忘得一干二净。不然的话，怎么会到今天搞成这么个局面。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发表

什 么 道 理？

谁要出版报纸杂志，向政府机关备个案，登记一下，是应该的，凭这个可以统计，可以稽考。可是，政府机关如果不让备案，不给登记，借此使报纸杂志不得出版，那就是侵犯人民的自由。政府机关是为人民办理公共事务的，人民决不会叫它侵犯人民自己的自由，所以它侵犯人民的自由，比起个人侵犯他人的自由来，罪情更见严重。

《周报》出版了一年，还不让它登记，什么道理？不让它登记也罢了，还要叫它"暂缓出版"，什么道理？无论如何，这是政府机关的错失。在政府机关公开宣告它本来就不讲道理之前，我们总要指斥它的错失。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发表

诗　　话

从《文艺复兴》七月号，读到杜丹乡先生的几首诗，我最喜欢那首《宣言》：

你有鞭子，
　我有意志！
刺刀是你的，
　理想是我的！

我爱你所恨的，
你恨我所爱的；
咱们中间永远存在着
　一段天大的距离。

你有手枪的恐怖，
你有枷锁的威胁，
你有策略、命令……
　监狱、陷阱……

但是，你

以及你的主人
　和你的徒子徒孙们哪，
　却没有人民！

我说喜欢，也不必说什么理由，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总之，在如今时候，读这样的诗最配胃口。杜丹乡先生总称他的诗叫《愤怒的抒情诗》。在如今时候，除了“愤怒的抒情诗”还有什么诗可以写的？

我也有些语句，像不像诗不管他，当然由于愤怒，够不够得上抒情可不敢说，姑且写在这儿。

你爱好听的名儿，
我把一切好听的名儿让给你，
咱们站在两边儿，
水火之势不自今日始。

你喜欢自居革命，
好，我就自居反革命；
可是，你骨子里若是反革命，
我就反反革命。

你喜欢自居正动，
好，我就自居反动；
可是，你骨子里若是反动，
我就反反动。

你，爱好听的名儿的人呀，
朝你说旁的话全是多馀的，
只有一句话：
“不与同中国！”

说起诗，记得闻一多先生有一首《一句话》，那是十八九年前写的。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教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一句话”现在是“爆”出来了，而且，不止是一个霹雳，是漫天漫空的雷阵。可是，偏有人不爱听这“一句话”，他们以为中国是他们的，“咱们”都没有份。一多先生就死在这上头。然而，你不妨想想那个比喻，“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世界上有扑灭爆发的火山的事情吗？除了妄人谁也不相信。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发表

现实与理想

现在人往往说注重现实，要把当前的环境弄明白，要把实际的情势搞清楚。这当然是不错的。可是，并不是弄明白了当前的环境，搞清楚了实际的情势，就到此为止，再没有下文了。假如真的没有下文了，注重现实其实也是多事，倒不如省心省思，任凭现实把咱们来摆布。咱们要注重现实，为的是咱们有理想，那理想就是下文。理想与现实距离多少远？现实若是助成理想的，怎样促进它？现实若是阻碍理想的，怎样排除它？为有这些问题，故而咱们必须注重现实。

没有理想，注重现实至多只能得到些世故罢了。咱们常听人说：如今世道，金钱第一，只要有钱，什么都办得到。又听人说：现在只讲强权，不讲公理，一天强权在手，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些见解分明是从现实中摸索得来的，也不能说它不对，在目前社会中，金钱与强权的确占有强大的势力。可是，听这些话的声气，不正是世故老人的调子吗？而且，其中还含着羡慕与期望，言外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我才有大量的金钱啊！什么时候我才有充分的强权啊！存着这样的羡慕与期望，自然只有顺从现实趋势的份儿了。

放眼看世界，不知道怎么搞的，如今正有一批人那样短视地注重现实，他们不但自己毫无理想，还要用理想主义的

名称嘲笑人家，而他们却是操持国家大计的人。据说，第二次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根本不一样，第二次大战是为了一种理想打的。这个话得到普遍的承认。可是,仗打完了的时候,竟把为它打仗的理想忘得一干二净。有些人说，这由于那批人的私欲作祟，话当然中肯。不过我们说起来，还由于那批人的愚蠢透顶。如果减轻他们的愚蠢，他们的私欲也就渐渐消除了。他们的私欲消除净尽,当初的理想也就渐渐实现了。那时候，只有增进他们的生活幸福，决不会损伤他们的一根毫毛。原来当初的理想是一种极平凡而极切实的理想，无非要世界各国彼此和平相处，各国的人在物质上精神上都能过好好的生活，如此而已。这样的理想，决非要亏损什么人去补益什么人，不过希望大家都好就是了。说它平凡，因为其中没有新奇的意见，没有浪漫的言辞。说它切实，因为它可以建立全世界的秩序，可以改进全人类的生活。只有愚蠢透顶的人，才会在为这个理想打了一场惨酷无比的大仗之后，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看了目前的情形，悲观的人也许要说理想已经被抛弃被虐杀了。我们可不这样想。我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有许多人在那里注重现实，同时不放弃理想。他们所以要注重现实，就为的他们怀抱着理想。不过他们不是在什么会场中发表演说，对什么记者发表谈话的人，所以他们的声音传播得不怎么广。可是也有传播得很广的，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篇演说，最近美国商务部长华莱士的一篇演说。

爱因斯坦说：我们要求把原子弹的秘密公开宣布出来，同时要求全世界通力合作，把原子能的可怕的威力用在人类的

福利上。这样简单的想法，守旧的人一定会举出无数"现实"来反对。可是，人类的危机与人类的希望，难道还不够现实吗？面对着这样的现实，还想依靠军备作保障，不是陈腐可笑吗？这危机是科学带来的，但是真正的关键还在人类的智慧，人类的心。我们不能用机械改变旁人的心。我们只能以身作则，从改变自己的心做起。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决不能计划战争同时又计划和平。——爱因斯坦这些话，彻头彻尾地表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但那是多么平凡而又多么切实的理想主义啊！

华莱士的演说，大旨是讨论和平与怎样取得和平。他说：各地的人从没有今天似的切望和平。假定近代战争需要我们付出四千亿元的代价，那么，我们乐意付出更大的代价以取得和平。但是，和平的代价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要用人类的心和思想来计算。和平的代价该是大家放弃若干偏见，仇恨，恐惧和无知。以下华莱士谈到目前国际间的具体问题，这里不再引述，单就上面引述的发端辞来看，可知华莱士所怀抱的也是极平凡而又极切实的理想主义。

世界将往哪里走？好像是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但是，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最大多数的人，是世界的舵手，只要看舵手的意向如何，世界的趋向也就可以知道一大半了。现在虽然有一批人短视地注重现实，忘了他们曾经怀抱过的理想，最大多数的人却并不然。最大多数的人注重现实，同时不放弃理想，岂但不放弃，并且坚持理想。那理想不是无中生有，从空想来的，是从现实生活中体验得来的，如果不把它实现，人类没法好好儿生活下去。爱因斯坦说起人心，华莱士也说

起人心，人心如此，世界的趋向就可以明白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发表

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答谢词

我现在自荐，代表开明同人对诸位先生的指导答谢一二。

话再重说几句，假如锡琛先生不离开商务，便没有开明。锡琛先生的所以离开商务，因为在《妇女杂志》上写的文章不合当局的眼光。他们认为妇女问题如此讲，实为世道人心之忧；社会要受到坏影响的。照现在看来，他们的见解是错的。《妇女杂志》中所讲的独立自由种种权利，都很平常。锡琛先生为此离开商务，编刊《新女性》，仍旧保持同样的作风。可见开明在开始的时候，就跟一般目光短浅的保守不好的传统的人不同。

今天承诸位先生的指导，我们诚恳接受。在以后悠长的岁月里，当仍旧保持原有的作风，不加改变。讲到开明同人的作风，有四句话可做代表：是“有所爱”，爱真理，爱一切公认为正当的道理。反过来是“有所恨”，因为无恨则爱不坚，恨的是反真理。再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合乎真理的才做，反乎真理的就不做。一般朋友中间做人是这样的。虽无标语，但确实以此态度做人，以此态度做出版编书等事，这是可以告慰于诸位先生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相 濡 以 沫”

去年在重庆，参加鲁迅先生纪念会，我提起了他爱用的一句话“相濡以沫”。今年在上海，参加他的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我仍旧提起了这句话。

大概是我的话没有说清楚，或者根本没有把意思表达出来。第二天看报纸的记载，与我所说的不大相符。因此再在这里说一说，辞句和顺序未必与说话当时全同，大旨却不相违异。

“相濡以沫”这句话出于《庄子》，鲁迅先生常爱引用它，只是断章取义，与这句话的上下文不大有关系。单就这句话看，是一个悲壮动人的场面。一群鱼失了水，干得要死，大家吐出口沫来，彼此互相沾润，藉此延长大家的生命。试想，吐出自己仅有的东西来，不但沾润自己，还要互相沾润，那“生的意志”的强固和“群的联系”的强固，不是够得上悲壮两个字的考语吗？

鲁迅先生引用这句话，为的是他所处的环境正是一片干地，没有一滴水。他又见和他同在的人所处的是相同的环境，于是自然而然记起这句话。说它是口号，不如说它是信念。他奉行他的信念，在一片干地上，所吐的口沫非常之多。二十册的《鲁迅全集》是他的口沫，新近出版的《鲁迅全集补

遗》是他的口沫，由他校印的木刻画集以及《海上述林》等书是他的口沫，尤其重要的，他那明辨是非的态度，坚决奋斗的精神，待人接物的诚恳与认真，全是他的口沫。与他接触的人见他的为人，读他的文字，也各各吐出他们的口沫，相信他，学习他，和他在一起。到了今日，“走鲁迅先生的道路”成为普遍的号召了。我想这么说：鲁迅先生的影响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奉行那“相濡以沫”的信念。

鱼到了“相濡以沫”的境地，虽然延长一时的生命，结果总不免死掉。可是，鲁迅先生引用这句话是取作比喻，说的还是人事。就人事方面想，情形就不同了。鲁迅先生逝世不久，我曾作一首七律挽他，现在抄在这里：

木坏山颓万众悲，感人岂独在文辞。暖姝夙恨时流态，刚介真堪后死师。岩电烂然无不照，遗容穆若见深慈。相濡以沫沫成海，试听如潮继志词。

前面六句不说，只说末后两句。这两句还是比喻。人与人要是“相濡以沫”，范围越推越广，口沫越聚越多，不将汇成大海吗？既然有个大海，被喻为鱼的人就可以在其中游泳自如，不再是干得要死的鱼了。而现在，大海已经汇成了，因为已经听见了潮水似的声音。潮水似的声音就是所谓“继志词”，就是“走鲁迅先生的道路！”“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一类的号召。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作

名 与 实

最近我国与美国签订中美商约，就文字上看，确实表示“互惠”的精神。既是“互惠”，那当然是平等条约，不是不平等条约。可是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力相差太远，在经济力相差太远的两国之间“互惠”起来，实际上只是“单惠”，受惠的是经济力强的一面，吃亏的是经济力弱的一面。所谓平等，原指彼此地位均等，谁也不吃亏。现在一面受惠，一面吃亏，那么中美商约并非平等条约，还是与几十年来全国人民痛心疾首的不平等条约一模一样，显然可见。本志本期刊载张锡昌先生的一篇文字，详细讨论中美商约，请读者诸君注意。我在这里提中美商约，不过说这正是我们训练思想的一种好资料。看字面，是“互惠”，是平等，应当为我国庆幸。但是就实际方面想，是“单惠”，是不平等，应当为我国着急。字面与实际不相一致，庆幸与着急不能调和，我们何去何从呢？我们说，我们必须着重在实际方面，认定中美商约是一份不平等条约，我们不但心里着急，而且要发为言论，表现于行动，打消这一份不平等条约。这样，我们的思想就想对了，又经历一回有益的训练了。怎么说想对了？因为这样想法切合于实际。不切合实际的想头是空想，是幻想，仅仅可以娱悦自己，想着有趣，对于应付实际生活却是全无用处的。

从前赞美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官吏的治绩，往往有一句话，叫做“综核名实”。名是语言文字的总称，口头说的，纸上写的，都是名。实是实际，一切事物这样那样的存在，这样那样的发展，都是实。名与实要符合，这差不多是人类的基本愿望。假如没有这个基本愿望，在初民时代也不会由发声进化而为语言，到了开化时代也不需要制造文字来代表语言了。因此，能够把名与实综合起来加以考核，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好？好就好在考核之后必然还有下文。假如名实不符，该怎样设法使它相符，名实相符了，就见得事情办得不错，尽可以照样办下去：这些就是下文。能做到这样，那政治是脚踏实地的，当然要说它好了。所以“综核名实”成了赞美治绩的一句话。

其实在个人的立身处世方面，知人论世方面，也很需要“综核名实”。语言文字本身，从一方面说，无所谓好不好。分别好不好要根据语言文字以外的实际。实际好，才说那语言文字好，实际不好，才说那语言文字不好。实际是根本，语言文字只是表现实际的一种方式。所以一个人不能单凭说好话写好文字做人。对于事和人，也不能单凭语言文字下判断，最重要的在“听其言而观其行”。一个人如果能够随时随地“综核名实”，他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人生哲学，也是个够标准的人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作

“生 活 教 育”

——怀念陶行知先生

关于教育的见解，千差万别，可是扼要地区别起来，也很简单，大致可以分为相反的两派。就教育的目标说，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工具，另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人，独立不倚的人，不比任何人卑微浅陋的人。就教育的理解说，一派认为受教育者像个空瓶子，其中一无所有，开着瓶口等待把东西装进去，另一派认为受教育者自有发掘探讨的能力，这种能力只待培养，只待启发，教育事业并非旁的，就只是做那培养和启发的工作。就教育的方法说，一派注重记诵，使受教育者无条件地吞下若干东西，另一派注重创发，不但使受教育者吞下若干东西，尤其重要的在使受教育者消化那些东西，化为自身的新血液，新骨肉。以上说的目标，理解，方法三项是一致的。前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工具，就不能不把他们认作空瓶子，要他们无条件地吞下若干东西。后一派希望受教育者成为人，自然要把他们当人看待，自然要把培养能力启发智慧作为教育的任务，自然要竭力使他们长成新血液，新骨肉。就受教育者的方面说，受前一派的教育是“为人”，有人需要一批工具，你是应命准备去做工具，不是“为人”是什么？受后一派的教育是“为己”，“古之学者为己”的“为己”，发展知能，一辈子真实受用，这种教育就是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生活教育”。

在皇帝的时代，在法西斯的国家，当然推行前一派的教育。皇帝要人民作工具供养他，法西斯机构要人民作工具拥护它，势所必然把教育作为造成工具的手段。但是，皇帝早已推翻了，法西斯已经打垮了，在人民的世纪中，人人要做独立不倚的人，不比任何人卑微浅陋的人，就必须推行后一派的教育，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生活教育”。

放眼看我国当前的教育，无论认识方面，表现方面，都还脱不出前一派的窠臼。教育原不是孤立的事项，有这么样的中国，就有如现在模样的教育。有人说，要把教育办好了，才可以把中国弄好。这自然见出对于教育的热诚和切望，可是实做起来未必做得通。还是调转来说，要把中国弄好了，才可以脱出前一派教育的窠臼，彻头彻尾地推行后一派的教育。所以陶行知先生一方面竭力提倡“生活教育”，一方面身任民主运动的先锋。现在推行“生活教育”，不怕艰难，不避危害，当然也有成就，那成就对于中国的弄好也大有帮助。然而那成就只是一点一滴的，要收到普遍的效果，要使人人受到充实自己、发展自己的教育，总得在中国真正弄好了之后。

担任教育工作的人多极了，人的聪明才智，一般说来是相去不远的，然而像陶行知先生那样提倡并且推行“生活教育”的有几人？像陶行知先生那样认清教育与其他事项的关系，献身于民主运动的又有几人？安得陶行知先生的精神化而为千，化而为万，整个教育界的人都把陶行知先生作为楷模，使中国与中国的教育一改旧观啊！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作

又来挽《民主》

刚挽过《周报》，现在又来挽《民主》，悲愤极了。

在《周报》被迫停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必然也容不得《民主》。我们知道，隔不多久，《民主》也将使用那刺人眼睛的三个字——“休刊号”。

准备着挨的一刀，刺过来觉得更痛。何况我们已经屡次被刺过了一刀。

当然，多刺一刀，我们痛得更利害。可是，多刺一刀，也使我们恨得更深切。

墨索里尼被枪毙过后，尸首倒挂在米兰市上。有个妇人朝他打了五枪。

为什么要五枪？不是一枪也不用打了吗？

那个妇人有她的道理。她的每一枪为她的一个儿子报仇，她有五个儿子死在墨索里尼的疯狂政策之下。

第一枪为了第一个殉难的，第二枪为了第二个。直到第五枪，每一枪都由于更深切的仇恨。

我们挽《民主》，我们恨。

我们决不肯说“予欲无言”；我们要呼喊“记住这个恨！”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发表

牛

在乡下住的几年里，天天看见牛。可是直到现在还像显现在眼前的，只有牛的大眼睛。冬天，牛拴在门口晒太阳。它躺着，嘴不停的磋磨，眼睛就似乎比忙的时候睁得更大。牛眼睛好像白的成分多，那是惨白。我说它惨白，也许为了上面网着一条条血丝。我以为这两种颜色配合在一起，只能用死者的寂静配合着吊丧者的哭声那样的情景来相摹拟。牛的眼睛太大，又鼓得太高，简直到了使你害怕的程度。我进院子的时候经过牛身旁，总注意到牛鼓着的两只大眼睛在瞪着我。我禁不住想，它这样瞪着，瞪着，会猛的站起身朝我撞过来。我确实感到那眼光里含着恨。我也体会出它为什么这样瞪着我，总距离它远远的绕过去。有时候我留心看它将会有什么举动，可是只见它呆呆地瞪着，我觉得那眼睛里似乎还有别的使人看了不自在的意味。

我们院子里有好些小孩，活泼，天真，当然也顽皮。春天，他们扑蝴蝶。夏天，他们钓青蛙。谷子成熟的时候到处都有油蚱蜢，他们捉了来，在灶堂里煨了吃。冬天，什么小生物全不见了，他们就玩牛。

有好儿回，我见牛让他们惹得发了脾气。它绕着拴住它的木桩子，一圈儿一圈儿的转。低着头，斜起角，眼睛打角

底下瞪出来，就好像这一撞要把整个天地翻个身似的。

孩子们是这样玩的：他们一个个远远的站着，捡些石子朝牛扔去。起先，石子不怎么大，扔在牛身上，那一搭皮肤马上轻轻的抖一下，像我们的嘴角动一下似的。渐渐的，捡来的石子大起来了，扔到身上，牛会掉过头来瞪着你。要是有个孩子特别胆大，特别机灵，他会到竹园里找来一根毛竹，伸得远远的去撩牛的尾巴，戳牛的屁股，把牛惹起火来。可是，我从未见过他们撩过牛的头。我想，即使是小孩，也从那双大眼睛看出使人不自在的意味了。

玩到最后，牛站起来了，于是孩子们轰的一声，四处跑散。这种把戏，我看得很熟很熟了。

有一回，正巧一个长工打院子里出来，他三十光景了，还像孩子似的爱闹着玩。他一把捉住个孩子，“莫跑，”他说，“见了牛都要跑，改天还想吃庄稼饭？”他朝我笑笑说，“真的，牛不消怕得。你看它有那么大吗？它不会撞人的。牛的眼睛有点不同。”

以下是长工告诉我的话。

“比方说，我们看见这根木头桩子，牛眼睛看来就像一根撑天柱。比方说，一块田十多亩，牛眼睛看来就没有边，没有沿。牛眼睛看出来的东西，都比原来大，大许多许多。看我们人，就有四金刚那么高，那么大。站到我们跟前它就害怕了，它不敢倔强，随便拿它怎么样都不敢倔强。它当我们只要两个指头就能捻死它，抬一抬脚趾拇就能踢它到半天云里，我们哈气就像下雨一样。那它就只有听我们使唤，天好，落雨，生田，熟田，我们要耕，它就只有耕，没得话说

的。你先生说对不对，幸好牛有那么一双眼睛。不然的话，还让你使唤啊，那么大的一个，力气又蛮，踩到一脚就要痛上好几天。对了，我们跟牛，五个抵一个都抵不住。好在牛眼睛看出来，我们一个抵它十几个。”

以后，我进出院子的时候，总特意留心看牛的眼睛，我明白了另一种使人看着不自在的意味。那黄色的浑浊的瞳仁，那老是直视前方的眼光，都带着恐惧的神情，这使眼睛里的恨转成了哀怨。站在牛的立场上说，如果能去掉这双眼睛，成了瞎子也值得，因为得到自由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

“为万世开太平”

大家努力不懈了，大家就有个希望在。希望有大有小，有深有浅，可以说各各不同。可是，只要是进步的人，彼此的希望就有个共同之点，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为万世开太平”是张横渠“四句教”的末了一句。张横渠以理学大家的胸襟，深切体验到人生的标的要像他所标举的那样才对。他那“四句教”是很足以摄引人心的，谁领会了它的意思，谁的人生境界就展开了光明的前景。可是，究竟为时代所限，他的“四句教”不免带着玄学意味。

我们现在袭用他的“为万世开太平”是现实意义的，绝不带玄学意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令人怀念不已的罗斯福早已提出了“四大自由”，各国进步人士正在竭力争取集体安全与全面和平，殖民地以及类乎殖民地的人民不惜以血以肉发动解放运动，这些是为了什么？无非要“为万世开太平”。

科学进步了，交通发达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相需相成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从前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只是一句运用修辞方法的言语，现在我们却实实在在进了“天下一家”的时代。如果不“为万世开太平”，这个世界怎么住得下去？

所以，从现实意义上，我们希望“为万世开太平”。

这个希望可以说是为公的，也可以说是为私的。要知道，现在已经到了公私不分的时代。私的方面搞不好，公的方面没法搞好。公的方面得不到安全和平，私的方面休想得到安全和平。公私既然不分，就只有把公私放在同一的地位上，无论学习什么，服务什么，为公也为私，为私也为公。

在公私一致的努力上，我们就看见了“为万世开太平”的希望。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发表

“努力事春耕”

新年里与诸位相见，赠给诸位一张贺年片，印在本期《开明少年》的开头。那是胡一川先生的一幅彩色木刻，原来收在《抗战八年木刻选集》里，我们把它重新铸版，短小了尺寸。在画幅之下，我们题了四句诗：

大地藏无尽，勤劳资有生。
念哉斯意厚，努力事春耕。

现在谈谈那四句诗。

“大地藏无尽”，就是说我们居住在大地之上，这大地储藏着无穷无尽的物质。通常把物质分做三大类，动物，植物，矿物。年年岁岁有新生的鸟兽虫鱼，飞的，走的，跳的，游的，参加到大地这座舞台上来，演出生动活泼的戏剧。年年岁岁有新的苗萌发出来，新的叶子长出来，新的花朵开出来，新的果实结出来，把大地这座舞台点缀得这么丰富，这么美丽。再说矿物。金呀，银呀，铜呀，铁呀，锡呀，以及煤呀，石油呀，在古代已经采来使用，到现代使用得更多更勤。可是从古到今掘地开矿，还是像在苹果上削去了一层表皮，没有开采的比已经开采的多到多少倍，谁也说不上来。只要就以

上说的简单地想一想，就觉得大地真像个传说里的“聚宝盆”，盆里的东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岂但物质而已，还有种种的能力。水有水力，风有风力，发了电有电力，破坏了原子核有原子能。这些能力都由物质而来，物质无穷无尽，能力也无穷无尽。

“勤劳资有生”，就是说我们人类凭劳动来供养自己。“有生”本来包括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这里缩小范围，用来指我们人类。试想一想，我们人类如果像猴子一样，饿的时候采几个果子来吃，渴的时候跑到溪边去喝几口水，那生活多么可怜！我们人类可并非如此，原因在于我们能劳动。我们手脑并用，造成种种劳动工具，练成种种劳动技能，这就脱离了动物的生活，创造了人的生活。人的生活不但活命而已，而且要活得好，不但物质方面要好，精神方面也要好。如果一只麻雀一只黄猫懂得我们的话，我们与它们谈起来，它们一定会羡慕我们的生活，说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比它们胜过千万倍。要知道这不是平空得来的，是我们千万代的祖先继续劳动的结果啊！一切享用是劳动的结果，一切发明是劳动的结果，一切著作是劳动的结果。我们的祖先既然劳动过来，传到我们，我们自该继续劳动，把人类的生活变得更丰富，更美好。就每一个人说，劳动供养自己，同时供养他人，供养这一辈子的人，同时遗留给下一辈子的人。劳动的技能尽可以改良，劳动的辛苦尽可以减轻，劳动的不公平尽可以排除，可是决不能停手息脑不劳动。一朝人类劳动完全停止了，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能够想象吗？

“念哉斯意厚”，就是说，想想吧，这两层意思多么深厚。

哪两层意思？“大地藏无尽”是一层，“勤劳资有生”又是一层。怎么说深厚？因为其中大有可想。前面说的一些话就是分别想起的，现在再把两层意思联在一块儿想。我们居住在这么丰富的大地上，我们的凭借太好了。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劳动，我们的努力堪以自慰了。单有丰富的大地，没有我们的劳动，我们的生活就与鸟兽虫鱼一样，至多像猴子。猴子也居住在这个丰富的大地上，可是它们除了吃几个果子喝几口水以外，得到了什么好处？单有我们的劳动，没有丰富的大地，也不成。常言说，巧媳妇做不来没有米的饭。必须有物质，劳动才可以显出能耐，得到收获。必须有物质，劳动才可以利用工具，发明技能。且不说大地空无所有（这是不能想象的），单说大地储蓄的物质假如没有这么丰富，人类的生活与人类的文明就必然差得远了。我们幸而有这么丰富的凭借，又幸而能继续不断的努力，这才使生活一步一步的改进，文明一步一步的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照现在的情形看，说我们人类是大地的主人，大地是为我们人类准备的舞台，该不是夸大的话吧。可是现在的情形还没有到极限，也许永远不会有什么极限。那么，将来的进步将达到什么地步，岂不是很难预言，只有到得那时才会知道吗？想到这儿，就觉得意思更深厚了。我们既然有了这样的幸运，万万不可辜负，必须加紧努力才行。

“努力事春耕”，这一句是不须解释的，看字面就明白。春耕是一年农事的开头，什么事都一样，开头的功夫用得越深，到后来的成果越大越多。想到了前面说的那些深厚的意思，“努力事春耕”是不须勉强的了，是自发的自动的了。望

着丰富的大地，不肯不努力。想着劳动的可贵，不肯不努力。努力啊！努力啊！深深的耕下去，将会有无穷无尽的收获到手。这“春耕”又岂只指耕田一件事呢？我们学习什么，研究什么，经营什么，如果比做农事，同样是“春耕”啊！

四句诗谈完了，我们愿以十二分的诚意，祝颂大家“努力事春耕”！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发表

谈“利用”

“莫要被人家利用了啊！”最近的抗暴运动发生之后，又有人说这一句了。

“莫要被人家利用了啊！”听听那声音，何等关切，仿佛孟子所说的见孺子将入于井，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似的。可是过细一想，把对方看成完全不懂事的孺子，未免低估了对方，而太过低估往往是错失，至少有欠尊敬。所谓对方，难道只是些中无所主，是非莫辨，专待人家一脚踢来一脚踢去的皮球吗？不就他们所言所行的本身着眼，辨别个真是真非，单就他们有所言有所行的迹象着眼，叮嘱他们当心被人家利用，说得严重些，简直是否认对方的人格。

“莫要被人家利用了啊！”听听那声音，何等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按照那意思推广开来，最好是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问，明明有眼睛，只当看不见，明明有耳朵，只当听不见，明明有脑子，只当想不清，那才可以完全避免被人家利用。然而，畏首畏尾，身其馀几，这成了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个己说，这是个寂然木然的顽躯，就大群说，这是个于群无补的废料。不被人家利用是做到了，可是生命也完了，在临到死亡之前，一直是不死不活的奄奄一息，不开什么花，不结什么果实。

我们忠厚存心，不愿意猜测说这句话的人怀着什么坏心肠，相信他们全出于一片好心。可是这好心肠里头很有些不好的成分在，一是否认对方的人格，二是引导对方走向畏首畏尾的道路，直到成为顽躯废料而止。这恐怕是说这句话的人没有料想到的吧。

要问明被不被人家利用，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辨明自己所言所行的是或非，同时辨明人家所言所行的是或非，是公谋还是私图，就成了。如果自己所言所行荒谬，而与人家荒谬的私图相凑合，那就是朋比为奸，其恶极大，岂止被利用而已。如果自己所言所行正确，考量人家所言所行也正确，而且确系公谋，那么彼此结合起来，正是志同道合，共策进行，谁也没有利用了谁。

一般的见解，被人家利用好像只是青年们的事。这种见解，自有血气未定或是认识不够之类的话作它的根据。若在中年人老年人，血气定了，认识够了，一切都把得住舵，就没有被人家利用的危险。其实这也不过是想当然罢了，尤其是中年人老年人大多这样想当然。我们倒要劝告中年人老年人，且把一片好心用在自己身上，先问问自己有没有被利用吧。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发表

记教师的话

时常与担任教师的朋友接触，听见他们谈到对于职务的感想。现在信笔记在这儿。

“担任教师是最贪懒最没出息的人干的事情。无论你教的什么功课，譬如说本国史或是代数学吧，开始担任的一个学期当然要预备预备，免得临时哑场。教过一两个学期，你的那出戏唱熟了，一上场就哗啦哗啦唱起来，好比开留声机。留声机尽可以开一辈子，只要你在人事方面处得好，每个学期总有一张或几张的聘书拿在手上。如果你还能稍稍费一点儿心思，随时插入些新材料，换用些新讲法，那就好比戏场里说的‘某老板又有新腔了’，即使得不到听众的喝彩，至少在唱的人总觉得有劲儿，并非敷衍了事。唱完以后，拿起书本踱出教室，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享受‘无事一身轻’的妙趣。暑假是那么长，六个星期，多到十个十二个星期。寒假也不短，三四个星期不会少你的。还有国庆校庆以及什么纪念日，填在授课时间表上的课碰上那些日子，就堂而皇之地‘作罢’了。常言道，‘当过三年叫化子，连皇帝也不想当了。’我要套一句说，‘当过三年教师，连皇帝也不想当了。’当然，这是从贪懒的观点说的。怎么说没出息呢？有出息的，‘学而优则仕’，谁肯干这吃不饱饿不死的勾当？你看，某公某公，什么学的

权威，什么方面的专家，他们都从政去了，参政员，国大代表，司长，次长，部长。他们宁愿让什么学成为绝学，专家的头衔也不妨情让，决不肯错过了向上爬的机会。爬呀，爬呀，在一个人或一个集团之前低头没关系，重要的是可以操纵大多数人，享受大多数的声色货利。他们都是有出息的家伙，是强者，有意志，有能耐。只有我们这一批弱者，自知对于此道毫无办法，这才甘守寂寞，冷冷清清地当个教师。说甘守寂寞只是句好听的话，拆穿西洋镜，还不是自认没出息的表现？”

“韩昌黎说，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我自问不是那样的师。道字太玄虚，且不说它。就说业吧，我除了能在教室里空讲一通之外，根本就是个无业游民。自己既然无业，又有什么业传授给学生？再说解惑。我自己正有一肚子的惑在这儿。美苏冲突呀，外长会议呀，无休无歇的内战呀，越来越涨的物价呀，也说不尽许多。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实在搞不清楚。我的办法很干脆，搞不清楚，索性还它个不闻不问，这就无所谓惑了。可是这个秘诀不便传授给学生，他们青年人也未必肯采用我的消极应付办法，那么，我还有什么能给他们解惑的呢？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我去上课，为的是每个月可以向会计处领薪水。我对学生也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去上课，为的是他们的时间非花掉不可，为的是他们要一张实在没有用可又不能不要的文凭。我们用同样的手段达到不同样的目的，于是在教室里碰头了，如是而已。”

“我担任教师，起初竭力督促学生写笔记。过了些时要他们交上来让我看。看见有些本子上只有三言两语，有些本子末了儿一句话写了半句就停止了，忍不住怒从心头起，把这

几个学生着实骂了一顿。大概是我的骂发生了效力，以后再交上来，全都是写得满满的了。上课时候，学生执笔在手，惟恐漏掉一词半语，急急忙忙地写个不停，时时抬起头来，两颗眼珠慌慌张张地朝我一望，脸皮胀得红红的，直红到颈根边。当然，我满意了，讲得格外起劲。可是，有一回讲得正起劲的时候，脑子里忽然钻出来一个怪想头：'我所讲的全是珍珠宝贝，值得他们这样辛辛苦苦地捡起来藏起来吗？看他们的眼光和脸色，看他们的紧张的动作，真好像面对着珍珠宝贝呀。'这么一想，我愣住了，至少有两分钟说不出话来。我到底有多少珍珠宝贝给他们呢？诠释一个词儿，花上五分钟，讲解一句句子，又是五分钟，打一个比方，说得高兴就是十分钟，话像藤蔓一样爬开来，直到去题千里，不得不用'再说'把它拉回来，至少也得十五分钟。如果这些并不是珍珠宝贝，珍珠宝贝也就很少了。然而学生仿佛以为没有一句不是珍珠宝贝，只怕漏掉一颗半件，成为终身的遗憾似的。他们虽然不自觉，我可感到良心的谴责。当时我很想提醒他们说，'你们不用捡得这么勤，我这里珍珠宝贝实在有限得很呀！'但是，出尔反尔，成什么话？而且，这碗饭我还得吃下去呢，也就若无其事地讲下去。不过收到他们的笔记本的时候，我再也不敢看了，在桌子上放了一天就发还他们。我怕的是看见自己吐出来的尽是些渣滓瓦砾。”

听了上面的一段话，另外一位教师接着说了。

“我同意你的话。干我们这一行，真叫做反省不得，你一反省，就会觉得自己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就会觉得自己简直是个疯子。先就坐在我们面前的学生说。他们是注定坐着听

讲的人。小学里六年，正经事务是坐着听讲。中学里六年，还是坐着听讲。升到大学里，坐着听讲的命运还没有完，又是整整的四年。加起来是十六年呢！十六年间，死死板板地坐在那里听讲，要是不感觉厌倦，必然是个神经失常的人。我们在什么会里听人家演说，不是坐了一个钟头就要打呵欠伸懒腰了吗？他们坐着听讲并不是他们要听，是我们要讲给他们听。我们要讲给他们听，他们就非听我们的不可。至于我们为什么要讲给他们听，说来话长，头绪也纷繁，姑且不谈，总之我们是注定要讲些什么给他们听的人。我们各人有各人的一套，只要眼睛望着前面，心里不作什么反省，尽可以理直气壮地哗啦哗啦。一反省可不得了，拿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不很切用的经验，讲给并不要听可又不得不听的一班人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我那学校建筑很马虎，教室与教室隔着一层薄板壁，每逢我写黑板的时候，隔壁教室里同事的声音传过来了。那声音呆板枯燥，孤立无助，用有形的东西来比拟，好像一只独木船停泊在绝港里，不要不紧的风吹着它，不要不紧的水波打着它。听，听，听，听，连字眼也辨不清了，只听见一串类似哀叫的声音，使人不乐意听它可又没法避开它。同时我仿佛觉得在隔壁教室里发声的就是我自己，另外一个化身的我在听那哀叫。我为什么要这么哀叫呢？我为什么要每天每天这么哀叫呢？这么想的时候，我几乎确认自己是个疯子了，只差没有丢掉粉笔跑出教室。”

可记的还有许多。以上几位的话可以说是属于一类的，别一类的话，过些时再记吧。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发表

如果教育工作者发表《精神独立宣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罗曼罗兰、巴比塞、罗素等人发表过一篇《精神独立宣言》，说明文化界人士的态度：消极方面，不再受野心家的利用；积极方面，要为自己所抱的正义和所奉的理想坚决努力。

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过去了。放眼看世界，全不像个"为万世开太平"的局面。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大家怀着热切的希望，以为人类该是一种长进的动物，经过了这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总会把世界好好的安排一下吧。谁知战争结束之后却是强烈的失望。单是心理上的失望还没多大关系，无奈连实际生活上也失望：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原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时期，岂止文化界人士，各国各民族大多数的人正要联合起来发表一篇《精神独立宣言》，表明消极方面怎么样，积极方面怎么样。这篇宣言至今没有看见，实在也没有人写；可是写在人们心里，写在所有切望"为万世开太平"的人们心里。

把范围缩小来，人限于我国，工作部门限于教育，我国的教育工作者也切需来一篇《精神独立宣言》。

教育事业的目标在辅导下一辈人的发育生长。说到发育生长，其中就含有健全的，善良的，群己两利的，种种意思。

辅导不能凭空辅导，必须寄托在实际事为上。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锻炼都是实际事为，通过这些实际事为才可以辅导，才可以使下一辈人发育生长。

教育并不是一种孤立性的事业，与其他部门都有牵连。可是，教育决不是一种附庸性的事业，对于辅导下一辈人的发育生长，他负着最直接的责任。其他部门与教育的目标协调的时候，教育工作者自当精进不懈，努力尽他们的责任。其他部门与教育的目标不协调的时候，教育工作者为了不肯放弃他们的责任，就得自闯道路，干他们自己的。曾国藩所说的"一二人"固然不足以收什么功效，但是大群的教育工作者都来干他们自己的，未尝不可以转移风气，挽回世运。

如果我国的教育工作者要发表一篇《精神独立宣言》，我想，其中至少包含以下几点意见。

一、表示教育工作者不再承袭我国传统的教育精神。传统的教育以圣经贤传为教。且不问圣经贤传是否适于为教，而用圣经贤传作幌子，实际上却把受教育者赶上利禄之途，是传统的教育最不可容恕之点。如今的什么学科什么课程也是幌子，实际上也在把受教育者赶上利禄之途。利禄之途无论赶得上赶不上，总之与真实受用是两回事儿，与人的发育生长是两回事儿。发育生长了，得到真实受用了，去干一种事务，去做一行职业，这是尽其所能，不是利禄之途。走利禄之途的是只望不劳而获，损人以益己。这在从前已经不合，在今日尤其是大愚。教育工作者为了要尽自己的责任，不能不表示不再承袭传统的教育精神。

二、表示教育工作者不再无视是非善恶。从前人家聘请

来教子弟的教师叫"西席",西席在馆东家里处于宾客的地位,自然,不便过问馆东家里的事。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可不是什么人家的西席,而是以国民的身份,对国家尽一份责任,担一份工作。就其国民的身份而言,对于一切事情的是非善恶自该下个判断,立个主张。若说教育工作者是超然的,除了教育而外没有什么判断和主张,那是不通的。生在这个地球之上,就没法超然于这个地球,生在这个国家之内,就没法超然于这个国家;对于一切事情没有判断和主张,只是委心顺运的活下去,岂不跟圈栏里的牛羊相去无几?若说教育工作者处于宾客的地位,有什么判断和主张也不便宣布,那也不妥。非宾客而自以为宾客,不妥。抛却了国民的身份,不妥。畏首畏尾,抹杀立场,不妥。教育工作者教的固然不过某学科某课程,但是某学科某课程之外还有"身教",而身教的凭借,最重要的是明是非,辨善恶。多数的教育工作者能够明是非,辨善恶,身教的影响所及,世间还有不明的是非,不辨的善恶吗?在今日以前,老实说,教育工作者未免"西席"化了,这对于教育工作者自身诚然是欠缺,因而不能尽教育的责任,尤其是严重的过失。所以要立刻改变过来,从今以后,教育工作者要明是非,辨善恶,有见必言,有言必践,即以此立身,同时也以此为教。

三、表示教育工作者只对人民服务。换句话说,不对某些个人或者某些个集团服务。人民不是个抽象的名词,是姓张的,姓李的,种田的,作工的,许许多多人的总称。这些人休戚相望,利害与共,教育工作者就杂厕在其中,教育工作者也是人民。教育工作者所以愿意费心劳力,做工作,尽

责任，为的希望大家发育成长，不断的趋向美善，尽量的享受幸福。这其间，为人也为己，为己也为人，实在分不开来。惟其分不开来，教育对于教育工作者才是一种有意义的值得去干的事业，好比在自己参加的合作社里担一份职务一样。可是在过去，乃至在现在，教育工作者都有点儿像“老板店”里的伙计，吃老板的饭，为老板服务，主意是老板的，得来的利益也是老板的。教育工作者成了伙计，就只能吹吹打打，滥作商业宣传，说本店的货色顶好，或者一无表示，唯唯诺诺，老板存着些霉烂货色，也昧着良心搬出去卖给主顾；这样，为老板服务是到家了，教育的意义可完全失掉了。教育工作者如果认清自己是干教育的，就决不愿意当什么伙计；惟有在为人也为己、为己也为人的出发点上，才愿意干他们的真正的教育工作。

四、表示教育工作者的终极目标是“为万世开太平”。说万世，多么久远；说太平，多么艰难。但是生而为人，就不能不站在人的地位着想；天文学的观点和生物学的观点固然可以有，然而在作这些观察的时候，已经离开了人的地位了。站在人的地位，就得作这样想：即使太平不能立致，甚至距离很远，可不能不开其端，立其基。否则一直乱糟糟的，战争，饥饿，贫穷，疾病，侵凌，压迫，人将何以为人？开其端，立其基，在乎一点一滴的实干，尤其在乎多数人一点一滴的实干。教育工作者干的是教育，这件事的本身就是那所谓一点一滴；同时他们辅导下一辈人发育生长，也无非要使下一辈人有他们的一点一滴。记不清什么人有一首诗，题目叫《愿无尽》，借他的诗题来说，太平之境无尽，教育工作者

之愿也无尽。

我国的教育工作者有切需发表一篇《精神独立宣言》，包含以上几点意见的吗？我愿执鞭而从之。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作

原题无“工作”二字

济之先生逝世

我与济之先生相识很久，可是会面的机会不多，会面也没有深谈，只觉得他是个纯朴的人，从面貌，体态，握一回手，说一句话上，全表现出他的纯朴。我有时想，这么一个纯朴的人当外交官是不是相宜？照通常的见解，外交官的外表总该圆通伶俐，骨子里却是城府很深的。济之先生似乎全不对。

去年冬间他往东北，听说他不怎么愿意去，他只望能够安定下来，翻译他所心爱的俄国文学。可是，不愿意去还是去了，翻译的笔只好仍旧搁起。为了生活，许多人放下了愿意干的能够干的事不干，却去干些不相干的事，这是人才的浪费，也是公众的损失。单凭这一点，社会制度就有彻底改革的必要了。但是在人人救死不遑求生不得的今天，哪里谈得到？

虽说济之先生不能专心做他愿意做的工作，二十几年间，他翻译的俄国文学也着实不少了。戈宝权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字刊载在《文汇报》，统计济之先生在这方面的成绩，关心的人可以取来参看。就我国的新文学说，特别与俄国文学有缘。俄国文学的精神是一贯的"为人生"，大略区分起来，一方面反抗罪恶，一方面追求光明。我国新文学运动开头的时候，与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相配合，在声气应求的情形之下，特

别亲近俄国文学。二十几年来，就作者说，就作品说，固然并非纯然一致，可是隐隐有一条巨大的主流在那里，就是“为人生”。如果说这是承袭俄国文学的精神，当然不妥当，我国的文学为什么要承袭别国的文学精神呢？大概是我国的现实情况与当时的俄国相类似，故而表现在文学方面，与俄国文学同其趋向。俄国文学传衍到现在的苏联文学，精神还是不变，原来已经根深柢固了。我国的文学传衍下去，精神该也不会变吧，二十几年的根柢也不算浅了。可惜的是济之先生已经逝世，再不能翻译俄国文学跟苏联文学供我们观摩。我们只有期望精通俄国文学跟苏联文学的朋友，如曹靖华先生，戈宝权先生，比以往更加努力了。

说到死，确是一桩寂寞的事。在不相信宗教的人，那种寂寞之感是没法解除的，不过程度上有深浅而已。然而这只就活人想到死而言。在死者，脑子里的血管破裂了，生命就此完结，整个躯体将渐渐化为泥土，那是无所谓寂寞不寂寞的。至于悲哀伤感云云也全是活人的事。死者有什么悲哀伤感呢？他早已跳出了自然赋与人类的思想感情的范式了。人家在追悼词里往往说，“我们纪念谁某，应该怎样怎样。”这还是活人策励自己，与死者全不相干。言语当然好听，可是听得多了，不免嫌它公式化。那天我看报，突然看见济之先生的死讯，同时涌上心头的就只是那种寂寞之感。可是，在追悼会上，济之先生的令妹带着哭声致谢，到末了儿至于说不成话，这时刻我突然感到心酸，衔着嘴唇低下头来了。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作

原题为《零星的说些》

文艺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一个样

在《文汇报》的《新教育》周刊的第一期，我写过一篇《如果教育工作者发表〈精神独立宣言〉》。《精神独立宣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罗曼罗兰、巴比塞、罗素等人发表的。在那篇宣言中，他们表明他们的态度，消极方面，不再受野心家的利用；积极方面，要为自己所抱的正义和所奉的理想坚决努力。我以为世局发展到目前，岂止象罗曼罗兰、巴比塞、罗素等所谓文化界人士，大概各国各民族大多数的人都在想彼此联合起来，发表一篇《精神独立宣言》。如果缩小范围，人限于我国，工作部门限于教育，那么我国的教育工作者也切需来这么一篇。篇中至少包含以下几点意思：一、表示教育工作者不再承袭我国传统的教育精神；二、表示教育工作者不再无视是非善恶；三、表示教育工作者只对人民服务；四，表示教育工作者的终极目标是"为万世开太平"。

为什么把一篇旧文字的大要写在这儿？因为文艺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一个样，也切需来一篇《精神独立宣言》，宣言之中也至少要包含我那篇文字里说的几点，只须把"教育"一律改为"文艺"就成了。

要是问我国传统的文艺精神是什么，回答是：代圣贤立言——实际上是为特权者立言。特权者借用了圣贤的名

义，圣贤也脱不了特权者的帮手的地位，于是表现在文艺上，正面是歌功颂德，反面是谏诤讽喻，总之一切为特权者着想；即使表面上为人民着想，骨子里也是为了特权者的利益，才为人民着想。现在据说是“人民的世纪”——一般的看法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要讲“人民的世纪”，就无所谓特权者，有特权者在，人民或多或少要吃亏，作不了世纪的主人；必须没有什么特权者，才可能真正实现“人民的世纪”。怎样做到没有什么特权者，是人民的事；怎样不再为特权者立言，是文艺工作者的事。世人喜欢说“因”，说一切蜕变都有来由，世界上没有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个看法当然没有错，人民历代受欺压，到如今世界缩小了，阅历增多了，实际生活又鞭策着人民非作主人不可：这正是最重要的“因”。既然有了“因”，势不能不变；文艺工作者还能承袭传统精神而不变吗？决无此理。

就消极方面说，决不为特权者立言；就积极方面说，就是第三点，只对人民服务。我在那篇谈教育的文字里说的一段话，抄在这儿正合适，只须把“教育”的字样看成“文艺”就可以了。那篇文字里说：“人民不是个抽象的名词，是姓张的，姓李的，种田的，做工的，许许多多人的总称。这些人休戚相关，利害与共；教育工作者也就杂厕在其中，教育工作者也是人民。教育工作者所以愿意费心尽力，做工作，尽责任，为的是希望大家发育成长，不断的趋向美善，尽量的享受幸福。这其间为人也为己，为己也为人，实在分不开来。惟其分不开来，教育对于教育工作者才是一种有意义的值得去干的事业，好比在自己参加的合作社里担任一份职务一样。可是，在过去，乃至在现在，教育工作者都像‘老板店’里的伙

计那样；伙计，吃老板的饭，为老板服务，生意是老板的，得来的利益也是老板的。教育工作者成了伙计，就只能吹吹打打，滥做商业宣传，说本店的货色顶好，或者一无表示，唯唯诺诺，老板存着些霉烂货色，也昧着良心搬出来卖给主顾：这样，为老板服务是到家了，教育的意义可完全丧失了。教育工作者如果认清自己是教育工作者，就决不愿意当什么伙计，惟有在为人也为己，为己也为人的出发点上，才愿意干他们的真正的教育工作。”至于服务，也许有人要说文艺无论研究或创作，只在自抒其思想灵感，并不是为什么人服务。其实思想灵感尽不妨藏在心里；你把思想灵感说出来或写出来，必然希望他人听你的，看你的，这在他人就可以判断你为什么人服务。再进一步说，即使你把思想灵感藏在心里，不说也不写，可是你的思想灵感已经存在，存在必然有个方式，客观上还是免不了为什么人服务。服务并不是坏事，不必避免，惟在得其当而已。什么工作部门都如此，文艺自然不是例外。

现在说到第二点。这一点很简单，最重要的是真实做到“不再无视”四个字。不能笃行“是”，就是不能排斥“非”；不能笃行“善”，就是不能排斥“恶”。明是非，辨善恶，原来不仅是知识方面的事；如果不在实践方面表现出来，“明”与“辨”就是空的。假如说超乎是非善恶之外，或者徘徊于是非善恶之间，那只是欺人之谈；实际上还是由于笃行没有力量，排斥没有勇气。必须锻炼力量，培植勇气，才可以真实做到“不再无视”四个字。至于是非善恶之辨，也许有人以为很难有个准绳，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实准绳是有的，而且大家都能同意，除了野心家与特权者。那就是：有利于人民的，是是，

是善；不利于人民的，是非，是恶。举例来说，民主是是，是善；独裁是非，是恶；建设为谋大家的福利是是，是善；聚敛以饱私人的囊橐是非，是恶。这不是与黑和白同样清楚吗？

再就第四点来说。“为万世开太平”是张横渠的话，他这句话给人生境界展开了光明的前途。可是他究竟为时代所限，说来不免带着些玄学的意味。现在我们袭用他的话却是现实意义的，绝不带玄学的意味。试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令人怀念不已的罗斯福早已提出了“四大自由”，各国进步人士正在竭力争取集体安全全面和平，殖民地以及类乎殖民地的人民不惜以血以肉，发动解放运动，这些是为的什么？一句话，无非要“为万世开太平”。人所属的种族国家固然不同，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固然不会完全一致，然而“为万世开太平”却是现代人共同的目标，也是终极的目标。从前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只是一句运用修辞方法的话语，现在我们可实实在在进了“天下一家”的时代。如果不“为万世开太平”，这个世界怎么住得下去？所谓现实意义就在此。

也许有人说，你这几点只是立身处世的事，没有触着什么文艺。我说，是的；不过我以为立身处世该在文艺之前，立身处世好比泉源，文艺是从那泉源流出来的活水。立身处世有个规模，做文艺工作才可以做出些成绩来——当然也会做不出成绩；可是，决没有不讲立身处世而会做出成绩来的。

末了，还是抄用我那篇旧文字的结句，只把“教育”改为“文艺”：文艺工作者有切需发表一篇《精神独立宣言》，包含以上几点意思的吗？我愿执鞭而从之。

一九四七年九月发表　原题无“个”字

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

我不参佛法，对于信佛的人只能同情，对于自己，相信永远是“教宗堪慕信难起”（拙诗《天地》一律之句）的了。也曾听人说过修习净土的道理，随时念佛，临命终时，一心不乱，以便往生净土。话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可是几十年来我一直有个总印象：净土法门教人追求“好好的死”。我自信平凡，还是服膺“未知生，焉知死”的说法。“好好的死”似不妨放慢些，我们就人论人，最要紧的还在追求“好好的活”。修习净土的或者都追求“好好的活”，只是我很少听见说起。

弘一法师临终作偈两首，第二首的后两句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照我的看法，这是描绘他的生活，说明他的生活体验：他入世一场，经历种种，修习种种，到他临命终时，正当“春满”“月圆”的时候。这自然是“好好的死”，但是“好好的死”源于“好好的活”。他临终前又写了“悲欣交集”四字，我以为这个“欣”字该作如下解释：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无论信教不信教，只要是认真生活的人，谁不希望他的生活达到“春满”“月圆”的境界？而弘一法师真的达到这种境界了。他的可敬可佩，照我不参佛法的人说，就在于此。我曾作四言两首颂赞他，就根据这个意思，现在重抄在这儿：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其谢与缺，罔非自然。
至人参化，以入涅槃。
此境胜美，亦质亦玄。

“悲欣交集”，遂与世绝。
悲见有情，欣证禅悦。
一贯真俗，体无差别。
嗟哉法师，不可言说。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作

深　入

五十初度的那一年，曾经写过一篇短短的文字，答谢朋友们的好意。其中说及自己的生活所入不深，瘪瘪的，像泄了气的皮球，所以就为人而言，只能作个常人，就写作而言，只能写些平庸的东西。接下去说，生也有涯，往后希望稍稍深入一些，不然就将白活一场，作不作文，作得好不好，倒在其次。

与深入并肩的是广博。我并不是不希望广博，只因事实限制，要求生活的广博往往不容易办到。不做工，不务农，就没法领会工人农人的生活。不通外国文，就没法直接接触别国人的思想学问等项。若不是对日抗战，恐怕一辈子也不会跑到四川去，更不用说在那里住上八年了。以上只是举例罢了，如果一项一项的说起来，至少也得写三张稿纸。当然，我可以去交接工人农人，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我可以去学习外国文，从字母的认识直到名篇巨著的通体理解；再说游历各地吧，目前交通情况虽然不怎么好，究竟不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总还有办法。可是，身不能分处，心不能分用，而知也无涯，顾了这一头，就不免放松了那一头；比较的广博固然可以努力做到，相当的广博可就难说了。

抛开广博不说，就眼前站定的地位，求其把握得着实一

点，体认得精切一点，该是可以办到的吧。具体的说，就是站在儿子的地位，尽其为儿子；站在丈夫的地位，尽其为丈夫；站在父亲的地位，尽其为父亲；站在公民的地位，尽其为公民；站在教师的地位，尽其为教师；站在编辑员的地位，尽其为编辑员。这岂但是可以办到的，并且是非办到不可的，不然何以为人？何以处于人间？而真正办到的时候，那就是深入了。有人提出"生活三度"的说法，三度是广度，深度，密度。这儿所谓深入，大致与深度和密度相当，也就是深度密度之和。

曾经想过为什么不能深入。恐怕是由于所受的教育，说得更真切些，由于所受的薰染的关系。既然作了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在儒家的空气里呼吸。本相的儒家原是不错的，除了栖栖遑遑希望得君行道，就现代的眼光看来很不足取以外，那说仁说忠恕的部分总是好的。宋朝的理学虽然带着玄学的气息，可是就好的一面说，主敬主诚实在具有真正信教者的态度。清朝的颜李注重实践，专求生活的充实，可说是脚踏实地。可是我们大都把这些东西认作挂在嘴上谈谈的事，放在心里想想的事，却不大措意这些东西谈既没有用，想也不相干，必须把它们像食物一样消化一番，遍布在血肉骨髓里，才是真实的受用。

这种风气从什么时候开始，由什么原因开始，我说不上；总之，谈谈想想是一回事，消化不来受用不着又是一回事，却是事实。此外，从老子方面学会了权变，从庄子方面学会了什么都一样，于是，玩世不恭，马马虎虎，于物无情，冷冷落落。明明各人有个生活，自己与生活原是分拆不开的，

却仿佛那生活是站在路旁的破房子，自己不大乐意走进去似的。这又怎么能够深入呢？直到临命终时，还是说不出生活的真情实况，只好朝着个疑问号闭上眼睛，那也是当然之事了。

洗涤这种薰染大概也不怎么容易。在接触到的人们身上，仿佛都嗅到受了薰染的气味。也常听见自我批判似的话，生活不充实啊，经验不精切啊，似乎确是反省的结论。但是说这些话只是“知”的方面的事，而且是属于消极的，若不改向积极的“行”，反省也是多事。至于把这些话挂在口头随便说说，对于何谓充实何谓精切还是一片朦胧，捉摸不到影像，那更是毫无干系，同于戏言罢了。洗涤薰染得从践履开始。打个比方，薰染给我们的影响，教我们站在岸上学游泳；现在我们要摆脱它的影响，就脱下衣服，一个猛子钻进水里去，钻进生活的水里去。这就是践履。

但愿站在自己的地位，从践履方面着力，以求稍稍深入一些。至于作不作文，作得好不好，倒在其次。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表

《青春的旋律》

最近看了苏联的电影片《青春的旋律》，是去年他们体育节运动大会的记录片。开场的时候，加入苏联的各共和国各民族的男女青年各按单位列队巡行。各队的服装与打扮显示出地方性与民族性，各人的体格那么壮健，脸色那么欢欣，合着激扬的音乐，飘拂的旗帜，组成个雄伟欢乐的行列。随后是各单位表演团体操，最多的大概有五六千人同时登场，一举手，一投足，那么和谐，那么有力，绝非机械的动作。有时候队形变换，一会儿分作若干组，一会儿又汇集拢来，无论分与合，精神、动作总是一致的，表现出在场的这许多人融合成了一个整体。锄头，网球拍，花束，古昔的武器刀与盾，这些东西都成为运动员手里的运动器械，运动的姿势全与这些运动器械相配合，也就是说，无非是生产活动、护卫活动、休闲活动的姿势，决不是呆板的伸手、举足、弯腰、转身的动作。个人竞技减到最少限度，在这部片子里，只看见赛跑、跳栏赛跑、举重比赛几项罢了。

平日不注意锻炼，绝不会有那样壮健的体格。一两个体育家大力士体格壮健值不得称说，难得的是在这部片子里，登场的男女青年没有一个不壮健。

平日不着重教育，不把培植后一代看作顶重要的事项，

绝不会注意锻炼身体，收到锻炼身体的效果。寻常的运动会看得多了，“一，二，三，四”，屈，伸，俯，仰，无非那么一回事，可是在这部片子里，却教人看见了教育——不是教书本教零碎知识的教育，而是以培植后一代为重的身心兼顾的教育。

大可注意的是集体运动那么多，个人竞技那么少。

现代的运动会导源于古代希腊的奥林比亚赛会（会中表演的都是个人竞技），虽说足以鼓励人家注意体育，可不是没有弊病的。一种竞技的练习未必对于全身的发达有益，甚而至于竟会有损。待练成了卓越的技艺，那人就成了明星，可以在群众中夸耀，可是与体育的本旨已经全不相干。在学校或什么团体里，就有多方罗致这种明星的事实（学校里的竞技明星好似封了王的，学行两项都无妨马虎，物质上得到种种优待），为的是夺取锦标，争得名誉，全不为什么体育。而运动会观众对于这种竞技明星，好奇心与痛快感是很强烈的，可没有什么敬爱亲和的意思，即使竞技者跌断了腿膀，撞破了头颅，也不过轻轻地嘘一口气，像在赛马场中看见一匹马受了伤似的。这样看来，运动会中以个人竞技为重，岂仅是一件可笑的事而已。

这个运动大会特别注意集体运动，那才是真正顾到体育，真正期望个个人的体格都很壮健。而事实的表现，那些青年男女的体格确然个个都很壮健。而且，集体运动岂仅在体育方面有效益，在精神方面效益更多。每个人在大队之中操练，必须与其他的人呼吸相通，心心相印，才可以完成一个和谐而有力的节目。在果真能够和谐而有力地表演的时候，每个

人感觉个己扩大了，个己不限于一个躯体之内，共同活动的整个大队就是扩大的个己。其时的兴奋与欢欣还有别的事可以比拟吗？精神上所受的效益还可以用分数度数来衡量吗？试看，那些青年男女的动作绝不呆板拘束，那些青年男女的笑容绝非勉强做作，全是由于深深感到个己扩大了的兴奋与欢欣，才会有这么活泼而天真的表现。一个单位下场了，一个单位又登场了，精力相当，笑容常在，使人觉得仿佛看见了万类欣欣向荣的春天。把这个运动大会比做一首诗，一支曲子，《青春的旋律》这个名称的确是惬当的。

看罢这部影片，心里很不好过。人家的青年如此，我们的青年怎样？不多说了。总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青年也有他们那样的春天。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发表

现　在

世间有这么多的人。假如每一个人，凡想心思，个个心思有道理，凡有行动，件件行动有价值，总加起来，那个总和还得了？一般人爱说的所谓“历史的轮子”不将转得太快，把人搞得昏头搭脑，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同时，所谓“大同之世”，“太平盛世”一会儿涌现了，也未免教人觉着得来容易，太不值钱。而“超人”也不待尼采来标榜，也许几千年前的我们的祖先早已是超人，我们这一代人将是超超超人了。

历史的轮子照例是慢慢的转的，有时简直停止不动，有时还会往后一挫，倒退这么一个半个圆周。其故在于人人想心思，有道理的心思可不多，人人有行动，有价值的行动却很少。我们苏州人说一个人言不及义，有两句道“十句九笃落(笃落即丢掉)，一句没着落”。人人的心思行动都到了九成可“笃落”一成“没着落”的地步，历史的轮子哪得不倒退这么一个半个圆周？

现在的情形似乎并非如此。现在的情形是一部分人糊里糊涂，时时想心思，可没一个心思有道理，时时有行动，可没一件行动有价值；一部分人却清楚明白，想什么心思，有什么行动，总为要自己与大家都好，而且要越来越好，简括说一句，就是“为万世开太平”。两部分人的消长决定世界的

前途。前一部分人会自动的觉醒吗？他们同样是人，照理说应该会。他们会被动转化吗？一旦事势所趋，照理说应该会。后一部分人会尽量的加多吗？德不孤，必有邻，照理说应该会。他们会被动的消灭吗？人之欲善，谁不如我，照理说应该不会。从这其间可以看见前途的希望。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作

新 年 致 辞

去年《中学生》的新年号里，我说了我们希望“为万世开太平”。这不是个迂远的想头。谁忠实于生活，热爱着人类，谁就会抱着这个希望，而且努力实现这个希望。

一年的时间太短了，计算日子只有三百六十五天；而太平这个希望太远了，人人能得安居乐业也不过靠近了太平的边缘，还得往前走许多路程才达到真正的太平。所以过了一年就要问希望有没有实现，未免太性急了，实际上决不会那么快。可是问还是可以问，而且应该问。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大家的方向是不是没有认错？与太平的边缘是不是缩短了若干距离？如果回答是正面的，那就是大家争气，一年的日子没有白过，一年一年继续下去，希望总有实现的一天。回答如果是负面的，那就得特别惕励，白过了一年多么可惜，大家不争气尤其要不得，如果年年如此，即使继续一万年也实现不了那希望，岂不是糟透了？

留心一年来的世事，恐怕谁都有这么个直觉：什么“为万世开太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换句话说，回答是负面的。失望转成为颓唐，幻灭引起了悲观，原是心理方面最滑熟的路子。于是时时听见叹息的声音，看见皱起的眉头。

但是，回答果真是负面的吗？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将见

一部分人很是争气，一部分人太不争气，虽不是大家争气，可也不是大家不争气。那又何必叹息皱眉呢？很是争气的一部分人不是可以尽量加多吗？无论是谁，不是都可以参加到那部分里头去吗？太不争气的一部分人不是可以尽量减少吗？无论是谁，只要生活走入常规，思想趋向正路，不是都可以从那部分里头退出来吗？一边递加，加到极大限度，一边递减，减到等于零，岂不就成为大家争气，大家“为万世开太平”努力了吗？这不是个空想。人类必须共同生活，人类有追求完美的愿望，现实与愿望交织在一起，终于要走上一边递加一边递减的道路的。那又何必叹息皱眉呢？

很是争气的是谁呢？凡是争自由争平等的人都是很是争气的。他们不仅为自己争，也为人人争。人人享有自由与平等，太平的门不就打开了吗？试把第二次大战以后与第一次大战以后相比，争自由争平等的人多起来了，显然可以看出递加的趋势。有这一个真凭实据在，我们更没有叹息皱眉的理由。

有一点倒是要问的：我们自己是不是在递加的那个数目里头？如果在里头，我们就不是空抱着“为万世开太平”的希望，而是真的尽了一分力量。否则太平虽然迟早要实现，可是总会因为缺少了我们的一分力量而延后若干时期，这怎么对得起自己？又怎么对得起人人？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发表

夏丏尊先生

夏丏尊先生去世两周年了。编者屡次叮嘱我写些文字谈及他，用来贡献给《创世》的读者。传状人物不容易，传状知交尤其难。夏先生去世以后，我除了写过几句悼语以外没有写旁的文字，就是为此。现在却不过编者的厚意，勉强写一些，实在说不上传状，不过记下夏先生生平的一鳞一爪罢了。

夏先生名铸，字勉旃。改勉旃为丏尊，为避免当选的麻烦。那时浙江省有许多人想举他做省议员；他以为当那种省议员毫无意义，就在选民册上把“勉旃”改为声音相近的“丏尊”。这么一来，写选举票的都把“丏”字写成“丐”字，投他的票就全成为废票了。知道了他名字的来历，就可以明了他的为人。他始终无意于政治，生平没加入过政团或政党，只把教育认作他的终身事业。

他是浙江上虞人。祖上都是经商的，可以称得素封之家。到他祖父故世以后，家道渐渐中落。他从小就聪明，八股文做得很好，十六岁上做了县学生员，通常叫做秀才。那时正是变法维新的当儿，他知道做八股文没有出息，第二年就进了新式学校。后来又想到日本去留学，家里不能供给他费用，他只得向亲戚借了钱出去，到日本学的染织工业。不到两年，

借来的钱用完了，只得停学回国。那时浙江两级师范请了日本教师，需要翻译人员，夏先生已经精通日语，就入校当翻译。这两级师范后来就改为浙江第一师范。他见到学生的国文程度不能有多大进步，以为这是国文教师不行之故，就自告奋勇，愿意充任国文教师。果然，一班学生经他指导，国文程度相当的提高了。他鼓励学生写作，向报纸杂志投稿，被发表的很多，学生的写作兴趣更加浓厚了。他又提倡思想自由，劝学生多看新书，不要死捧着几本课本了事。五四运动前后推动新思潮的，北方推北京大学，南方就数浙江一师。夏先生和刘大白、李次九、陈望道三位先生被称为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因为这样，就引起了许多守旧分子的妒忌和反对。适逢一师的学生施存统（即施复亮先生）作了一篇《非孝论》，那些守旧分子就抓到了把柄，说一师学生思想过激到这般地步，都该由教师和校长负责。“四大金刚”和校长经子渊先生终于都离开了一师。

上虞有位富翁陈春兰先生，他私人捐资创办一所春晖小学，后来又扩充为中学，在上虞乡间白马湖地方新建校舍，罗致名师，规模相当宏大。那时就聘经先生当校长，聘夏先生为教师。夏先生觉得白马湖有山有水，清静空旷，环境很好，就在学校近旁造了一所平屋，想终老是乡。他还有一种想法，要把春晖办成全国的模范中学，招集多数学者，一面教育青年，一面研究学问，从事著作；每个教师的教授时间定得很少，薪水数目定得很低，用著作的稿费和版税作为生活费的补助。欣羡他这种理想的人一时很不少，因此大家都知道春晖中学是浙江的优良学校。后来因为经先生兴趣转变，

从事政治活动，和他的意见不合。这就使他离开了春晖。

离开了春晖，他想自己办学校，自己办的学校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与同志匡互生、刘薰宇、周为群几位先生就在上海办起了立达学园。所有教职员全是同志，一致抱着献身教育的志愿。各人把能做的事尽力的做，把能教的课尽量的教，无所谓薪水，每人每月只取零用费二十块钱。为什么不称学校而称学园呢？他们的办法的确与他校不同，他们不管通常的学校规则，只重在启发思想，陶冶情感。学生譬如花木，学园就是他们的自由园地。学园最初租的市房，不久，他们尽力设法，在上海近郊江湾租了一块地，建筑起校舍来。后来又在南翔设置了一个农场，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以后，就全部被毁了。

立达当时一班同志都是穷朋友，二十块钱的零用是不够生活的，所以须在他校兼课，夜间还要写文稿，靠稿费作补贴。这是辛苦异常的生活，然而他们并不觉得辛苦，见到学生越来越多，学园越来越发达，个个都兴高采烈。

夏先生担任的是暨南大学的文学院长，又任开明书店《一般》杂志的编辑。他一个人住在上海，每天跑江湾，跑真茹（暨南大学），还要写杂志文稿，没有一刻的空闲。后来开明书店改为公司组织，他担任书店的编辑所长。这时他创办了《中学生杂志》。他认为一般中学都办得不得其法，学生太吃亏了，想凭这个杂志给他们一点真正的教育。他的大旨见于他的《受教育与受教材》一篇文字中。学生在一般中学里，至多受到了某种学科的教材，但是受教材并不等于受教育，受教育的范围宽广多了。必须食而能化，举一反三，知识能力从

而长进，思想情感从而发皇，才是真正的受教育。但是一般中学没有给学生享受这种福利。他为了弥补这种缺憾，花了不少的心血编辑《中学生杂志》。每期都是自己拟定了题目，特约相当的人写文稿，务使面面顾到，决不随便凑数，让杂志真成了“杂”志。他又修改投稿者的文稿，回各地读者的信。他总是站在投书人的地位，设身处地的替他们商量事情，解决疑难，态度是诚恳的，友谊的，从不板起面孔，说些照例的教训的话。

八一三战事发生以后，开明同人大部分流迁到内地，在后方继续努力。夏先生一向怕出门，又加年老多病，不能离开上海。他就编写他的字典，同时在南屏女子中学担任国文教师。曾经被日本宪兵部抓去过一回，和章锡琛先生同难，关了十天才放出来。

我回到上海是三十五年二月初，赶紧跑去看他，他卧病不出门已有两月了。他精神很颓唐，满腔郁愤，但是并不为了自己的什么事。最难忘的是他临终前一天向我说的那一句话，也就是我所听到的他的最后一句话——“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这句话抵得一篇悲天悯人的大文章。不应得到胜利的“胜利”了，应该得到胜利的“惨败”了，这是他临终抱恨的。但是，世界正在转变，应该得到胜利的总有胜利的一天，而且为期不会太远。到那时候，我们定须假定夏先生“灵而有知”，高高兴兴的告诉他一声。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发表

夏丏尊先生墓记

夏先生名铸，字勉旃，又字丏尊，以丏尊行。上虞崧厦人，生于丙戌五月十四日，考之阳历，实为民国前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其生平行谊，见于马夷初先生所为铭词，以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卒。夫人氏金，长于先生四岁，生子三女二。长子采文三十七岁而卒，妇金秋云。次子龙文，妇韩玉严。三子早殇。孙弘宁弘奕，孙女弘琰，俱采文出。弘宁娶王洁，生曾孙光淳。孙弘正，孙女弘福，俱龙文出。长女吉子，二十二岁而卒。次女满子，适吾子至善。先生殁后二十日火化，是年十一月葬骨灰于兹丘，越一年有六月，立表志为圹。吴县叶绍钧撰记并书。

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作

给司徒雷登的公开信

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发表狂妄而带有威吓性的对于我国各地学生“反对美国对日政策运动”的书面声明，上海若干杂志给他这封公开信。

司徒雷登大使：

读了六月四日你发表的声明，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你是美国驻在我国的大使，我国人民是跟美国人民处于平等地位的人民，可是你向我国说了那样一番话。如果你反省一下，一定会发觉你的话不但在礼貌上有问题，在认识和意图上问题更多。就为这一点，我们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起了强烈的反感。

你说美国没有扶助日本恢复它的军事和经济的侵略势力的意图，我们不知道你是真的不甚了了，还是真人面前说假话。这几天里头，我们有许多朋友答覆你那篇声明，列举了种种事实——美国扶助日本恢复它的军事和经济的侵略势力的事实。那些事实不假，你的话就不能叫人相信。

你虽然住在我国很久，可是就那篇声明看，你实在不怎么了解我国人民。我国人民的人生观，世界观，所爱和所憎，跟任何国家爱好自由的人民没有两样。我国人民愿意跟

别国人民友好，情谊胜过弟兄，可不愿意让别国的特殊势力踩在脚底下，喘着气当奴隶。只有这么两句话，简单得很。你如果理会这两句话，你就了解我国人民了。美国的当局如果理会这两句话，他们就会发见合理的“对华政策”了。

与杨卫玉、周予同、王伯祥等诸位先生一同署名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发表

重题“书巢”记

伯翁藏书有巢，读书有巢，余前已记之。今兹重为整治，复命题额。老友好之，何说可辞。夫天下之书众矣，废寝食读之，犹不能尽其百一。而以有涯逐无涯，多读百十种奚益，少读百十种奚损？余方以是将废书不观，冀免牵缠，而为翁书是额，虽未敢笑其老而好事，亦复兴不同如面之叹矣。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

佩弦的死讯

本月十日接到北平航空信，清华大学的信封，署个“朱”字，笔迹不是佩弦的，我心中就有了预感。拆开来一看，果然不是佩弦的信，是他的儿子乔森写的。说他爸爸在六日早上四点钟突然胃部剧痛，十点钟在北大医院已经不能动弹。下午两点在医院开刀，经过情形还好，可是三四天间是危险期。又说与我合编的国文教本最近大概不能编了，请我原谅。我就发个电报给北平的一位朋友，请他代往医院探望，并将所见电告。十一日《大公报》有一条电讯，说开割历五小时之久，又有肾脏炎的毛病，情形很严重。十二日下午，北平的朋友来了回电，说是未脱危险。看《新民晚报》，登载着一条电讯也说严重。到今天早上，预料而又怕看的一条消息果然在报上刊出了，佩弦已于昨日上午十一时后去世。

佩弦的胃病是老病，我说不大准确，拖了十五年左右。他的病时发时止，最近七八年间发得较频繁，而且每发必凶。实在是十二指肠溃疡，这是早已知道了的。有人劝他开割，他也想去开割，但是听医生说不开割也可以，就拖下来了。近两月间又发了几次，曾经写信来说拟停止合编教本的工作。我劝他且从事休养，编书的事将来再说。后来他身体似见好转，很高兴的写信来说愿意继续合作。不料就在二十天之后他去

世了，使我再没有与他合作的机会了。

他在昆明的几年太苦了。兼课，饮食不好，每天跑很远的路。暑假中回到成都算是舒服些。然而他责任心重，不肯请假，赶在开学以前就急急忙忙动身回校。回到北平以后也从未闲过，教课之馀，写文字，编刊物，编《闻一多全集》，只有病发时候才躺下来。如果他能有好好的休养，如果他早几年开割，到今天也许还是健康精壮的人。事务跟经济限制了他，使他不能好好的休养，使他直到体力消耗将尽的时候才去开割，于是他只能享有五十一岁的生命。

佩弦是个好人，凡是认识他跟他有交谊的人都承认。他可不是“烂好人”，不是无可无不可，随俗依违的那一流。只要看他几年来对于一些看不顺眼的大事都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知道。他这样做，我确切的知道，不是讨好什么人，不存什么企图，只是行其心之所安。目前由于多所顾虑，有所见到而不愿宣露出来的人似乎很多，这就是不能行其心之所安，结果弄到经常的不安。经常的不安才有所谓“烦闷彷徨”，随时行其心之所安，又有什么“烦闷彷徨”呢？

他近年来很有顾影亟亟的心情，在几次来信中曾经提到。我想他未必如屈原所说的“恐修名之不立”（如果把“名”字作通常的“名誉”讲），却是恐怕自己的成绩太少，对于人群的贡献太不够的缘故。加上他的病，自己心中有数，就只盼望成绩多一点儿好一点儿，能够工作就尽量工作。他实践他的意愿，不停的工作，直到本月六日最后一次发病为止。

我想人生不可解而可解，不可究诘而可究诘。离开了人的观点，或从天文学的观点，或从生物学的观点，人生只是

宇宙大化中的一粒微尘而已。但是取了人的观点，就有了个范围，定了个趋向。既讲人，不能不求其进步，不能不求其好——物质方面跟精神方面都好，而且必须大家好，不能单让一部分人好，其他的人不好。这就产生了为大众服务，努力将自己的成绩贡献于大众的想头。个人的名利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呢？惟有实实在在的成绩足以贡献给大众，在大众的海洋里加增一点一滴的，才是生命的真意义，才算没有虚度短短的几十年的寿命。我虽然没有跟佩弦谈过这一套近乎玄虚的话，可是我确知他带着病辛辛苦苦的工作着，是含有这个意思的。我说的也许太浅薄，但是决不会牛头不对马嘴。

现在时髦的词儿中有一个叫“学习”。我想佩弦是时时在那里学习的，他对什么都虚心的问，都细心的研究，对方不论是谁，告诉他他都认认真真的听。举新诗研究为例。他是早期的新诗作者。新诗在二十几年间变得很多，大部分早期作者都掉头不顾了。独有佩弦，他一直留意新诗的发展，探询各方面的意见，揣摩各方面的意见，揣摩各种派别的作品，而且写了不少解析和介绍的文字。有一些一般人不认为诗的诗，他很平心的承认这也是诗，不过不是某些传统里所认为诗的诗。他肯定的说新诗有前途，那前途在于现代人有了新的生活。

说起生活，他也是经常在学习的。本月五日出版的《中建》北平版有《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记录，他老老实实地说：“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我的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来。”这其间绝无虚矫之

气，却表明他愿意接受学生的“教育”，将习惯慢慢地变过来。向学生受教育，在权威主义的先生们看来是岂有此理的事。可是我确切相信，在生活实践方面，现代的青年实在比中年人老年人进步了不少（糊里糊涂的青年人当然不在此例）。中年人老年人要自己好，就得向青年人学习。

写实在写不出什么，平时的友情，今天的悲感，化为几句话都只是迹象而已，这有什么意义？编辑先生要我当天交稿，只能杂乱的写一些，不能表现出佩弦的若干分之一，很对不起他。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作

谈佩弦的一首诗

《文讯》编者郑重嘱托，要我写一篇纪念佩弦的文字。空泛的哀悼话没有多大意思，写些平日的交情也没有宣布给公众的必要。因而决定这篇里只谈佩弦的一首诗，这首诗可以见出他近年来的心境的一方面。我想凡是他的朋友必然极愿意知道，就是不认识他的人大概也要看。

先抄诗题:《夜不成寐，忆业雅〈老境〉一文，感而有作》。这位业雅先生是谁，我不知道，他的《老境》一文也没见过。这没有关系，佩弦的诗是写他自己的心境，业雅先生的文字不过引起他作诗的动机罢了。以下是他的诗：

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
衰病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
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
笔妙启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强(君湖南人)。

他抄给我看在今年三月间，写的时期大概是去年冬天，不能确切知道。

人到中年，经历多了，涉世深了，不免有种种烦怨愤慨。其人如果是有旧教养的读书人，就自然而然想到谢安“中年以

来伤于哀乐”的话。这个话虽然“哀乐”对举，过分的快乐虽然也足以破坏身心的均衡，究竟偏于“哀”的方面居多。现代我国人的哀伤确然太多了，少年人青年人也早熟，知识年龄超过了实际年龄，时时感觉有种种可哀处，更何况中年人？若把现在的时代跟谢安的时代相比，现代人“伤哀乐”真是太容易了，太寻常了，除了木然无动的痴呆家伙而外，谁没有一段哀伤？固然，徒然哀伤济不得什么事。但是哀伤可以化为火种，如果连火种也没有，岂不是火的踪影将杳无消息了吗？

再说第二句，这个心境我自以为能够了解。人当涉世之初，求名求利，物质方面要安适，精神方面要舒快，这些都是人情之常，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人生是短促的，人生又不能撇开他人只顾个己，在他人颠连困苦救死不遑的当儿，个己却要死拖活拉的在短短的生命中争这么一点儿，算什么呢？这种想头在少年人青年人未必就有，在四十五十而又把人生认作一回事的人可很容易有，于是来了“何当计短长”的观念。苦一点儿，委屈一点儿，没世无闻，草木同腐，都无所谓，这就是所谓不计短长。可是，这些全属于个己方面。如果是公众方面的也包含个己方面的事儿，就决不容不计短长，因为这不以个己的生命为限，个己的生命虽然有与世违离的一天，社会的生命可永远延续下去。至少佩弦是这么想的。他的诗中并没有表明这层意思，他的行为却表明了。今年六月间，他与张奚若吴晗两位先生共同发表一则声明道：

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

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企图之一切舍施物资，无论为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麦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试想买一点平价麦粉，在一味无所谓的人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可是他非计较不可，甚至发表了声明。再说他历年来苦苦用心研究文学，把心得写下来，到死方休，若在玩世不恭的人，这又何必呢？多一点儿成绩跟少一点儿成绩还不是一个样？佩弦却不然，可知他在这方面并非不计短长的，他热切的希望他的"长"在文化的大海里增加这么一点一滴。

第三句足见他心慈极了。"儿辈觉"了不免愁烦，因而阻碍了他们的进取。惟恐阻碍他们的进取，对于自己的衰病就得时时设"防"，何等的深情蜜爱啊！第四句好似责备，其实是深爱之。看他们天真烂漫，好像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有什么心事似的，其中自有一段可喜处。实则他们的爸爸的心事多着呢。佩弦来信，曾经提起须得加紧努力，弄出一点儿成绩来。虽然没有连带提及他的身体，我想他该预知他拖着那样的病，是不会享大年的。他又忙于教课，编辑，吸收人家的经验，答覆他人的请教，一句话，除了病倒，他不得空儿。他把这些用"我生忙"三个字包括了。而这也就是"衰病"的来由。

第五句显然从"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来。夫妻之间有这种体会，我想至早得在中年。年轻夫妻你欢我爱，似乎异常之热，但是深味比较差。到得中年老年，共同生活愈久，相需相成的体验愈深，于是觉得必须两个生命合起来才是完成的整个儿。可是耳鬓厮磨的情趣消退了，相对坐在一块儿，平静的彼此一笑，就好像占有了一切。这就是所谓"淡如水"。这

一句与其认为感慨，不如说他写出了真切的境界。第六句可真是感慨了。一个个消息传来，倒下来的倒下来了，人孰无情，谁能遣此？若把宇宙跟人生一起考察，万物跟人同在息息不停的变化之中，在无始无终的时间里，刻刻展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同时并存的算是有缘。存了又毁的就永不再来，太空中毁灭了的星球如此，其他人和物无不如此。用超乎人的观点来看，这是自然，无所用其感慨。但人总是人，既曾见过那颗星的光，与它有过缘，见它毁灭怎能不怅然若失？说某某精神不死其实只是活着的人自慰的话，望他往生极乐国土，盼他还有个来生，也只是抱着宗教信仰的人的想头，而那颗星，那道光，却永不再来了。少年人青年人也许不大理会得，我们五十以上的人一回一回的送死者，参加追悼会，写追念文字，那种心情是在悲哀以上的，实在描摹不来。

末了两句只是关合诗题的话，不必细说。

他信中说这首诗给平伯看过，平伯以为前四句诗意已尽，他又附加说，“然五六亦所深感”。可见前面六句都是他所深感的，这首诗决非信笔写来的游戏文字。

他的旧体诗不多发表，只给朋友看看。旧体诗跟新诗是两回事，形式限制着内容，内容适应着形式，一作旧体诗，精神情思自然跟古人相近，跟现代人较远。跟古人相近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相近也由于平昔的教养，可是在生活实践方面愿意努力做个现代人，尤其切望青年人个个都做现代人，以我猜想，这或许是他不多发表旧体诗的原由。但是我把他的这一首诗在他死后发表了，我的擅专没法求得他的原谅，怅恨无已。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八日作

在朱自清先生追悼会上的致辞

前两年文协为闻一多先生在这儿开追悼会；过了两年多几天，咱们又在这儿追悼朱自清先生了。朱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对于中国文学极有贡献。因为他们两位对于文学贡献大，所以咱们要永远追念他们。

我常想，追悼会与死者是完全不相干的。未死的人因为死了一位忘不了的朋友，心里难过，要解除，发泄，开一个追悼会抒发哀感；死者已经无知无识了，实际上对死者毫无关系了。一个人，生的机会只有一次，死者已经将这机会放手，咱们未死的人无法把他追回来了。咱们与死者生时能聚在一起，可说是有缘，今天开追悼会，无非聚友追念之意。追悼不同于祭祀，却不外乎孔子所说的两个字："如在"。咱们今天开追悼会，正是用"如在"的心情来追念死者。

我现在不说颓丧伤感的话。记得一位朋友来信，有两句话可以说给未死者听听："倒下去的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没有倒下去的，应该赶紧做一点事。"愿咱们大家保持这种心情，实做下去。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日

从辛亥革命看建国

辛亥革命的时候，大家对于革命的想法非常简单，也非常含糊，用目前流行的说法，未免太天真了。只要把满清推翻，挂起民国的招牌来，革命大业就算完成。这岂不是简单不过的事儿？然而命为什么要革，革与不革在一般人生活上有个什么分别，当时好像都不大考究，就是考究也只得到些笼统的意念。我说非常含糊就为这一层。

在一阵简单与含糊的想头之下，满清推翻了，民国的招牌挂起来了。可是实际上没有多大变更，除了名义上没有了叫做皇帝的人——袁世凯想做皇帝也没有做成。

革命原是要变更，可是实际上没有多大变更，这其间值得考索，为什么变更不来呢？好的事物何必要它的变更，要它变更必然因为它不好，这其间又值得考索，为什么要革命呢？这样层层剥蕉，才究明革命的目标原来非常明白，人人易晓，就是要大家生活得好。“大家生活得好”，写起来只有六个字，可是得郑重指出：这里所谓“大家”，包括血肉之躯的所有的人，不是指少数人或某一阶层某一集团的人；这里所谓“生活得好”，包括物质跟精神两方面而言；好又不是终极的好，只是比较的渐进的好，昨天吃不饱，今天吃得饱，就是好。去年受人欺侮没法开口，今年受人欺侮可以当众论理，就

是好。这个目标真所谓卑之无甚高论，可是不能实现，原来有两重障碍在那里，在内是封建势力，在外是帝国主义；代表那势力那主义的人物都不要大家生活得好，他们不会看透，不会想通，坚决认为大家生活好了，他们的生活就要不好。

得到上面所说的这一点儿了解也需二三十年。这一点儿了解与其说从书本上读来，从某人处听来，还不如说各人从生活经验中体验得来。种种不平的现象，种种叫许多人受苦受难的事，千头万绪，千变万化，原来全是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两个抽象名词的形象化。见得愈多，认识得愈真切，几乎毫发无遗。革命要革出个究竟来，非去掉这两个东西不可。这两个东西还在，大家就不会生活得好。

从前的改朝换代当然并非革命，政权从甲集团转到乙集团手上也不是革命。革命免不了兴师动众，需要流血（这只是革命开头的手段，流了血不就等于革了命），可是也有人非常想望不流血的革命。无论流血不流血，总之在标语、口号、文告、论说上号称革命是不相干的，必须看大家是否生活得好，才可以判定有没有革了命。从这一点看，现在大家的生活越来越不好，岂但革命尚未成功，简直是革命正当开头。三十多年来，只算上了预备功课，还没有上正式功课。比起有史以来的几千年来，三十多年的预备功课不算长久。“大家生活得好”，历史上没有这回事儿，可是从今以后要它有，这是破天荒；换句话说，是要把历史翻新，换个样儿。这样的大事，预备三五十年怎能算长久？

辛亥那时候，一般人以为革命是革命党人的专业，或者像鲁迅先生描写的阿Q似的，为要投机才去革命。三十多年

后的今日可不同了，多数人认为革命是各人本份内的事，但并不是什么“业”。从群己相关的观点出发，知道要个己生活得好必须大家生活得好，大家生活得好了个己决不会不好，于是人人尽各自的一份，把革命看作本份内的事。同时，种田的还是种田，做工的还是做工，当教师、医生、公务员的还是当教师、医生、公务员，大家决不说“敝业是革命”。这是个重大的变更，很关紧要，革命真个成功必将在这上头生根。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作

原题为《念辛亥，看建国》

往实际方面钻

——介绍《思想与生活》

人都有思想，人都有生活。咱们现在谈思想与生活，不是说原来没有要它有，是说思想要怎样才正确，生活要怎样才有意义，思想与生活要怎样融和在一块儿，表里如一，即知即行，才可以达到更高更深的人生。

说正确，说有意义，不能漫无凭依，脱空来说，必须有个标准，或者有几项标准。思想与生活的标准，古跟今虽不会绝然不同，可也不会全然相同，时代差异，标准就变动了；就一个时代说，人人的思想与生活决不会全然相同，这是当然。可是某时代必然有某时代的根本精神在。这种根本精神不是神或上帝显示出来的，也不是圣贤豪杰规定出来的，是从人人的生活里提炼出来发挥出来的。必须根据了时代的根本精神，才可以找到那标准，才可以说怎样是正确的，怎样是不正确的，怎样是有意义的，怎样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是所谓人民的世纪，如果把人民的世纪浅显的解释一下，或者说给个定义，大概可以这么说：这是个新的世纪，人民站起来了，他们要凭自己的心思跟力量，使物质生活跟精神生活都好起来，而且不断的更好更好；他们要大家都好，不只巴望自己好，因为他们知道惟有大家都好自己才会真的好。要问现时代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我想，上面说的就是了。

在这样的时代的根本精神之下，就来了两个标准：集体跟民主。不，说两个是不对的，集体跟民主原来是一回事儿的两方面，就力量方面说，叫做集体，就运用方面说，叫做民主；不讲民主，无从表现集体的力量，不讲集体，无从达到民主的运用。

集体跟民主是现时代人思想与生活的标准。合得上这个标准，是正确的，有意义的，尽可以让他发展，求其更高更深。合不上这个标准，是不正确的，没有意义的，非赶紧换个方向不可，否则违反了时代的根本精神，自己吃亏，人家也吃亏——吃亏在妨碍了大家都好。

集体跟民主该怎样像一条绳子似的，贯穿着咱们的思想与生活，该怎样像吃下去的东西似的，消化在咱们的思想与生活里，彬然先生在这本小册子里谈得很多很周密，我不必多说。我还想说些旁的话。

刚才说过贯穿跟消化两个词儿，意思就是要生活与思想无时无处不合那标准，也就是要一点一滴的在实际思想实际生活上下功夫，不是口头说说笔头写写就可以了事的。但是在实际思想实际生活上下功夫比较不容易，第一要有方法，其次要养成习惯。口头说说笔头写写可容易多了，学得几个名词术语，大略懂得那是什么意思，就可以搬出来应用。

语言文字在社会间的作用很大，各人要表白自己，影响他人，不能不说话写文字。既然要说话写文字，决不能避开名词术语，乃至标语口号。避开原是用不着的、要紧的是不要仅止于说说写写，说的写的是东，实际思想实际生活是西，即使说的写的非常之对，于自己有什么好处？而且，如果一

东一西，说的写的就好比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决不会非常之对，那于人家又有什么好处？

近年以来，流行的名词术语很多，大家口头说着，笔头写着，成为风气。前面说过的集体跟民主就是两个，还有，如学习、检讨、批判、总结，都是的。单把学习作个例子来说，我怕的是口口声声说学习，结果只学习了惯说“学习”这两个字。这不是我敢于说俏皮话轻料人家，是表出我的极度的过虑。口口声声说学习是不相干的，还得寻求学习的方法，还得按照方法在这一件上那一桩上真个去学习，还得持之有恒，养成习惯，这才可以得到学习的好处。关于其他名词术语，情形也如此。总之一句话，名词术语无论怎样好，必须贯穿着咱们的思想与生活，必须消化在咱们的思想与生活里，才于咱们有好处。否则好的是名词术语，咱们可沾不着什么光。

从前理学家说诚说敬，存心养性。现在人大多看不起那一套，因为他们搞的是玄虚。玄虚的东西教人空洞，教人不切实际，看不起它们是应该的。但是，现在的这些个名词术语也可以成为玄虚的东西，如果咱们只拿来在口头笔头搬弄。惟有往实际方面钻，一点一滴都不放松，这些个名词术语才是咱们思想与生活上的营养品。

彬然先生的这本小册子里有疏解，有阐明，不只标举几个名词术语。可是我要奉告读者，粗粗看过是不够的，细细的揣摩也还不够，必须往实际方面钻，一点一滴都不放松，你才不枉读了这本小册子。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作

不断的进步

“五四”是我国现代史上青年运动开始的标帜。这个运动所号召的，积极方面是科学跟民主，消极方面是反帝反封建。如果只是少数人的理想，决不能够发动这么一个运动。必然由于客观情势上有它的必需，才会一经号召，就展开成为广泛的运动。所谓必需，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中国人民必需生活得好，物质上精神上都好，而且好没有止境，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年要比今年好。这个必需带来了另外一个必需，就是中国必需成为独立自主繁荣康乐的国家。实现这两个必需是目标，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是途径或方案。“五四”以后历次的社会运动，以及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种种方面的表现，虽然不见得完全一致，可是大体来说，都顺着这一道主流在那里进行，就是遵从上面所说的途径或方案来达到上面所说的目标。谁不顺着这一道主流甚至阻挡住这一道主流，大家就说他反动或者反革命。反动反革命分子是人民跟国家的敌人，因为他不让人民生活得好，不要国家独立自主繁荣康乐。

若问谁是这一道主流中的主力，那必得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的哲学作为思想的根据，实事求是，土生土长，制定了种种的纲领跟政策，而且即知即行，行中求知，把

理论跟实践搅和成浑然的整体。到今天为止，你看，大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全解放了，大江以南正在逐渐解放。人民翻了身，建立了民主政权。生产跟建设成为人民狂热的中心问题，尽量的利用科学，期望得到最大的成果。在解放了的广大地区以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已经一扫而空。所以，“五四”当时所号召的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跟努力，经广大人民的拥护跟奋斗，才彻底化为有血有肉的现实。这样说法是最为确切公平的。

三十年的时间，在历史上说起来，真是短短的一段儿，可是进步就有这么多：我们怎得不非常之兴奋？再想想未来，全中国的解放在最近期间就将实现，在全国人民的勤劳跟热忱之下，生产跟建设必将先于预期而逐步完成，人民的生活没有止境的好起来，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强固的站定在东亚：那进步比今天更多了。进步，不断的进步，是咱们该拿来自勉并且自傲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发表

回忆瞿秋白先生

认识秋白先生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常在振铎兄的寓所里碰见。谈锋很健，方面很广，常有精辟的见解。我默默地坐在旁边听，领受新知异闻着实不少。他的身子不怎么好，瘦瘦的胳膊，细细的腰身，一望而知是肺病的型式。可是他似乎不甚措意这个。曾经到他顺泰里的寓所去过，看见桌上“拍勒托”跟白兰地的瓶子并排摆着，谈得有劲就斟一杯白兰地。

他离开了上海就没有再见着他，只从报上知道他的消息。后来他给《中学生》写过稿子，篇名现在记不起了，是从朋友手里辗转递来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秘密地住在上海。那稿子好像是斥责托洛斯基的。最后知道他被捕了，被杀了。直到今年碰见之华，之华告诉我秋白先生有一些材料，遗嘱说可以交给我，由我作小说。之华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材料，我也没有追问。我自己知道我作小说是不成的，先前胆大妄为，后来稍稍懂得其中的甘苦，就觉得见识跟功夫都够不上，再不敢胡乱欺人。因而听见有一些材料的话，也引不起姑且来试试的野心。

鲁迅先生编辑秋白先生的《海上述林》是大可令人感动的。搜辑，编排，校对，装帧，一丝不苟，事事躬亲，这中

间贯彻着超过寻常友谊的崇高精神。朋友们分到一部，读了秋白先生的大部分述作，也感染了这种崇高精神。鲁迅先生写赠秋白先生的集句对联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副对联挂在许广平先生上海寓所的客室里。每一次抬头观玩，就觉得他们两位精心研讨，惟愿文化普及而且提高的情景如在目前，自然使人志愿奋发，不敢贪懒。——可惜我的一部《海上述林》在抗战期间给人拿走了。

《乱弹及其他》还是最近才借到的，翻过一下，没有细看，这中间谈到拼音文字的问题，写作上运用语言的问题。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字母是秋白先生选定的。写作上运用的语言，在白话文运动当时没有详细研讨，大家各随其便，保持文言的语汇跟句式，仿效欧洲的语汇跟句式，只不过换上些"的了吗呢"，结果成了一种能看而不便说不便听的语言，跟文言一样。没有想到改革应该改换个源头，文言的源头在目，改换过来就得在口在耳，才能够切合当前的生活，表达现代的心声。到如今，不满意白话文的人多起来了，要写俗话，要写工农大众的语言。如果推究关心这个问题谁最早，就要数秋白先生了。

他的全集必须好好的编，分类要分得精密，排次要按时期先后，校对要像鲁迅先生那样认真，还要有翔实的传记或者年谱。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作

纪念杨贤江先生

贤江先生去世一十八年，我们才来纪念他，以前只是记在心头，没有为他开过会，写过纪念文字。

我跟贤江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相识，同在编译所。他编《学生杂志》，可不是主编。他一方面顾到主编人的意旨（在当时也算不得高明的意旨），一方面不肯放松读者的利益，居然使《学生杂志》在学生界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的中年人还记住民国十几年间《学生杂志》给他的影响。这件事看似平常，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他的生活最有规律。工作时间以外，什么时候读书，什么时候运动，很少有更改；偶尔去看他，见他必恭必敬的坐在那里用功，立刻想起这是他的读书时间，就不好意思多坐了。我好几次猜想，他这么认真，大概受过理学家那一套说法的影响，后来知道果然。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是个革命者了。从阶级意识说，从唯物唯心的观点说，革命者跟理学家截然不同。然而在凡事认真这一点上，彼此是相同的（那些假冒的当然不能算在内）。从理学转到革命的似乎很有几位，恽代英先生也是一个。

他怎样干革命活动，我不大清楚。只知道到编译所来看他的人很多，会客室里时常可以见着他。青年们对他很有信

仰，开什么会往往找他去演说。他曾经邀我加入共产党，有一天，他叫我晚上就去行入党式，我没有答应他。

他平时研读跟著译的大多在社会科学跟教育方面。他对于教育的见解，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本来，只要认定教育并非孤立的事项，只要认定教育该为什么人服务，见解就错不到哪里去。我想，如果他健在到今天，也许早就到老解放区干了多年的教育工作吧。凭他的认真精神，配合着解放区里色色求其土生土长的风尚，在教育上该会有不少的贡献。

他讲究卫生，经常作健身操，挺挺的高高的身躯，肩膀宽阔，脸色红红的，谁都看得出他是个标准的健康人。不料他忽然病起来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好像是肺结核。只记得去看他的时候，他不是静静的坐着就是静静的躺着，说需要多休养。后来病侵入了肾脏，医治总不见好。他的夫人韵漪照料他无微不至，不说自己劳困，只为他的病在他看不见的时候皱眉。最后到日本去治，割了一个肾脏，经过相当好。可是不几天突然转变，他去世了。韵漪带回来他的骨灰。

十几年来，韵漪在学校担任教师，艰苦的生活，勤劳的服务，直到如今。朋友间都说她不愧为革命者的遗族。一个儿子在抗战期间进了苏北解放区，就没有消息，历年来托有关方面详细打听，毫无结果。朋友们都想，恐怕牺牲了，可不敢当她的面说。最近上海传来消息说她的儿子有了着落，大家替她欢喜，她的欢喜当然可想而知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九日发表

划 时 代

文艺界从来没有像这一回文代会似的大集会、包括的部门这么多，代表所从来的区域这么广，都开了新纪录。会期又在全国解放快要实现，新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着手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跟联合政府快要成立的时候。意义太重大了，真该用“划时代”三个字来形容。参加了这个划时代的大会的朋友们，谁都会心中自忖，并且互相勉励：咱们在修养上，创造上，乃至服务上，都得来个“划时代”才行。不然就是白白参加了这个大会。白白参加还没有什么，可就是对新中国的建设怠工，这在热爱祖国人民的人是万万不甘愿的。

大家来个“划时代”，事实上确乎办得到，只要把握住文艺的方针不放松。文艺为的什么，咱们差不多已经一致了，用不着多讨论，重点恐怕还在怎样加深修养，提高创造，以便收到最大的效果。这需要彼此切磋观摩，关起门来独个儿摸索是不成的。现在咱们有六七百位朋友聚在一块儿，怀着同样的热诚，拥有各自的经验，互相感召，彼此交流，切磋观摩的规模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所以说，文学艺术必将从这个划时代的大会而划时代。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发表

祝文代大会

第一次文代大会开幕了。这是文艺界空前的大集合，包括的部门这么多，代表所从来的地区这么广，唯有在人民的政权之下才可能有这么个大集合，唯有在文学艺术真正跟布帛菽粟同样切需的新时代才可能有这么个大集合。用老话说，无非“以文会友”，“声气应求”那一套，用在这个大会上也未尝不可以，可是实际的意义要超过那些话很多很多。来会的代表们目标是齐一的，那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态度是齐一的，那态度就是勤恳质朴，精进不懈，唯愿竭尽可能，把各自的一份成就贡献给人民。人人都说解放军识解高，教养好，从来未有，凭这样的军队来进行革命，自然马到成功。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天来会的是手执另外一种武器的解放军，今天这个大会就是这批解放军的大检阅。那么，“以文会友”，“声气应求”之类的话怎够描述这个大会呢？

大会期间，当然重在知识经验的交流，理论实践的研讨。可是，所以要交流，要研讨，还在会后展开各自的工作。展开工作是最重要的步骤，不然就谈不到服务，谈不到贡献。依我个人想，单就文学的部门说，等待朋友们去做的工作就不少。再退一步，且不说创作，单就载述传记的门类说，急于要做的工作也很多。

我来到北平以后，听过好几次的典型报告，有农民、有士兵、有妇女、有技术人员、有小学教师。这些真实的故事都非常动人，富于教育意味。报纸杂志上虽也刊载一些讲话记录，可是草率简略的多，往往打了个大大的折扣。如果由专搞文学的朋友好好的来写，分类编印，让没有机会听到的也不折不扣的领受，那影响多么大。

几年来的解放战争，论意义跟规模都非常之伟大，可以说史无前例。一部解放战史是必得有的，搞文学的朋友应该把编撰的责任担在自己肩膀上。这是一件庞大复杂的工作，非集体合作不可。研究，采集，个别访问，实地考察，然后从汇编到写定，大概得动员几百位作者，花上几年的时间，才可以完工。解放军渡江的时候，部队里不是号召过大家写《渡江的一天》吗？如果写的不少，这是解放战史里的一个重要章节，也得拿来好好的编定。

此外还有人物传记。解放事业造就了种种的新人，这种新人是以前没有的，今后可将由感染的力量普及到一般人，成为一般人的型式。叙写这些新人的传记数量该有多少，我现在说不出，料想起来一定不会少。还有许多为命令牺牲了的人，他们的传记也得好好的写。新的传记该用新的写法，决不能用我国旧时的那一套，这其间尽够搞文学的朋友揣摩的。

单就一个部门里的小范围说，工作就有这么多。各个部门合起来说，工作又哪有限制。希望大会闭幕之后，大家坚强的认真的展开各自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发表

佩弦周年祭

佩弦，你为什么不迟死半年？如果你迟死半年，就可以亲眼看见北平的解放。那时候你的激动跟欢喜一定不比青年人差，你会和着他们的调子歌唱，你会效学他们的姿态扭秧歌。在解放军入城的那一天，你会半夜里睡不着觉，匆匆忙忙的起来，赶赶紧紧的穿好衣服，参加在欢迎队伍里，从西郊跑进城，在城里四周游行，一整天不嫌疲劳，只觉得新生的愉快没法尽情表现，像张奚若先生那样。你为什么不迟死半年？

佩弦，你为什么不迟死八个月？如果你迟死八个月，我就可以在北平跟你会面。按照你"每事问"的老脾气，你一定急于问我一路上看见的情形。我就要告诉你，在山东走了十多天，看见了真个站起来了的人民，看见了真个作"义战"的军队，看见了真个当"公仆"的官吏。这些人都是全新的，以往历史上绝对没有过。这由于全部人民解放事业就是个范围非常之广的教育课程，从实际出发，以新哲学为指导原理，土生土长，实事求是；大家在这个课程中自我教育，相互教育，才把品质改得那么好，提得那么高。你一定乐于听这些话，还要问这个，谈那个，一连几个钟头不厌不倦。你为什么不迟死八个月？

佩弦，你为什么不迟死十年二十年？如果你迟死十年二

十年，不说别的，单说大学中文系方面，你一定可以有你的一份特殊贡献。要批判的接受文学遗产，你的精密的分析跟还原的检察都是必要的基础。你在这上头做了多年的功夫，已经有好些成绩，再加上生活跟思想从现实方面受来的影响，一定会越来越精深。我国向来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史，从现在的观点说，文学史更要另起炉灶。你有充分的学力，加上不断长进的识力，有资格写一部全新的文学史。你为什么不迟死十年二十年？

佩弦，你末了儿一次参加座谈会的谈话使我永远不忘。你说你乐意改变自己，可是得慢慢儿来。我自以为能够料知你的心意。你大概是这么想的：大家嚷改变就跟着嚷，这是容易不过的事儿，但是跟实际没有多大关系。生活跟思想既然成了习惯，要去掉那些不良的成分，取得那些优良的成分，就得养成新习惯。新习惯的养成是一点一滴的，是实践的，不是说说想想的，不能不慢慢儿来。惟有慢慢儿来，所谓改变才能在身上生根，才能使自己真个受用。你其实早已在那里慢慢儿来，你的行诣跟著作都可以证明。痛心的是你说了这句慢慢儿来的话之后，再不容你慢慢儿来了！

佩弦，我到了你清华寓所的书房里。嫂夫人说所有陈设一点儿没有动。我登门不遇永不回来的主人，心里一阵酸，可是忍住了眼泪。后来北大十几位朋友邀我们小叙，我喝多了白干，不记得怎么谈起了你，就放声而哭，自己不能控制。为你，就哭了这么一次。我还没有去万安公墓，秋凉时候总得去看一看。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发表

中国人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毛主席说的，“我们的工作将要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要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这样的光荣的日子，我要诚恳地向诸位说几句话。

诸位，请想一想，“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一个多么巨大的数目！请想一想，“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光景！大家说二十世纪是人民的世纪，现在咱们中国人开始了人民的世纪，这句话更加有了确实可靠的保证。

咱们立国的精神跟方针政策包容在人民政协通过的三个文件里头，就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个文件经过六百几十位代表详细研究，反复讨论，才通过的。他们的研究跟讨论，是综合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根据了咱们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诸位，咱们要注意，这三个文件里头贯彻着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晶。毛主席告诉大家要怎么样才能够站起来，大家认清楚只有照他说的做才能够站起来。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跟毛泽东思想融和了，这三个文件就是确确实实的证据。

诸位，从今以后，咱们中国将要涌起爱国的高潮，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种爱国跟以前所谓爱国完全不同，以前的爱国是空空洞洞的。现在，咱们站起来了，国家是咱们自己的，政府是咱们自己的，武力是咱们自己的，资源，财富，文化，教育，全都是咱们自己的。有这么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咱们手里，所以咱们的爱国也是实实在在的。不但心里爱，而且懂得怎么样爱，能够用实际的行动去爱。

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为了爱国。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是为了爱国。在国际间结交够朋友的朋友，是为了爱国。如果有国际强盗来侵犯咱们，就拿起武器，不怕牺牲，像《义勇军进行曲》里唱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也是为了爱国。

就是这么样的爱国主义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发表

附　录：

《叶圣陶散文甲集》编后琐记

叶至善　叶至诚

我们弟兄俩忙了将近五个月，总算把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写的散文理了一遍，选出了二百一十篇，编成了这本《散文甲集》。编排顺序依据写作的先后，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的就以发表日期为准，好在那时候发表和写作的日期不会相差太远。为了寻找出处和核对日期，好几位朋友给我们帮了忙，商金林同志出力最多，现在集子将要付排，我们衷心感谢他们。

把收集到的父亲的散文按时间一排，我们发现一些颇为有趣的现象：从篇数看，有几年特别多，有几年却寥寥无几，甚至一篇也没有。举例说，一九二五年是大丰收，在“五卅”以后那一个多月内，将近有二十篇；一九二八年却特别少，原因是写《倪焕之》几乎占去了父亲所有的工馀时间。抗日战争开始，父亲的感受很多，按说都可以写成散文，可是寻找的结果，头几年写的并不多，可能先是由于到处迁徙，生活过于动荡，后来又住在乡间，跟文化界出版界比较疏远了些。到一九四四年，处境有了改变，同时民主运动高涨，父亲写的散文突然多起来，内容大多涉及政治，而且反应的迅速又

跟“五卅”运动中相仿。这股劲头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八年底，第二年年初，父亲就由上海动身，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了。我们编的虽然是选集，但是还可以看出这种变化的情形来。

更有趣的是把父亲的散文按时间一排，我们还发现父亲谈论到的一些问题，别的作者稍前或稍后也谈论过，有的看法十分接近，有的甚至连题目也十分相似。这种情形恐怕只能这样来解释：因为大家关心的事物的面比较广，感觉又比较敏锐，在同一个时期受到的刺激又相同，所以产生了相互类似的反应。题材多样，涉及的方面广，可以说是那时候许多散文作者的共同特点，差别就在涉及的方面不尽相同罢了。我们认为要给那时候的散文作者编选集，应该尽可能反映这个特点，否则不能让读者看到作者的生活和思想的全貌。我们是努力这样做的，凡是父亲涉及的各个方面，我们至少得选上一篇。效果怎样，只有请读者评定了。

父亲再三关照我们，凡是别处见过的，不要再选进这本散文集里去。所谓别处，一是语文教科书，二是近几年出版的各种名目的非个人的选集，三是今年出版的父亲的《语文教育论集》和明年将要出版的父亲的《论创作》，如果都避开不选，要让读者看到全貌就难办了。尤其是谈阅读的和谈写作的，在父亲的散文中占比较重要的地位，总不能因为已经选进了那两本集子就避开不选吧。于是我们跟父亲发生了争论，最后达成协议，尽可能减少重见。对于选不选早期的作品，我们跟父亲也发生过争论。父亲认为他的早期作品见解十分幼稚，文字又很别扭，没有再拿出来让人看的必要。我们说让人看一点儿有好处，可以明白任何人的思想都是逐

步发展的，都是跟生活经验分不开的。最后，父亲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选出的二百一十篇散文，父亲都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不是改动意思，只是把原来的意思表达得清楚点儿罢了。父亲认为要是改动了意思，那就成了新作，不是原来的作品了。

在这二百一十篇散文中，有一些是集体的或者团体的倡议、声明、公开信之类的文件。这些文件实际上是集体创作，包含着许多人的共同思想。把父亲执笔的这些文件收在集子里，目的在于保存。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编　后　记

第六卷收两集散文：一集是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一集是解放战争时期写的。

一九四五年，文光书店出版过作者自编的《西川集》，收散文二十二篇，小说四篇。现在把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集称作《西川集》，只是沿用了那本旧集子的名称，所收的文篇，从范围说，从篇数说，都跟那本旧集子大不相同。把作者为那本旧集子写的《自序》作为附录，为的是便于读者比照。

解放战争时期的一集，援小说集《隔膜》《火灾》等的先例，取其中一篇的篇名《现实与理想》，作为集子的名称。

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写的散文，曾选出二百一十篇，编成《叶圣陶散文甲集》，于一九八三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这第五卷、第六卷，所收文篇的范围小得多，篇数多得多，跟“散文甲集”大不相同。把“散文甲集”的《编后琐记》作为附录，也为的便于读者比照。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叶圣陶集（第六卷）
作者＝
页数＝３２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